

東亞叢書

BIBLIOTHEQUE ASIATIQUE



我們把受教益的期望更多地寄托在街頭讀者身上，衷心希望同志們給我們提出批評指正意見，特別希望街頭理論家、政治家、法律家、哲學家、批評家、觀察家們不吝賜教。我們希望越來越多的同志公開討論這些問題。

——李一哲

啓　　事

根據不少同志的建議，爲了能夠方便更多的人對我們此文的觀點，加以研究、批評、批判，我們打算將此文油印，但鑒於我們的困難，懇切希望廣大革命同志能夠在紙張上給予我們支持，十張、百張、千張、萬張，多多益善，少少無拘。

若願意幫助的，請與廣州新港路廣東人民藝術學院(原廣州美術學院)李正天聯繫。

致

崇高的革命敬禮

李一哲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李一哲著　漆豪校註

关于
社会主义的
民主与法制

李一哲著

漆豪校註



東亞出版社出版

東亞叢書

已出版重要書目

中文

陳慶浩

新編紅樓夢脂硯齋評語輯校

羅夢册

孔子來王而王論

魯智深譯

論大學生之貧乏

陳慶浩集校

鍾嶸詩品

伊羅生著　劉海生譯

中國革命史（插圖本）

謝蓁

法國國立圖書館所藏中文刋物目錄

法文、英文、日文、德文

雷思

毛主席的新衣

金魂

中國信仰手册（再版）

法文、英文

雷思

中國影子戲

法文、日文

紅衞兵報刋選

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

李一哲原著　　漆　豪校註

東　亞　叢　書

BIBLIOTHÈQUE ASIATIQUE

目　錄

「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日文版序…… 1

從李一哲大字報到天安門事件（代序）…… 1

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序言）李一哲 45

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本文）…… 77

附錄一：對「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的批判……宣集文 99

中國向何處去？……省無聯一中紅造會鋼319兵團「奪軍權」一兵 127

附錄二：楊曦光簡介…… 153

附錄三：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155

與李一哲大字報有關大事記…… 159

跋…… 170

再版後記…… 175

封面封底圖片　毛國昆攝

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

李一哲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张贴序言

(一) 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问题
(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训
(三) 关于林彪体系
(四) 关于批林以来的形势
(五) 谈反潮流
(六) 对四届人大的希望

去年八月以后，人们以为很快就会召开的四届人大至今终于还没有召开，但是我们献给它的这篇文章，却被认为是我们的"体系"了。

我们在这篇文章里初步批判了林彪体系，后来的文章继续了批判。结果，我们的一些朋友都把"体系"作为一种吓人的东西赠给了我们，也许我们在这一批判中涉及领域之广阔，自我暴露之全面，真的够得上一个"体系"了。但是，这种"体系"——即使我们也可承认我们具有某种体系的话，也决不是导端于马克思主义体系之外的东西，我们只不过企图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去对林彪体系影响所及的范围作一番认真的清理罢了。实际上我们还远没有做到这一点。林彪体系的彻底暴露与我们一年前对它的评论没有发生多少矛盾。相反，使我们惊奇的倒是在许多方面得到了证实。这次街头张贴的（第三稿）前五部分只作了少量修改，对于第六部分——即关于对人大的希望和对法制的建议，随着一年来形势发展，我们不满意原来的写法了，认为有必要作深入一些的阐述，所以重新写了；而更多的是去掉只简略谈及、有待发挥和补要阐述出来的问题，我们想在这篇序言里说一说。

× × × × ×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使某些人感到可怕，首先是我们讨论到这个题目本身。

据说，稍微有一点马列主义常识的人是不会讨论什么"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我们算是这一点马列主义常识也没有的，但是，我们知道60年代以来世界上的几件事情：一是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复辟了，100多个党大多数不信马列了；二是在我们的中国出现了曾经并且至今还为许多人很不理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三是毛

对《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批判

宣集文

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前进的一片大好形势下，在社会主义祖国南大门——广州市的大街上李一哲抛出了一张洋洋两万余言的反动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及其《序言》（以下简称《民主与法制》）。在这里，作者提出了自称是"全面""自我暴露"的李一哲"体系"。这个李一哲"体系"，对于革命的人民来说，无疑是一份极好的反面教材。它又一次从反面教育了革命的人们，在大好形势下，"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这张反动大字报在"批林"的幌子下，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对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进行了一系列的极其恶毒的攻击。它还极力鼓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法制，妄图纠集一切牛鬼蛇神，煽动群众，制造混乱，在中国重演"匈牙利事件"。总之，这张大字报的要害就是反对和摆脱党的领导，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李一哲反动"体系"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它是当前阶级斗争深入发展的反映。正如许多革命群众尖锐指出的：李一哲在此时此地迫不及待地抛出他们的反动"体系"，是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的，是蓄意破坏毛主席关于要安定、要团结的指示，破坏当前大好形势，破坏四届人大的召开，一句话，就是要无产阶级下台，资产阶级上台！

「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日文版序

本書初版的代序——從李一哲大字報到天安門事件寫成於今年（1976）五月，離現在已是半年的時間了。這半年來，朱德、毛澤東先後去世，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幫」垮台，華國鋒成了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共中央軍委會主席及國務院總理，標誌着文化革命的結束，毛澤東時代的結束。四月五日在天安門廣場的羣眾高呼：「秦始皇的時代一去不復返！」在當時，只是羣眾內心的願望，但在今天，隨着毛澤東的死亡，這種願望已化爲現實。我們可以宣稱，由於歷史條件的不同，新的秦始皇已不可能在中國的大地上誕生，隨着最後一個秦始皇的死去，在中國歷史上持續了二千多年的秦始皇時代一去不復返了！早在半年前，根據對現代中國歷史的分析，我們指出了現實派政治路線的必然勝利；指出了「一旦毛澤東死了，『理想』派失去靠山，則現實派的反攻就可以從各方面開始」；也指出了「只要現實派一旦有反攻的可能，『理想』派的人，除了個別代表分子，一夕之間變成現實派也是可能的」。毛澤東死後中國的演變，充分表現了我們的預見。代序中我們指出現實派的政治路線，是從現有的制度產生出來的較能代表這一制度的利益而終佔統治地位。「四人幫」垮台後的種種政策的改變正說明這一點。歷史畢竟是一門科學，只要我們對客觀情況有正確的了解，我們就能把握到歷史發展的趨勢，也就可以在一定範圍內預見未來。當然不可能對某一件事，將於何時發生，

不可能對某一個人的升降，加以預測，因爲其間所涉及的複雜因素，非我們所能完全把握，即使當事人也難以自知。因而這類預言只是猜測，是缺乏可靠的基礎的。又何況，就歷史的大方向而言，個別事件，個別人物，是難以左右潮流的。倘若我們將注意力放在這個別的人事上，我們就只能頭出頭沒於人事的浮沉之中，而掌握不到歷史的規律。即使偶爾猜中謎底，還是把握不到歷史的大方向的。這類繁瑣的研究，除了作爲茶餘酒後，街頭巷尾的趣談外，沒有太大的現實意義。

在這個新序中，我們試圖就毛澤東死後的形勢來分析中國未來可能的變化和當前中國革命運動的方向。

（一）目前國內外的情勢及其可能的發展

(1)「四人幫」垮台的根本原因——毛澤東死後，「四人幫」失去靠山，立刻垮台是黨內上層鬭爭的結果。華國鋒兵不血刄地奪得政權，不單是現實派支持的，也因「理想」派大部份分子叛離江青等。多年來組織養育起來的「理想」派在一夕間即潰不成軍，絕無反抗能力而變成階下囚的根本原因，是他們完全缺乏羣眾基礎。黨內黨外羣眾對於「四人幫」的狐假虎威，以「理想」爲名，篡權亂法，胡作非爲，阻礙中國歷史前進，早已恨之入骨。早在「理想」派的權力如日中天，威威赫赫不可一世時，黨內外革命的羣眾已對他們進行無情的批判。據最近官方透露，1973年7月至1975年8月，上海越劇團武功教師兼演員朱錦多曾先後三次上書毛澤東中央，批判張春橋、江青，但終於被打成反革命，戴上手銬，「依法拘留」。（見人民日報1976年12月14日第一版）。1975年8月8日中央五七藝術大學音樂學院教師李春光就電影「創業」事貼大字報批評文化部。這張大字報被姚文元宣佈爲反動大字報，「對大字報的作者百般進行迫害，今年六月，更勒令

將作者隔離審查，並且大肆追查大字報的同情者和所謂幕後策劃者」。當然這只是眾多批判的大字報較符合現在當權派利益的兩張，所以被拿出來，相信還有很多很多我們聽不到也看不到的。本書所錄的李一哲大字報則是從更多事實，從理論的高度對「理想」派討伐的檄文。李一哲大字報指出「理想」派是「林彪體系確立的過程造成了一個文人既得利益的勢力，他們害怕洶湧起來的人民羣眾」。這班人在中國搞「封建性的社會法西斯專制」，搞「禮治」。喊出了限制特權，要「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制」的呼聲。在「理想」派垮台前，全國都有李一哲式的大字報，但由於統治者的封鎖，很少能夠傳到外面。㊀今年天安門的四五運動，是羣眾對「理想」派的示威，用行

㊀香港眾多報紙都有刊載下列消息：四月五日天安門事件後，天津市警備區司令部的連級「政治學習輔導員」郭廷芳，撰寫了五萬字的「小字報」，印成後寄往北京、天津各機關團體。小册子題爲「中國革命問題」，以下是該報的十大標題的主要內容：（一）鄧小平與四·五事件根本無關。這件事是由於張春橋等排擠老功臣所引起，可以說是人民羣眾自發革命的一種表現。（二）鄧小平搞四個現代化原本是善意的，不應該斷章取義，羅織成罪。（三）認爲目前中共的權力落在一小撮極左分子手中。（四）認爲大陸上工農業落後，人民生活尤不可忽視。運動不斷的結果，已經導致幹部羣眾和領導之間互相猜忌，使得人人自危，影響團結，妨礙進步。（五）要求革命走向正常化，認爲歷次運動是對歷史、文化、藝術的根本扼殺，嚴重摧殘了文化科學的發展。長此以往，十年後將找不出會寫信的青年。（六）呼籲將國民經濟搞上去，希望在中央過慣高級生活的幹部，親自到貧苦的農村調查、體會。光嚷鬧革命，呼口號，根本不切實際。（七）坦白指出中國人民所期待的是一個民主、團結而又統一的新中國。（八）指責大陸除了共產黨以外，各黨派均已在專政下名存實亡，這不是合理的現象，也不是自然的趨勢。（九）指出大陸人民毫無宗教信仰自由，與憲法精神相違背。（十）強調大陸當前所需要的民主、統一、和平、自由，而不是獨裁，扼殺宗教的一黨專政。有關消息透露，這位郭廷芳曾於今年四月下旬被逮捕。當時他面帶笑容，毫無懼色，當一名逮捕他的人不滿他態度，將他毆辱時，其他的同志即行制止，在場的中共幹部，保持緘默。

動來表達他們的願望。四五運動雖然被鎮壓下去，但它已明確地顯示了人民羣眾的力量，加速了「理想」派的分裂和滅亡。四五運動前後，全國各地都有類似的示威。「理想」派中較清醒的分子，認清人民的力量和意願後，與現實派結合以推倒「四人幫」。「四人幫」垮台後一些爪牙在人民羣眾威力下不敢輕舉妄動，或者幡然反正，或者乖乖就擒，絕無反抗餘地。而現實派也更有信心進行反攻。在這種條件下，華國鋒的鏟除「四人幫」，不單得到黨內上層幹部的支持，也符合了黨內外羣眾的願望。「理想」派妄圖扶植城市工人、民兵作爲支持他們的武裝力量，但民兵還是人民羣眾，他們恨的是「理想」派，在毛澤東的權威還存在的日子，他們不得反抗，甚至在天安門事件中被「理想」派脅制，扮演鎮壓革命羣眾的幫凶。但當偶像倒下後，「理想」派也就指不動他們了。我們看到各地民兵同樣地興高采烈去慶祝「四人幫」的垮台，可見「除四害」的行動，並沒有引起民兵和軍隊的衝突。

(2)所謂「四人幫」附從分子的搗亂——最近外電引用中國國內地方電台的廣播，指出「四人幫」垮台後，很多地方混亂，以爲就是「四人幫」附從分子從中搗亂的結果。似乎官方也有同樣的說法。看來「四人幫」分子倒不少，爲甚麼我們說「四人幫」非常孤立呢？「四人幫」垮台後，中國一些地方混亂，那是眞的。自從文化革命以來，羣眾與官僚間，不同派別的羣眾間，官僚與官僚間都有矛盾。歷次的政治運動，不但沒有將這些矛盾消除，而且是拉一派打一派，使得矛盾更尖銳化。中央處理這些矛盾的方法是壓。因此每當中央有政治鬬爭，對地方的控制不足，這些矛盾自然要表面化了。而且中央某一派的垮台也使到地方受壓制的派系得以興起、翻案。因而這些混亂是內部矛盾的結果，而不能看成一種「四人幫」附從分子反抗的活動。當然，我們並不排除某些「四人幫」附從分子制造混

亂，從中搗蛋的可能，但「四人幫」已成了「不齒人類的狗屎堆」，「四人幫」的旗子打不出，能夠讓人家混水摸魚的原因還是本身有矛盾在。那麼爲甚麼官方的宣傳機構將這些混亂說成「四人幫」附從分子的活動呢？將一切不利於當權者的反抗行動加上人人痛恨的帽子是統治者慣常的技倆。例如，將天安門事件說成某一集團有組織的反革命活動，就將羣眾自發性的反抗轉化成一種派別的鬬爭，當權者依照自己的願望歪曲了矛盾的本質，轉移了矛盾的性質。現在，中央和地方的當權派用同樣手法將造成混亂的敵對派別，無論是羣眾和官僚，羣眾與羣眾，或官僚和官僚之間的矛盾所引起的混亂都扣上「四人幫」的帽子，以便加以孤立和鎮壓，宣傳機構如此說，外間人不加分析也隨聲附和，倒好像「四人幫」聲勢甚大，遍地都是。但造成混亂的原因或正因羣眾要求平反 ， 要深入反「四人幫」而不可得的結果。現在將他們說成「四人幫」的附從分子了，豈不是替「四人幫」臉上貼金，寃枉好人！鏟除「四人幫」的行動獲得羣眾內心的擁護。自文革以來，羣眾就沒有這樣高興過。大規模的慶祝「除四害」的遊行在組織下進行。但各地仍有不少羣眾自發性的慶祝活動。據香港長城公司演員張錚談他當時在北京的見聞：「我們在首都的幾天，北京滿城歡笑，滿城鞭砲聲，滿城鑼鼓聲。不止中國人民盡開顏，外國朋友也分享我們的歡樂，他們向遊行隊伍招手，鼓掌，後來還不知從那裏弄來小旗，揮舞着參加遊行。」

祖國人民怎樣痛恨「四人幫」，你知道不知道？不妨舉一個例：這個時候，北京居民喜歡吃蟹，他們購買從天津運來的蟹，一向習慣以斤爲單位。今年卻有點特別，賣蟹的把蟹綁起來，四隻一串，說：「三公一母，整串帶回去，蒸炒隨意。」王、江、張、姚長期橫行霸道，如今被綁成串，成了「大閘蟹」，大快人心！（十一月二日香港大公

報）長期被迫害的畫家黃冑，就用這個題材畫了一幅畫，表示支持「除四害」的行動，人民羣眾這種欲食其肉而寢其皮深惡痛恨的心理不是當權者所能假冒得來的。

(3)安定團結，建設社會主義——清算「四人幫」黨內外羣眾要求安定團結，建設社會主義，實現四個現代化，是歷史的潮流。「四人幫」違反這一願望，所以當華國鋒清除「四人幫」立了功，就立即成爲新的英雄，得到政權。要保有政權，除了順着潮流走，沒有別的道路。統治階層複雜的人事鬪爭，人事可以有變易，（基於目前整個統治集團求安定的心理，華國鋒的統治大概不會成問題的）。但無論誰上台，誰抓權，要是違反這一歷史大流，就非垮台不可。所以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在最近時期內，將會有一個自文化革命以來，比較安定的建設時期。現實派的路線將得到貫徹。文革以來統治階層激烈的內部鬪爭將告減少，統治階層進一步團結，權力由第一代和平地移入第二、三代手中，官僚機構將進一步強化，新生特權階層和廣大人民之間的距離加大。隨着工業化的發展，附庸於統治階層的技術人員、工程師、知識分子的人數將更增加。但在這個黨官僚控制一切的制度下，這個階層只能附庸於統治階層，不可能反賓爲主地佔據主要的統治地位。國內方面的現實政策正在加速執行中，通過批判「四人幫」及其地方的追隨者破壞工農業建設正是這種政策執行的一個側面反映，把「四人幫」干擾和破壞造成的損失奪回來的口號，第二次農業學大寨會議和各式工業學大慶會議的召開，都是表現統治階層把經濟搞上去的努力。在文教戰線，批判張鐵生式的空頭政治，重新肯定及發行「園丁之歌」，都是將教育領上軌道的表現。文學藝術將從「四人幫」控制時候的乾巴巴而有一個較活潑自由的發展，批判「一花獨放」，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一些在「四人幫」當權時期被壓下去的電影、戲劇獲得解

放，若干被打倒批倒的作家、藝術家，已重新露面。但文學藝術爲政治（當權者）服務的原則不可能改變，創作的自由是有限制的，統治階層可以採用比較開明的政策，但對這方面的控制不會放鬆。而最能表達目前當權派意願的是華國鋒在第二次農業學大寨會議的講話和重新公開發表的毛澤東於1956年 4 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論十大關係」。「論十大關係」提出一個基本方針，「我們一定要努力把黨內黨外的一切積極的因素，直接間接的積極因素，全部調動起來，把我國建設成爲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現在將它作爲各方面的工作都要貫徹執行的方針，這就無形地用二十年前毛澤東的話代替他後期所提出的階級鬪爭爲綱，其餘都是目的說法。華國鋒在第二次農業學大寨會議上的講話，就將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作爲1977年的一項「戰鬪任務」。

我們再看廣大的人民羣眾，在「四人幫」爲首的「理想」派倒行逆施之下，國家經濟不得發展，他們生活沒有保證，種種爲了爭權奪利而推行的政治運動只是對人民的政治迫害，使他們過着膽戰心驚，朝不保夕的日子。在這種情況下，他們要求安定，要求現代化以發展國家的經濟，提高他們的生活，這種願望跟現實派有共同處，也因此當「四人幫」垮台，他們表現了前所未有的興奮，對未來充滿希望。無疑的，現實派的路線將滿足他們現時一些卑微的願望。統治階層已應允提高工資，增加物資供應。他們生活較有保證，而且隨着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得到某些改善。但這些些微的改良，並沒有改變他們被壓迫被剝削的地位，政治制度仍將保持，他們曾經在文化革命中一度獲得的自由民主的權利仍付諸厥如。當他們飽暖之後，他們要起來爭取主人的地位，將會碰到一個更堅固的統治階級，未來的爭鬪仍將艱苦漫長。

(4)外交政策——穩定路線的執行只是一個實現目標的方法問題，目標和原則不會更易，在這種穩定路線下，對外的政策不會和過去有原則的不同，但在執行方式上將有更大的彈性，更大的現實性。面對着蘇俄帝國主義者的威脅，必須建立國際反蘇共的統一戰線，在這統一戰線內，必須以第三世界國家爲同盟者，以第二世界國家爲友人，而對於美帝國主義，對於蘇聯的附庸國，則採用既團結又鬬爭的政策。中共的當權者，會執行一條以統治階層的國家利益爲主的現實外交政策，他將較過往減少虛僞的理想性，與蘇聯的鬬爭 ， 也可能在表面緩和的煙幕下尖銳地進行着！

中蘇矛盾的基本原因是蘇聯社會帝國主義，仍然承繼帝俄的擴張政策。自從彼得大帝定下帝俄的對外擴張目標，雖然經過改朝換代 ， 不論政權性質有如何的不同 ， 統治階層人事有如何的更動 ， 基本的外交政策並沒有不同。近百年來列強侵略，中國淪爲半殖民地，割讓租借了大片的領土。但隨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隨着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這些由英、日、德、法、美等帝國主義侵佔的地方，都紛紛歸回到中國的版圖。目前還有香港、澳門仍未收回，但這是由於軍事政治經濟利益的需要而爲中國政府所默許的情況下的一種「托管」性質的。誰都知道，只要情況改變，中國政府一個通牒，立刻可將這兩個地方收回 。 唯有給蘇俄侵佔的大片土地仍沒有歸回的希望。不單中國情況如此，俄國和蘇聯在東歐、北歐，在中央亞細亞被侵佔的土地在目前也是絕沒有歸還的希望的。六十年代以後，蘇聯已取代美國 ， 成了世界最大的最危險的帝國主義國家。蘇聯無限制地擴充軍備，威脅到他周圍的各國，威脅到世界和平。赫魯曉夫曾向毛澤東提議組織中蘇聯合艦隊以便控制中國領海，爲毛澤東所拒絕。他們在中蘇邊界上駐重兵，嚴重地威脅着中國 。 要知道，

以中國現有的經濟軍事的力量絕對不會構成對蘇聯的威脅的。中國還沒有力量通過武力來解決中蘇邊界的糾紛，更說不上去收回已失去的土地。而蘇聯，則在中國周圍形成包圍圈。

當然我們還要看到中蘇間的矛盾，不單是領土、軍事上，還有兩黨意識形態的鬬爭，以及在國家制度下，形成外敵以轉移內部矛盾等等原因。但領土 、 軍事是最重要的。意識形態的鬬爭是黨與黨的事，隨着毛澤東的逝世將日益減少。而敵對國家形成以轉移內部矛盾，則也不是一種必然的需要。蘇聯雖然目前在軍事上佔極大的優勢，中國不能進攻蘇聯，但蘇聯如發動侵略戰爭，中國不是沒有反抗自衛的條件。戰爭的發生只有兩敗俱傷，而不會單一方面得益。只有美國可以坐收漁人之利。在這種情勢下，大規模戰爭爆發的可能性不大。只要蘇聯的威脅消滅，雙方和解的可能性不會沒有的。和解有利於建設，無論中國當權者或人民都不會拒絕這一要求，一切只取決於蘇聯當局。

（二）清算「四人幫」的一些問題

(1)爭繼承權，爭正統——這次黨內鬬爭，雙方都是打着毛澤東的旗號來進行的。不論是「四人幫」掌握的宣傳機構還是華國鋒掌握的宣傳機構，都一再號召「學習毛主席著作，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大紅旗，就上層來說，可以看成是爭繼承權爭正統的表現，至於說「四人幫」假造毛主席遺囑「按既定方針辦」。早在九月十六日毛澤東死後一星期，兩報一刊的社論「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就提出了這句遺囑式的語錄。甚麼是「既定方針」？那就要看誰能代表毛澤東說話了。而能替毛澤東說話的人，自然就可將他的意願變成毛澤東的意願，則一個毛澤東死去，他的代表仍留在人間。有了「既定方針」這把尚方寶劍，對不順眼的人，「四人幫」都可任意宰割了。華國鋒手中

把握的，據官方發表是毛澤東在本年四月卅日寫給他的字條：「慢慢來，不要焦急」。「照過去方針辦」！「你辦事，我放心」！特別是後一句話，是作爲毛澤東要他作爲繼承人的「眞憑實據」。所謂閃耀着金光的六個大字。「四人幫」倒下來，他們的罪就是假造遺囑，迫害紅太陽。官方說，「四人幫」的名稱也是毛澤東定的，毛死前多次批評過「四人幫」，要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因而，連清算「四人幫」的行動，也可以算是秉承毛澤東意旨來辦的。最近召開的四屆人大常委會三次會議通過鄧穎超爲常委會副委員長一事，也說是毛澤東生前同意的。華國鋒在逮捕「四人幫」，就任中共中央主席及中共中央軍委會主席同時，即宣佈出版毛澤東選集，毛澤東全集，並建立毛主席紀念堂，而且，親自選擇在天安門廣場建紀念堂，親自奠基。華國鋒在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的講話，將「進一步把羣眾性的學習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運動推向新的高潮」作爲1977年中心任務之一，並宣佈姍姍來遲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將在下半年面世，這種種行動都是要說明華國鋒忠於毛澤東的路線，是毛澤東的眞正繼承人。這場通過爭正統來爭權力，通過爭權力，而得正統的活劇，是以江青失敗，華國鋒勝利而結束的。不論是江青還是華國鋒都是抬出毛澤東這個權威來壓人。這也是李一哲大字報所指斥的「天才史觀」——「無限崇拜『天才』，絕對忠於『天才』，一切照『天才』意思辦事，誰反對『天才』就打倒誰」，當這個「天才」還活着，有了「天才」作靠山，「四人幫」可以胡作非爲，當「天才」倒下去，誰抓到權力，誰抓到正統，誰就可以替「天才」說話了。李一哲說「任何一個大人物只要他宣佈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化身，他便從此成爲神聖不可侵犯的了」，一語中的地道出這種爭正統的心理。爭正統，爭繼承權是封建皇朝權力轉移的特點，在中國史不絕書，那是政治制度

的毛病而產生出來的現象，不想竟出現在七十年代號稱社會主義的中國！中國社會的封建性是很明顯的。

如我們所分析的，「四人幫」不論在中共黨內外都沒有羣眾基礎，只要通過民主的方式，只要羣眾的意見能夠表達，「四人幫」的垮台是必然的事。但這次清算「四人幫」，不是採取自下而上的民主方式，而是採取了上層宮廷式政變。在理論上不採用民主的選舉，而採用爭正統，採用毛澤東的遺言等等，在在都說明整個制度本身的問題。華國鋒之就任主席，也沒有依照黨章的規定步驟，（黨章並沒有規定主席死後，職位由第一副主席繼任），只是先將反對派抓起來，在沒有反對派參加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中通過，而不是先通過十屆三中全會作決定。總之，大家都打毛澤東的旗號喊三要三不要，但實際上，搞的還都是陰謀詭計。要是眞正通過民主的方式，「四人幫」固然要垮台，但登台的大抵不會是華國鋒！華國鋒現有的地位，還不是通過正常的手段獲得的。

(2)泛道德主義的政治——「四人幫」垮台，批判「四人幫」了。「四人幫」迫害紅太陽，迫害周總理，迫害老幹部；「四人幫」阻礙工農業生產，阻礙國防的現代化，阻礙對外貿易，阻礙科技文教工作的發展。「四人幫」要負擔起文化革命以來種種的罪過，也是理所當然的。但批「四人幫」，卻不敢涉及產生「四人幫」的社會基礎，產生「四人幫」的制度；不敢涉及和「四人幫」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毛澤東，當然難以談到批深批透。爲了批臭「四人幫」又不致涉及本質的問題，於是祭起歷來在鬬爭中常用的法寶，從人格上搞臭！於是我們看到江青們的私生活是何等墮落，無法無天，作威作福，欺壓人民，無限制地揮霍國家資財，好看黃色電影，男女生活也是一筆糊塗帳。而且個人歷史又很有問題。總之，這些揭發出來的東西，是可以寫出滿滿一本大書，而寫出來的還不過是

其中的點滴。通過這些揭發，我們看到江青一伙的醜惡靈魂，我們看到中國的確有一個新生的特權階層。同時也給我們畫出特權階層生活的一個側面。當權者利用社會上普遍存在的「泛道德主義」的意識，認為私生活有問題的人，政治上一定不好。他們將這意識強化，變成了那一批人政治有問題，是因為他們私生活不好的緣故。而私生活不好，是有憑有據的，於是似乎功德圓滿了，一切都得到完滿的答覆。但這只是表象，我們要進一步追問，造成這種生活的原因在哪裏，是甚麼給這種生活提供了可能性？為甚麼一切垮台的高層領導幹部，最少是他們的大部份，私生活都有問題？而且在同一制度之下，處同一環境，為甚麼沒垮下來時，那麼道貌岸然，一垮下來就幾乎都是那樣醜惡不堪？然則現在當權的人的私生活就不成問題麼？

(3)個人崇拜的萌芽及其危險 —— 從統治階層爭正統的心理，利用強化泛道德主義，在社會生活方面擺出道學的面孔，以及我們代序中提出的家族主義，處處都可以看到這個自命為革命的中國共產黨，最少是他們的很多上層領導份子，不論是「理想」派，現實派，在意識上是如何地相似和落後，都是充滿了封建的宗法思想。李一哲將這社會稱為「封建性的社會法西斯」，是多麼貼切啊！

如上所述，和以往的政治鬥爭相似，這次的政治鬥爭也沒有涉及到制度和社會基礎的問題。清除劉少奇，清算林彪，基本制度沒有改變。有的便是權力愈來愈集中，個人獨裁愈來愈嚴重，乃至造成了個人崇拜，強化了個人崇拜。這次清除「四人幫」，華國鋒除了原有的總理外，又擔任中共中央主席和軍委會主席，集黨軍政大權於一身，比毛澤東在生時有過之而無不及。在毛澤東死後一段較不安定的日子中，這種權力集中，以應付非常的事變或有好處，但它產生的弊端則不可估量。華國鋒沒有毛澤東的經歷和資望，他的突起是很多偶然因素形成的。他就不可能有毛澤東般至高無上的皇帝式的地位。他還不是黨的理論家。他還不能不照顧到黨內各種勢力的要求，因而多多少少有一種集體領導的需要。但在現有黨章憲法下，在現有制度下，集體領導恐怕只是一個過渡，領袖在地位未鞏固時難免要借助他人，但一旦地位鞏固，則現有的制度只能形成獨裁。而且共產黨的理論的絕對化也是獨裁的基本因子，以為世界有絕對眞理，以為人類社會有絕對的發展的規律，以為工人階級是最進步的階級，而共產黨又是工人階級的先進份子，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既然共產黨掌握眞理，把握了人類歷史發展的方向。那麼共產黨內部自然有更先進的領導，而有一個代表黨的，永無錯誤的，英明的領袖，這就難免要發生個人崇拜，產生個人獨裁。個人崇拜和個人獨裁是雙生子，彼此互相強化的。斯大林、毛澤東正是這種制度這種理論下產生出來的「典範」。

現在華國鋒高高在上，宣傳機器已開動起來搞華主席的個人崇拜了。華國鋒通過政變當上主席還不夠一個月，解放軍報即發表「華主席是我們黨當之無愧的領袖」的社論，全國報刊立即轉載，又紛紛發表了回憶華國鋒過去工作的歌功頌德的文章及照片。華國鋒成了「英明的領袖」、「敬愛的領袖」、「全軍統帥」。已有數不清的歌曲，詩歌來讚頌華主席「胸懷廣闊，大公無私，光明磊落，謙虛謹慎，作風民主，平易近人，密切聯繫羣眾，關心羣眾疾苦。善於團結大多數同志一道工作。」他除「四害」的行動則是英明果斷，又借羣眾的口：「毛主席說放心，我們一萬個放心！」將全國工作的成績，都說成華國鋒英明領導的成績了。現在寫文章已要引用華主席的話了，華國鋒的巨幅彩色「標準像」已佔了報刊的整個版面，中共報刊以前載毛主席語錄的位置，也已出現華國鋒報告的摘錄。這種個人崇拜是個人獨裁的溫床，在這種氣氛長期

培育下，一個新的毛澤東在中國出現，不是不可能的。這是中共黨和全國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不能不密切注意的事實。

清算「四人幫」，只涉及誰是毛澤東指定的繼承人，將政治鬭爭變爲爭正統的爭論，一切都取決於毛澤東權威而非合法的制度；清算「四人幫」只涉及垮台者的私生活，將政治鬭爭變爲道德的問題；清算「四人幫」涉及在政治、軍事、外交、工農業、外貿、文教科技工作的方式問題。本來是一場廣大人民羣眾和黨員對「理想」派的鬭爭變成了一場上層的權力鬭爭而將羣眾排除在鬭爭之外，只允許他們依當權者的指揮棒去搖旗吶喊。還是那樣不是羣眾運動，而是運動羣眾的做法。使這次的鬭爭不能涉及到本質的問題，不能涉及「四人幫」眞正的社會基礎和形成「四人幫」的社會制度的問題。江青一伙，固然搞陰謀詭計去奪取政權，置人民利益於不顧。即華國鋒等，也不依照合法的途徑而獲得領袖的地位。「四人幫」倒了，形成「四人幫」的制度並沒有改變；「四人幫」倒了，「四人幫」那種開「帽子工廠」以棍子打人，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的作風並沒有改變，「四人幫」倒了，他們那種開「鋼鐵公司」唯我獨左，唯我獨尊的態度並沒有改變。華國鋒等打倒「四人幫」，固然比較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符合歷史的發展潮流，但由於政權沒有本質的變化，這種進步性是有限的。當然我們同時也要看到當前的政權雖有落後面，但也有一定符合中國人民利益的地方，況且目前還沒有新的力量足以取代。而且落後的意識形態，也不是通過一次暴風驟雨式的大革命就能淸除的，那是要通過社會形態的改變和文化批判的努力，而這些都需要一個較長期安定的環境。對於目前的政權，我們站在人民利益的立場進行批評和鬭爭。那麼今後鬭爭的方向在那裏呢？

（三）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

(1)革命與改革——革命是一場自下而上的羣眾運動，而改革則是由上而下，通過行政組織，推行政令達成的。統治階層的改革是被國內外形勢迫成的 。 國內羣眾的願望，以及由這些願望而產生的種種運動，常是改革的動力。因而改革中常有羣眾要求的因素，或即革命的因素。歷史上改革和革命常是交錯進行的。革命的形勢促成統治階層改革，而改革不能充分實現常觸發革命。那麼，當前中國究竟處在一個怎樣的歷史時期呢？中國大陸當前的情況是舊的階級被打倒了，新的官僚階層在成長。這個官僚階層是現有的制度下的必然產物。他們掌握了黨和國家的權利，統治黨內一般黨員 ， 又通過黨和政府來統治全國人民。我們看到在這官僚階層內 ， 還有一些革命幹部仍抱着爲共產主義奮鬭的目標要爲民請願，要推翻這個官僚階層。但在現有制度下，這種行動只能使他們自己被排除在這階層之外。要改變這種制度，沒有一次眞正的革命是不能成功的。但放眼國內外，目前還缺乏這樣的形勢。二十世紀的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變化使這兩種勢成水火的制度愈來愈接近。本世紀初代表人類希望的共產主義運動，經過半世紀的實驗已使到越來越多的人對它失去信心。資本主義受到共產主義的挑戰所作的反應又使它增強了生命力，通過大革命在人間建立理想社會的可能性已受到懷疑。歷史提供的教訓是革命目標實現的可能性是未知數，而一點一滴的改進的結果或更可期。特別是人類現時還未能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制度下提供更能吸引人的奮鬭目標及其可具體達到的方法，人們甚至懷疑有沒有這種目標？而其達到的路徑也還是一步步踏向前而非跳躍式的。因而我們可說目前中國處在一種由羣眾推動改革的形勢之下，當然改革要在一定的民主基礎下才能進行。獨裁的制度下，革

命是會爆發的，是必要而且也是必然的。那麼中國目前改革之是否可能成功？會否演變成一場革命？都要看羣眾的力量和當權者的作爲了。

(2)關於民族主義與國家——有人以爲二十世紀是共產主義的世紀，其實是一種表象的看法。二十世紀是民族主義的世紀。共產主義與民族主義原則衝突，戰勝的永遠是民族主義。共產主義運動在很大範圍內是通過民族主義來實現的。當代的共產主義者，最少他們的大多數，無非是披上共產主義大衣的民族主義者。共產主義運動，無非是借以達成民族獨立，民族強盛的手段。在這國與國間的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野蠻世界裏，沒有獨立的國家，一切進步都不可能。改革也只能在獨立的國家進行的。在這一國際形勢下，本國統治階層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常是交雜在一起的，這就使得同一國統治者的利益並不一定與人民的利益對立，他們間是有對立有統一的。國與國間的狀態割裂了人民，也強化了政府。也因此統治階層常常運用國外的壓力以轉移內部的矛盾。現時 ， 除了正在爭取獨立的國家，民族主義起着進步的作用；對已獨立的國家，民族主義已造成人類歷史進步的障礙 。 但因爲國家發展的不均衡，國家間的無政府狀態，民族主義是發展較慢的國家和人民藉以自保的工具。因而在目前情況下，民族主義雖然愈來愈表現出它的落後性，但除非世界經濟有較均衡一致的發展 ， 則否去掉民族主義只是增強帝國主義侵略的藉口。何況民族間的文化歷史風俗習慣的差別也不能不顧及的。民族主義國家的問題，只能通過人類歷史的自然發展去消除。這種情況就使革命更受限制，而改良的主張成爲民主獨立國家進步的主流。

(3)關於官僚制度——打倒官僚制度是我們這時代的呼聲。本世紀六十年代世界的青年運動主要的目標就是打倒官僚制度 ， 但這個運動並沒有達到目的。其實 ， 任何有組

織的活動，不論是政治、經濟、文化的活動都有制度，組織就是制度。制度強於個人，甚而制度強於他的組成分子的總和，它已獲得生命力，在這情況下反賓爲主，官僚制度於是確立了。打破官僚制度需要組織，建立新的制度。於是形成了打倒舊的官僚制度，建立新的官僚制度，趕走舊官僚，迎來新官僚的現象。這是很多歷史的事實所證明的。更徹底推翻官僚制度除非是不要組織。但組織正是人類社會的特徵，人類社會賴以發展的方法之一。更何況，根據我們上面的分析，在目前情況下國家不能消滅，而國家是一個最大最堅固的組織 。 國家組織必然產生官僚制度，官僚羣而形成官僚階層。世界各國都有官僚階層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明白了官僚階層的客觀存在，在目前情況下，我們就不能單純的否定官僚制度。研究的倒是如何減少官僚制度的弊害，限制官僚制度的權力。限制官僚制度的權力，使它不能侵犯個人的基本權利，又使它不能違背到它賴以存在的大多數人的意願，而最終使它不能違背構成它的人的基本目的。而且它的存在與否是取決於它的對象的大多數。爲着達到這項目的，至目前爲止，人類社會找到的方法是民主。民主是官僚制度的消毒劑。就中國來說（還有某些其它共產國家），官僚階層不單掌握了所有的政治權力 ， 也掌權了經濟的支配權 ， 成爲一個特權階層，與人民形成一個統治和被統治的關係，壓迫和被壓迫的關係，剝削和被剝削的關係了。因而對中國人民來說，不單需要以民主來監督官僚制度，而且要通過法制來限制特權。這也就是李一哲大字報呼籲「四屆人大應當明文規定限制特權的條文」的原因。

(4)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我們回頭來看中國的問題。今日的中國，舊的剝削階級被打倒了，新的官僚階層成長起來。這個階層的利益與中國人民的利益有矛盾，也有共同之處。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後權力鬬爭有反覆，但基

本的走向是個人獨裁與個人崇拜之相互強化。這種強化以文化革命後期達到高點 。 而且通過中共九大、十大的黨章，四屆人大的憲法規定下來。黨內缺乏民主，黨外缺乏民主，毛澤東已高高駕凌在整個制度之上，成了打傘的和尙，達到了無法無天的境地。在這種情況下，已沒有正常的政治生活，也因此產生了林彪，產生了「四人幫」一式的人物。中國目前無論國內國外，都缺乏一個革命的形勢。作爲官僚階層中堅的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人民的獨立，統一及社會改革方面都有貢獻。自從反右、大躍進以來，他們已愈來愈成爲阻礙中國歷史進步的力量，但那是跟個人獨裁在黨內愈來愈佔上風分不開的。個人獨裁只能毀滅這個曾有貢獻的黨。個人獨裁只能毀滅有悠久文化傳統的國家，而獨裁者最終也只能自我毀滅。今日，無論就統治階層而言還是就國家前途人民利益而言，李一哲所提出的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是一個要努力的目標。這裏所謂社會主義 ， 就是保證生產資料的公有國有 ， 而不被私人壟斷。在這個前提下，只有法制制壓之下，才可能限制個人凌越於黨，凌越於國家之上，才能保證搞陰謀詭計的野心家不能爲所欲爲，保證權力不至於過分泛濫。眞正能夠保證法制的實施，是要使法律不成爲具文的，在黨內，是黨員的民主權利，在國內，是人民的民主權利。唯有法制，才能保證民主的權利，唯有民主，才能保證法制的眞正實現。甚麽是法制？法制是黨法、國法。當前所指的法制是黨章、憲法。目前十大的黨章，四屆人大的憲法都是個人獨裁時代的產物，中共中央黨主席權力過分膨脹，黨法高於國法，但畢竟是有「法」，有個遵循的根據。當然，這些「法」不是一成不變的，隨着黨員和全國人民的民主要求，這些「法」就應得到合理的修改。在一個法制民主的社會下，改革才能實現，進步才可期待。我們所批評的種種不合理的現象和意識，隨着經濟的發展，文化的提高才

得以慢慢消除。在這種情況下，官僚制度由人民監督，官僚階層的特權才能漸漸減少，乃至完全失去特權而成爲人民間的一分子。他們也將共享着社會的進步繁榮，共享民主自由的果實。這在一個尖銳的階級對立，充滿矛盾和鬪爭的社會中是享受不到的。在那樣一個社會裏，特權階層無法無天，但一旦在權力鬪爭中失敗 ， 失去的不單是特權，也包括他們的政治甚而是肉體的存在。而且，他們要面對着人民羣眾革命的烽火，時刻膽戰心驚地等候本階級的滅亡。

我們指出中國目前還缺乏一個狂風暴雨式以推翻政權爲目的的大革命的形勢。統治階層這次清洗「四人幫」，已是順着歷史的要求，要是能夠推進一步，實施法制和民主，以清除產生「四人幫」式野心家的土壤，繼續推動歷史的前進，則中國共產黨仍將在國家生活中起大的作用，無負它過去有過的革命精神 。 要是統治階層推翻「四人幫」的行動只是一次內部奪權的鬪爭，新的野心家繼續出現，（我們已看到過分突出領袖地位，個人崇拜的兆頭）少數統治者與黨內羣眾和全國人民的矛盾將日益尖銳而形成一個革命的形勢，則他們將和形形式式的古今中外的反動統治一樣，給人民羣眾革命的風暴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社會主義的法制與民主的要求是今天中國歷史的大流。我們號召中共黨內的革命黨員和全國人民一道在社會主義的路線下，爲爭取國家、黨內的法制民主而鬪爭。法制民主不是上天的賜與，只有通過長期不斷的鬪爭，人民羣眾才能有望獲得他們應有的權利。

（四）關於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

(1)「四人幫」的黑後台就是毛澤東——在代序中我們指出李一哲大字報所指斥的林彪體系就是毛澤東體系，現在我們可以進一步說，「四人幫」的黑後台就是毛澤東。現在

對「四人幫」批判的文章最愛引用魯迅一段話：「拉大旗作爲虎皮，包着自己，去嚇唬別人；少不如意就倚勢；定人罪名 ， 而且重得可怕的橫暴者」。用這一段話來描繪「四人幫」所作所爲，可謂入木三分 。 但我們要問所謂「大旗」，所謂「倚勢（！）」所指的除了毛澤東還能是誰？江青一伙拉着毛澤東思想的大旗，倚着毛澤東的勢，所以能夠在黨內外都非常孤立的情況下，爲所欲爲，玩權弄法。毛澤東死後，江青等即成爲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立刻垮台，正充分說明這一點。劉少奇、林彪之反毛，使毛澤東對黨內的高級幹部完全失望。文化革命羣眾運動的興起 ， 又使毛澤東對青年知識分子中培養接班人失卻信心。個人崇拜的加深 ， 毛澤東的個人獨裁愈來愈嚴重。他的晚年，一切的政令只憑他的指示去辦，中共中央委員會、政治局、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府機構都完全失去職能，他也變得愈來愈孤立。能夠信用的只有以江青爲首的幾個人。毛澤東有意將他們培養成接班人，以便自己死後，能由他們承繼大業的意圖是很明顯的。天安門事件後，毛澤東已由全黨的領袖，墮落成黨內某個派別的頭頭，完全站在大多數黨員和人民羣眾的對立面了。但他長期培養出來的威望仍在，權勢仍在，他又是黨的主席，大家是不敢怒也不敢言。指斥「四人幫」背叛毛澤東只是在爭正統的心理下，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的說法。沒有毛澤東精心的培育，「四人幫」何能成氣候 ？ 毛澤東若眞不喜歡「四人幫」，只要一聲令下，即可徹底地將他們淸除出黨和政府之外的。「四人幫」是毛澤東的嫡傳正是無可懷疑。

(2)華國鋒等代表毛澤東較現實一面——那麼是不是華國鋒等叛離毛澤東呢 ？ 華國鋒是由毛澤東親自提拔到中央工作的，在開始時相信也得到「理想」派江青等的信任。但憑他的工作經驗，他會明白到「理想」派的所作所爲是危害了黨和國家；憑他的政治嗅覺，他會感到「理想」派的

非常孤立。在毛澤東有生之年，「理想」派得到毛澤東的寵愛，他不單不能有任何不滿的行動，而且憑借「理想」派的援引，坐直升機上中央。毛澤東去世了 ， 不論爲個人、爲黨和國家的利益都要除四害。照「理想」派那一套搞下去，不只他個人要垮下來，還要將整個制度搞垮。要知道，毛澤東畢竟是個十分現實的政治家，搞垮現有制度也不是他所能允許的。他畢竟也是現有制度的產兒。要是毛澤東看到由於「理想」派的作爲，政權有崩潰的危險，則毛澤東自己也要「除四害」的。但只要有毛澤東在政權有個安定的重心， 「理想」 派可以有時間來搭起自己的班子，漸漸向現實派的路線轉化，則制度雖受衝擊，還不至於整個垮下來，但毛澤東死後，制度安危已不能繫在一個人身上，「理想」派的作爲自然要引起制度的分裂乃至覆滅。因而，我們可以說 ， 江青一伙代表毛澤東的主觀願望，而華國鋒等代表毛澤東對客觀現實的反應。如代序所論述，江青等較多地代表毛澤東的理想性部份，這些理想在現實制度下，少有實現的可能。在毛澤東的晚年，這部份已被歪曲，成了爭權的工具。華國鋒以「理想」派所信任的人，由於現實的需要與現實派合流打垮江青等，正代表一種現實的，符合這制度的利益，也可以看成這制度本身一種保護性的反應。他使制度在毛澤東死後得以正常運轉，當然也代表了毛澤東的利益 。 這只是就理論上來說的。其實晚年的毛澤東已完全脫離現實，而所謂理想又愈來愈少眞實的內容，成了「理想」派奪權整人的籍口。江青等的垮台正是晚年毛澤東的失敗。華國鋒上台後發表了毛澤東的「論十大關係」是表明承接五十年代毛澤東的事業 。「論十大關係」成了各方面工作都要貫澈的基本方針，就是對六七十年代毛澤東的否定，以早期充滿現實性的毛澤東，去否定無視現實，帶着虛假理想性的晚年毛澤東。在某一方面來說，是早期的現實性的毛澤東的勝利。

作爲中國共產黨理論基礎的毛澤東思想，本來就只是堆雜亂的湊合物而不是一個有系統的理論 。 因而江青可以用它，華國鋒可以用它，甚至是反毛的人也可以用它。正是由於它各種方面應用的可能，又加以毛澤東長期的神化宣傳，和法律的規定，因而毛澤東思想仍將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統治全國全黨。當權者可依自己需要去選擇適合自己的話說，作適合自己的詮釋，毛澤東自己也預感到這一點，他在1966年 7 月 8 日給江青的信中說：「右派可能利用我的某一些話得勢於一時，左派則會利用我的某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信中說「人貴有自知之明」。其實他是既有些自知，又有些不自知。中共不同的派別利用他的某些話做自己的事 ， 其中本就談不上「左派」，「右派」之分，至於左派（譬如江青）打倒右派（譬如華國鋒）之說更是一廂情願。他倒不虛心檢討爲甚麼自己的言語「左派」「右派」都可以利用。

(3)肯定毛澤東思想及其對未來的影響——現在華國鋒打垮「四人幫」承繼大統了，使制度得以鞏固，也無負毛澤東的期望。華國鋒以毛澤東的學生自居，將高舉毛澤東思想的紅旗 ， 利用毛澤東的權威來鞏自己的地位。畢竟，毛澤東思想已與這一制度有千絲萬縷 ， 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況且，沒有毛澤東的毛澤東思想可愛得多，也隨人意得多了。而當前中共黨內也沒有足以代替的思想，我們可以預定毛澤東思想將有較長的時間，存留在現制度中。不論誰起來當權，利用它總會有利的。中共黨最少暫時不能脫離毛澤東思想，和華國鋒爭正統的事實多少限制了未來的演變，由於對毛澤東歷史的肯定，毛澤東生前所定下的教條，可在執行方式上有彈性，但不可能明目張膽地違反 。 毛澤東生前在正式場合所親自肯定或批判的事件人物，不可能正式翻案，毛澤東對中共黨史對中國歷史乃至世界史的所作的正式評價，也不可能大幅度的改易。因爲

誰抨擊毛澤東，誰就是抨擊毛澤東的繼承人；誰就是抨擊這個制度的路，如大躍進、三面紅旗之類，還是要加以掩飾的 。 毛澤東個人崇拜和個人獨裁對這制度所造成的禍害，自然不好提起。毛澤東所損害的個人，也不好公開平反。對「四人幫」的清算只能限在一些表面的現象，不能深加挖掘，追查歷史問題也是有限度的。毛澤東的幽靈，還將長期徘徊在中國的大地上。也只有在社會主義的法制和民主充份實行下才能正確評價毛澤東在中國歷史在中共黨史的地位。只有脫離毛澤東思想的框框，對中國近代，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的歷史、事件和人物，才能有正確的客觀的評價。中共黨才能脫離封建性、宗法性、寡頭專制的危險，從而進一步推動了社會主義，法制的確立和民主的實施，中共黨才能在中國歷史乃至人類歷史上有眞正的貢獻。

（五）關於本書的幾點說明

對於代序，我們保存本來面貌不加改動，新得到的某些資料，是以註的方式出現的。正文的註增進新資料，也加以說明。（此次中文再版本爲着避免重排版，新的資料在再版後記中說明），年表原來只作到1976年 4 月 6 日，現在加以補充到執筆之前。新增入「我們要吶喊」一傳單，這是於1976年三月間，由北京寄到香港的。傳單揭發出一個驚人的消息，說周恩來並非死於癌症，而可能被謀殺！這張傳單四月間抵香港，竟沒有報紙雜誌敢予發表，如此一直凍結到七月，才在法國報紙刋出，同時由法新社發出電訊，全世界也只有個別報紙簡略引用。直到「四人幫」事件發生後，香港「黃河」第二期（1976年10月）發表全文，南北極（總第77期，1976年10月16日出版）發表影印本和陶君的論述文章，但也在社會上並沒有引起反應。其實這宗疑案對了解天安門事件，對了解「四人幫」的垮台都有極

大的價值。周恩來夫人鄧穎超女士最近談他在周恩來死後怕江青迫害，隨時準備步周後塵那種膽戰心驚的生活，多少加強了這張傳單的眞實意義。它既然能流到香港，必然在國內有較廣泛地流通。傳單內容眞假是另一問題，但刺激無法了解內幕的廣大幹部和羣眾的情緒則一。要是傳單所述是眞的，我們發表出來，正可使沉寃獲得昭雪，重新去看這一段期間的歷史，則恐怕朱德的死也是可能成問題的。要是傳單內容是假的，也可給我們看到從周恩來死後到天安門事件這兩三個月政治鬭爭的激烈，如何達到不擇手段的地步了。（因爲這傳單已在香港發表過，所以本書中文版就不再拿它作附錄）

（六）致日本讀者

這篇序言是爲日本讀者而寫的。中日兩國在歷史上，有極親密的聯系。但近百年來，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所造下的罪惡，罄竹難書。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還有少數日本人在做「大東亞共榮」的美夢，拚命去粉飾侵略戰爭，歪曲戰爭的本質。絕大多數的日本人愛和平，希望跟中國人民恢復友好親善的關係，社會上也普遍關心中國發生的事變，並抱以同情的了解。但他們往往將中國政府的作爲，看成中國人民的願望，因而盲目去支持。特別是新聞報導方面，只隨着官方宣傳機構的指揮棒轉，變成當權派的喉舌，失卻它的獨立性，客觀性。給日本人民提供了不正確的宣傳性的新聞，幫助中國政府欺騙日本人民，也違反了中國人民的利益，失卻友好的本義。我們要將人民和政府分開，政府跟人民，有矛盾有統一，利益有相同，有相反。要是只跟着當權者團團轉，作了當權者的傳聲筒，就不免有時要跟人民利益起衝突。就像將天安門羣眾的自發性的革命運動照官方的要求說成是一個有組織的反革命事件，就是歪曲事實了，就是反對中國人民了。我們懇切地要求有良心的日本人在談述中國事態時，時時以中國人民，而非以當權者的利益爲念。要知道，當權者可以更易，人民的利益才會永久不變。眞正對中國友好，是對中國人民友好，對於中國政府，中國共產黨都必要保持一定距離，有條件地讚揚，有條件地批判。這種友誼才不是功利主義，才得久遠。

本書如有助於日本人民了解最近中國所發生事態於萬一，將是我們最大的願望了。在本序言結束的時候，讓我們共同向中國政府要求：澄淸周恩來總理的死因！爲天安門羣眾平反！釋放李一哲們！按照中國人民的願望，實現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

1976年除夕初稿

從李一哲大字報到天安門事件

關於李一哲大字報

「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大字報是由李正天、陳一陽、黃希哲三人討論，由李正天執筆寫成的。依次序取他們姓名中一個字作代表，所以大字報的作者署名李一哲。陳一陽、黃希哲都是中學畢業生，文革時是紅衛兵組織的活躍份子，後來下放農村。黃希哲後來又被調返廣州當工人。李正天生於1944年，武漢市人，住在廣州，是「廣州美術學院」(現稱「廣東人民藝術學院」)油畫系1966年屆畢業生。文革時是廣州紅色造反者總司令部副宣傳部長，帶領一個班子，專負責撰寫理論性的大字報。他後來脫離「紅司」司令部，成爲當時紅司「吶喊兵團」獨立組織頭頭。「紅司吶喊是由大中學生和青年工人組成的，影響力很大，主宰了廣州運動某一方面的動向。當時開了許多辯論會，深入到農村、工廠、中學、大學，影響相當廣泛。」(引自「大陸知青座談會」，「南北極」，第65期，1975年10月16日)「『吶喊』兵團除了獨自『作戰』以外，常與紅衛兵第三司令部的『勁草』以及紅衛兵新一司『虎山行』戰鬬隊合作，成爲廣州地區『極左』思潮的先驅。當時，廣州永漢北路(今北京路)是高水平大字報的集中點，各有『地盤』。而紅司『吶喊』的大字報是最吸引人的，除了其觀點使人側目以外，那手美術字體的毛筆

字及刊頭設計都特別醒目，所以廣州居民對『吶喊』兵團印象甚深。」（引自汝褅：關於「李一哲」，明報1975年11月27日）1968年7月27日「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清華大學。8月間，工宣隊、貧(下中農)宣隊陸續進駐全國各級學校，在軍隊支持下，將1966—8年畢業生分發上山下鄉，並清理左派頭頭。李正天等三人同被廣州警備司令部拘捕，參加警司辦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等於變相坐牢）黃陳兩人於68年底釋放下鄉，李正天因爲問題嚴重，一直被拘留三年，71年林彪事件後被放回美術學院。返美院後拒絕分配，要警司說出叫他坐牢的原因。說他不能背着反革命的黑底去被分配地區。他終於被留在本校當圖書館管理員。當時全國搞批林整風，廣東省革委會主任趙紫陽召集前造反派頭頭開會，動員他們推動批林運動。李正天出席會議，即席批判林彪餘黨，並爲自己翻案。1973年8月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周恩來的政治報告宣稱：「最近我們還要舉行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李正天即聯絡陳、黃兩人，寫這張「獻給毛主席和四屆人大」的大字報。初稿成於1973年9月13日；三個月後，12月12日完成二稿。初、二稿大概都曾在機關內部貼出，但沒有造成巨大的影響。十大之後，中共大力開展「批林批孔」運動，李正天等積極投身運動中。他和陳、黃兩人借到廣州市立新北路442號三樓大廳作爲討論和書寫大字報的地方。1974年4月間，李一哲依規定向省委運動辦公室備案並貼出大字報「廣東怎麽辦？」，「提出生產停滯、青年外逃、特權成風、沒有民主等現實問題，猛烈攻擊『林彪體系』，要求徹底肅清廣東的『林黃分子』」（引自「李一哲大字報論集」，頁150—151）。這張大字報在羣眾中引起熱烈的反應，因而受到當時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趙紫陽及廣州軍區司令員許世友的重視。由於大字報論點鮮明，富革命性，眞正表達羣眾的願望，受

到羣眾的擁護，對運動的開展有很大的幫助，趙許兩人每星期三接見李正天，聽取他對羣眾反映的報告，表示支持。李正天等在這時期寫出了一連串大字報，發表了很多演講。李一哲的大字報都張貼在廣州市北京路口和中山五路交界處，是全市最熱鬧的地方。李一哲的大字報吸引了大批羣眾圍觀，途爲之塞。數路經該處的公共汽車，都要繞道而行。他們的大字報水平高、文字好，又有插圖，堪稱圖文並茂，十分引人注目。特別是李正天，口才好，有理論，分析深刻，演講會中常獲得掌聲。正由於他們傑出的表現，正由於敢於提出「林彪體系」而予以無情的批判，與文革中被壓的羣眾、幹部有一定共通的觀點，因而得到各方面熱烈的支持。

在「批林批孔」運動高潮時，爲了進一步了解「林彪體系」在廣東造成的災害，了解羣眾對運動的反應，趙紫陽指示廣東省委機關報「南方日報」，任命李正天爲「社會問題調查員」。李正天即組織調查組，赴各地蒐集林黃集團的血債資料。調查報告的部份曾在「南方日報」發表。大字報中指出，在「林彪體系」時期，「僅廣東一省被殺害的革命羣眾、幹部就近四萬人，被關、管、鬬的革命幹部、羣眾上百萬人。」是有調查作根據的。所以宣集文對這大字報的批判，不敢觸及這一點。這次的社會調查工作，使李正天等得以搜集資料，充實這張大字報。據說，在他們寫作過程中，參加意見的有兩百多人，其中包括「批孔」理論家楊榮國。1974年11月7日李一哲大字報寫成了定稿，修改正文前五部份，重寫了第六部份，又加上一個回答批評的序言。1974年11月10日在廣州市北京路口貼出，整個大字報用67張白報紙寫成。李一哲大字報上街，是曾備案，經批准的。李正天奉命每隔數日向趙紫陽滙報羣眾的反應。

李一哲大字報轟動廣州市，市民圍觀，水洩不通，車輛改

道。入夜還有用手電筒照着讀的。大家爭相抄錄，四處流傳。李正天又募集紙張，油印散發，因此流傳範圍相當廣泛。大字報空白處，寫滿了「好得很！」「好！」「說出眞正問題！」「表達了人民的聲音！」「向李一哲學習！」「向李一哲致敬！」的讀者批語。而且掀起了一陣擁李和反李的大字報論戰熱潮。代表人民羣眾的擁李派佔盡上風。

李一哲大字報理直氣壯地批判林彪體系在社會上引起強烈的反應，廣東方面將大字報呈送中央，要求定性。李先念親自披閱，作了「反動透頂、惡毒至極」的批語。據說中央曾派紀登奎到廣州處理此事，亦將李一哲大字報定作反革命事件，下令全市批判。據說，那時候李正天被看管，陳一陽逃匿，王希哲「上京告狀」。本文後面所附的是官方最重要的批判文章，1974年12月3日以大字報形式貼出，署名「宣集文」，即是說：「廣東省委宣傳部集體創作的文章」。文章經多人之手，拼湊而成，不大黏合，讀時是可以感覺得到的。官方將此文與李一哲大字報印成小冊，發至各單位供批判參考。廣州市委也有一篇批判文章。據說中共中央政治局曾召開工作會議，討論此一大字報，並印發給中央委員批判。74年底中共中央召開省委書記擴大會議，李先念談到社會上出現的極左思潮時說：「全國各省都有此一思潮，以廣東李一哲爲典型。」會中河南省委書記劉建勛表示：「河南找不出李一哲大字報這樣高水平的反面教材」。趙紫陽在未離廣州時，在省高級黨校作了批判李一哲大字報的動員報告，對高年級學生說「若批不倒李一哲大字報，不准畢業。」74年11、12月間中山大學組織哲學系三、四年級工農兵學員百多人批判李一哲大字報，先是每人寫一篇批判文章，又從其中挑出60篇，再精選出20篇，在中大操場開批判會。據參加者回憶，當日設兩講台，各有擴音器，採用辯論形式。參加批判發言

的在一邊，李正天在另一邊，背後有兩個彪形大漢「保護」。李一哲並沒有停留在已寫的大字報上，而是就基本論點作引伸，針對最近社會上發生的事作批判，滔滔不絕。發言過程中常因言詞激烈，被「保護人」強按下去。中大學員們因奉命唸批評文章，照本宣科，造成了兩不相干的辯論局面。由於此次批判會辦得十分不光彩，中大當局接着又安排第二次批判會，邀請工人參加，由老工人憶苦思甜，控訴舊社會罪惡，回憶過去悲慘生活。李正天十分感動，站起來很沉痛地說：「老伯伯，我們貼大字報，搞批林批孔，正是要防止舊社會的悲劇重演。要是不將林彪體系批倒，中國人民又將回到舊社會中。」老工人連連點頭說對，搞得哄堂大笑，批判會只好草草收場。

據去年底廣州逃港青年消息，「陳一陽、黃希哲已在壓力下自我批判，而且在某一程度上參加批判李正天的鬬爭，只有李正天還繼續堅持下去，眞有五不怕的勇氣。」但在這個說不服就壓，壓不服就抓的社會，作爲反革命份子，無論你有多大的勇氣，都不可能堅持下去的。面前有的是「牛欄」、「渣滓洞」、「鐐銬、鐵窗、皮鞭和子彈在等待着他們」。則區區一個李正天，又能算得甚麼呢？李正天之所以能堅持下去，除了自己眞眞正正是「不畏虎的年輕人」（可憐另外兩個不畏虎的，已給老虎吞噬、消化掉了）外，最重要的原因是李一哲大字報已「通了天」。毛澤東說：「廣東出了個李一哲是件好事！」究竟是甚麼好事？是一株大大毒草，好做反面教材呢？還是一個反潮流的榜樣？誰都不知道。因此反革命的帽子還沒有正式戴上去。而且，李正天懂得利用官僚階層的矛盾，他的大字報多少代表了一部份解放幹部，如鄧小平、趙紫陽之類的利益，替他們捧場。既然從中央到地方都對此事採取觀望的態度，只好讓它自然發展：讓羣眾鬬羣眾。廣州各單位要鬬李正天，事先向當局登記，安排日期，再用專車把他接

到單位進行批判。由於李正天理論水平高，慣於鬭爭，掌握了豐富的事實，很有辯才，他利用這種批判會，作爲表達自己意見的講壇，使得批判他的人，反而受他批判。李一哲大字報中引用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說話，都沒有用慣常的方法，以黑體字寫出來，只是混在文章中。傳有人批判李正天時，所批判的正是毛澤東的說話，因而被李正天抓着辮子，狠狠還擊。這裏我們可以舉宣集文批李一哲下面一段文章爲例：「李一哲爲了污衊無產階級專政，還製造了一個『理論』根據，即所謂『封建性的社會法西斯』的產生，也是中國社會歷史條件決定的。因爲『延續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使它的意識形態根深蒂固』，『封建時代獨裁專斷的習慣深中於羣眾乃至一般黨員的頭腦中。』但這是枉費心機的。首先，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基礎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它和一切反動沒落的意識形態是根本對立的。其次，我們從來認爲封建沒落階級的意識形態，延續了兩千多年，一直影響到現在，這正是我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在意識形態領域階級鬭爭長期性、複雜性的一種表現，同這種傳統觀念作鬭爭，包括在上層建築各個領域實行全面的專政，是無產階級面臨的重要任務之一。當前深入開展的批林批孔運動就是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領域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一場政治思想上的大革命。李一哲把與無產階級專政格格不入的封建意識形態硬栽到無產階級專政的頭上，把『封建時代獨裁專斷的惡習慣』強加給廣大羣眾和我們黨的廣大黨員，以此作爲他們『論證』現在的無產階級專政已是『封建性的社會法西斯專制』，從而達到他們不可告人的目的，這是絕對辦不到的。」宣集文批李一哲的封建、獨裁專制的說法，其實是批到毛澤東頭上了。因爲李一哲的這一句，正是直接從毛澤東「井岡山的鬭爭」，「政權問題」一節錄出來的。原文是這樣的：「封建時代獨裁、專斷的惡習慣深中於羣眾乃至一般黨員的頭腦中，一時掃除不淨，遇事貪圖便利，不喜歡麻煩的民主制度。」(毛選，卷一，頁71)宣集文一班人闖下大禍，就只好對李正天的反擊默不作聲。廣東省委下令將宣集文這一段文章刪去，又要求已得到原來文章的，將這一段塗去。1975年4月10日，李一哲又貼出了「『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問題回答」，答覆了「批判」過程中提出的什個問題。5月，趙紫陽指示不准李一哲大字報上街，從此廣州市民再也看不到他們喜愛熟悉的、自成一格的字體，漂亮而帶諷刺的插圖，匕首般犀利而又辛辣的文字。對黑暗現實大膽的、無情的深中要害的抨擊，大快人心；又令統治階層寢食難安的李一哲大字報從此消失了。北京路再次暢通無阻，黯淡的廣州市被吞噬入黑暗之中。茫茫長夜，充滿惡夢的茫茫長夜。1976年以來，我們已沒有李正天的任何消息，他還在繼續鬭爭麼？可以想像的，在批右傾翻案風的浪潮中，單因他爲鄧小平講過半句好話，就已罪在不赦了。除非他向當權者投降，否則大概已回到他已渡過三年的監獄，面前是無盡的三年。

林彪體系就是毛澤東體系

李一哲的筆下有兩個司令部、兩個體系：一是代表正確革命路線的毛澤東體系，一是封建法西斯的林彪體系。而過去社會「出現了一種暫時的二元狀態」。「六年前林彪體系的確立，無疑破壞了毛主席的那一套」。林彪於1966年夏天文革開始時得到政權，在文革過程中逐漸確立了他的體系，到1968年下半年完全確立，「人民羣眾」「親眼看到的鮮血淋淋的、殺氣騰騰的復辟行動」。繼復課鬧革命、軍管軍訓之後，工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紅衛兵的大本營——各級學校。以軍人爲主體，舊官僚爲輔，又點

綴了羣眾代表的各級革命委員會正在加速建立。「1968年夏季，社會主義的法制『突然不靈了』，『政權就是鎮壓之權』靈起來 。 在範圍廣大地區內 ， 到處抓人，到處鎮壓，到處是寃獄。」林彪體系是以「1969年法定林彪爲接班人達高潮。」1971年 9 月，林彪垮台。但「林彪的垮台，並不等於他的體系的完結。林彪體系確立的過程造成了一個文人既得利益的勢力，他們害怕洶湧起來的人民羣眾。清算林彪體系的浪潮摧毀了他們既得利益的基礎，………他們站在要求批判林彪體系的人民反面，把一派熱騰騰的批林局面打了下去。他們駡人民羣眾是『 復辟派 』『回潮派』，他們打的旗號是『反復辟』，『反回潮』，好像他們是革命 ， 動他們不得 。」其實直到四屆人大已開了一年多，中華人民共和國新憲法已實施了一年多的今天，情況還是沒有絲毫改變。李一哲和他們的大字報所遭的厄運，正是此一事實的鐵證。

在李一哲筆下有一個林彪體系 ， 實實在在地壓在人民身上，作爲正確路線的毛澤東體系只是一個理想的存在，卻沒有實質的內容。在中國（恐怕世界各國都如此），從來就有兩套歷史，一套以語言文字構成的，理想的三皇五帝夏商周，以至秦漢明清 ， 足以發人遐想 ， 引人幽思的歷史；而活生生的，則是改朝換代殘殺的現實。這一傳統在中共手中得到發揚光大。有最崇高的理想，用最華麗的語言刻畫下過去、現在和未來，而實際上還是那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社會。我們並沒有忽視49年以來，中國大陸所有制發生的根本變化。今天，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佔絕對統治地位，私人佔有生產資料的情況已幾乎絕跡。但所有制的改變沒有解決生產方式和產品分配的問題。人民羣眾並不能參予到生產的安排和產品分配的事務中，他們的命運還是操縱在少數人手裏。因此所有制的改變對人民的利益來說，沒有質的不同。國有化、集體化的結果，使

統治者更能抓到絕對的權力。李一哲們是眞誠地相信兩個司令部存在、還是有意利用這種說法以獲得生存和表達的機會，我們不能知。但他的客觀效果是很明顯的，用中共所宣傳、應諾的理想社會——毛澤東式的社會——來抨擊現實的存在：林彪體系。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林彪體系」就無時無地不存在着。有哪一次運動不是毛主席發動、領導的？文革以來哪一個文件不是經毛主席簽上「照辦」才發出的？文革小組，不是由毛主席的愛人江青同志親自領導的麼？多少次毛主席親眼看着千千萬萬人舉小紅書，聽着萬歲萬萬歲的呼聲；多少次毛主席親自接見「活學活用學習毛澤東著作積極分子大會」的成員；毛主席不是親口向斯諾講過文革過程中個人崇拜的必要麼？林彪作爲接班人是毛主席親自選定的，而且寫進中共九大黨章和7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周恩來十大的政治報告說：「大家知道，九大政治報告是毛主席親自主持起草的。」王洪文在十大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也說：「九大通過的黨章，堅持了我們黨一貫的根本原則，反映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經驗，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政治生活中起了積極的作用。」沒有毛澤東，何來「林彪體系」？林彪不也是好話說盡麼？林彪體系就是實際的毛澤東體系，而毛澤東體系則是理想化了的林彪體系。歸根結蒂，林彪體系也就是現實的中共體系。沒有外於現實政權的毛澤東路線，有的，則只是理想的存在。將毛澤東隔離於現實政治以外，將現實政治掛上要加以批臭的「林彪體系」的招牌來加以批判，是李一哲有意的策略還是無心的創獲，無疑，這是一個較安全而最有效的方法。沒有現實的制度，又能到何處去尋毛澤東，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則恐怕也只有毛澤東「思想」罷了。

當然，現有的制度，現有的人物都有它理想性的一面。舊中國重重不能解決的矛盾下 ， 終於激發了一場大革命，

革命的理想就是建立一個民主自由富強的新中國。新中國在舊社會的廢墟中誕生，新政權本就建立在理想的基礎上。也正由於社會鬪爭的現實加這種理想，喚起了千千萬萬人起來鬪爭，終於推翻腐朽的舊統治集團，奪得了政權，摧毀了舊的剝削階級，贏得社會改革的勝利並進行建設。很多黨員，本就爲理想而拋棄一切，投身革命中。以爲理想奮鬪，爲理想犧牲作爲人生的目的，視個人慾望、物質追求爲可耻，要人民羣眾過清教徒式的生活。整個社會（特別是青少年、知識分子階層和城市居民。一般農民所要求的，還是眼前生活的提高。）以理想爲它的特徵是不足爲奇的。很多在這個社會中生活過的人，帶有極濃厚的理想色彩。很多到過這社會的人，都能感受到濃厚的理想主義氣氛。在一個缺乏理想的世界，對於內心深處已受理想主義影響，而又不能拋棄個人，生活於現實中的人，對於那種集體的活動，規律的清教徒式的生活，寧不引起自我內疚而深深地讚歎。但事實的另一方面卻是：舊的制度被推翻，新的制度建立起來；舊的統治階級被打倒，新的統治階級站起來，更貪婪地霸佔一切，只是蒙上理想的外衣。但理想不能當飯吃，現實生活中有種種違反絕對理想主義的需要，現實社會又不會是絕對理想。聰明的人以理想要求別人，不要求自己，以理想爲衣，包裹一切、攫取一切。誠摯的人或者堅持理想，而爲「理想」所吞噬；或者過着理想和現實相分離的兩重生活。如果說理想精神生活爲這社會的特徵，伴隨而來的正是高度虛僞和人格分裂。作爲這制度的最高代表毛澤東，以他本身特有的氣質，特有的地位和長期宣傳的塑造，一般人心中的英雄崇拜，他已是理想的化身、眞理的代表、永不落的太陽。當這制度發出一切耀眼的光輝，他在這制度內，是它的光源。而當這制度黯淡，他又超然於制度外而予以批判，以保持一個永無錯誤，最英明正確的神話。文革時以造反派

面貌出現，號召青年，支持羣眾起來奪權的豈不是毛澤東麼？是的。當羣眾運動到不能控制的地步，人民要眞正掌權的時候，提出三結合，出動軍隊鎮壓革命的，豈不也是毛澤東麼！將千百萬青年下放農村的是毛澤東；接受李慶霖告狀，對他經濟支持，將他打扮成反潮流的英雄的也是毛澤東。乃至暫時保護李正天，使他有機會講話的還是毛澤東。毛澤東的性格，他會提倡造反，提倡反潮流；以毛澤東的地位，他可以，而且希望通過批評使制度完美。但一切的極限就在：不要削弱他本人的權力和動搖整個制度。楊曦光們起來造當權派的反是容許的，但當他們爲人民提出了奪軍權，提出了砸爛整個國家機構再重建，他們就成了「反革命」了。中共的宣傳將毛澤東打扮成一個盡善盡美，生而知之的天縱之聖。中共政權一切不合理想的事都是別人幹的。似乎當「錯誤路線」漸佔統治地位之時，他站在一旁，默不做聲；待到「錯誤路線」泛濫成災，損害人民羣眾利益，動搖到這個政權的根本時，這位先知先覺出來大喝一聲，於是一切再從最好開始。但過了不久又出現「錯誤路線」。而且每一循環的週期愈來愈短。但事實上，作爲中共主席的毛澤東，在一個由黨領導的國家，那一個有關黨和國家的重要決定沒有經過他的同意？文革前有劉少奇路線，文革後有林彪體系，最近又有鄧小平路線，他們背後靠的無非是毛澤東。1949年後在中國大陸，那有甚麼外於毛澤東體系的體系。曾經作爲統治集團成員，加入權力鬪爭的林立果所擬的「571工程紀要」，對毛澤東這種手段有深切的了解。「紀要」說：「從幾十年的歷史看，有那一個人開始被他捧起來，到後來不曾被判處政治上死刑？……

「有那一股政治力量能與他共事始終？他過去的秘書，自殺的自殺，關押的關押，他爲數不多的親密戰友和身邊親信，也被他送進大牢，甚至連他親生的兒子也讓他迫瘋。

他是一個懷疑狂、虐待狂，他整人的哲學，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個人，都要將這個人置於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壞事嫁禍於別人。

「戳穿了說，在他手下一個個像走馬燈式垮台的人物，其實都是他的替罪羔羊。」

有兩個毛澤東：理想的和現實的，只要理想的毛澤東不威脅到現實的毛澤東的存在，而是替他貼金，「他」可以大談革命、大民主、反官僚之類。但要是「他」向現實的毛澤東挑戰，則命運註定要倒霉的。

這裏我們引用二段毛澤東自己的話爲例。1967年7月8日毛澤東給江青寫信。這封信有人懷疑是爲批林而補寫的。對我們來說，（這封信是事前或事後寫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出自毛澤東筆下，充分表露出他的心理狀態和性格。）那時候，羅瑞卿、彭眞先後被鬬倒，但作爲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毛澤東繼承人的劉少奇，和中共政治局常委、總書記和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還未挨鬬、未垮台。林彪還只是中共中央五名副主席之一，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由於忠於毛澤東受提拔已開始上昇。那時候林彪大搞毛澤東個人崇拜，5月18日上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大談政變問題。毛澤東在信中告訴江青：「我朋友的那篇講話，中央催着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想法，我是深感不安的。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會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讓全國吹起來了，眞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們逼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是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這就叫做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吧。」就在這封信發出一個月後，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批判劉少奇、鄧小平，在毛澤東支持下，林彪被選爲黨唯一的副主席，從此以後一直到70年廬山會議，林彪一直都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毛澤東爲了政治的需要和利益，不惜將自己的原則「逼上梁山」的臉孔，在這封信中淸淸楚楚顯示出來了。

毛澤東愛談巴黎公社，侈言在政權機構中運用巴黎公社大民主的形式。1967年1月革命，上海羣眾奪了舊黨委市委大權，要建立「上海人民公社」，毛澤東就在名詞與實質上玩把戲，說甚麼「我們不在名詞，而在實際，不在形式，而在內容。」跟着就否定「上海人民公社」的提法說：「我們是否還是穩當點好，不要都改名字了。因爲這樣就發生了改變政體的問題，國家的政體問題，國體問題，是不是要改成中華人民公社呢？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就叫甚麼主任、社長呢？不但出了這個問題，還出了一個問題，如果改就緊跟着有個外國承不承認的問題。改變國號，外國大使就作廢了，重新換大使，重新承認。我估計蘇聯就不承認，他不敢承認，因爲承認會給蘇維埃造成麻煩，怎麼出了個中華人民公社？他不好辦。資產階級國家可能承認。

「如果都改公社，黨怎麼辦呢？黨放在哪裏呢？公社裏的委員有黨員和非黨員，黨委放在哪裏呢？總該有個黨嘛！要有一個核心，不管叫甚麼，叫共產黨也好，叫社會民主黨也好，叫社會民主工黨也好，叫國民黨也好，叫一貫道也好，它總得有個黨。公社總要有個黨，公社能代替黨嗎？

「我看還是不要改名字吧，不要叫公社吧，還是按照老的辦法，將來還是人民代表大會，還是選舉人民委員會。這些名字改來改去都是形式的改變，不解決內容問題。現在建立臨時權力機構，是不是還叫革命委員會？大學是否還叫文化革命委員會？十六條規定了。

「上海的人民很喜歡人民公社，很喜歡這個名字，怎麼辦？是不是回去商量一下，無非是幾種辦法，一個辦法就

是不改，還叫上海人民公社，這個辦法的好處是可以保護上海人民的熱情，大家喜歡這個公社。缺點是全國只有你們一家，你們不很孤立嗎？現在不能登『人民日報』，那樣全國都要叫，爲甚麼只准上海叫，不准我們叫？這樣不好辦。不改有優點也有缺點。第二個辦法就是全國都改，就得發生改變政體，改變國號 ，有人不承認 ，很多麻煩事，也沒有甚麼意思，沒甚麼實際意義。第三個辦法，就是改一下，這樣就和全國一致了。當然可以早一點改，也可以晚一點改，不一定馬上改，如果大家說還不想改，那你們就叫一個時候。你們看怎麼樣啊，能說得通嗎？」
這指示將毛澤東對公社那種葉公好龍式的心理活生生地擺到我們面前。當上海人民羣眾要建公社，他並不去考慮這一新生事物的實質，而是考慮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考慮到他的黨，考慮到外國承認的問題。他害怕全國各地學上海人民的榜樣也建立公社，所以對上海人民公社實行消息封鎖，卻又一方面假假惺惺，怕上海人民孤立，諸多作態，無非是要取消上海公社，達到建立他那種三結合革命委員會的目的。

李一哲筆下的中國社會

李一哲生活在一個「 封建的社會法西斯專制 」的社會，那裏有「林彪一伙多年來無法無天 ，橫行殺人 ，搶男霸女，根本不要法制的實際 」，那裏有「特權階層的客觀存在 」，有「 一批特殊於人民利益並與人民利益相對立的『新貴』集團和勢力 」，那裏有「新生的資產階級 」，而且「在今後幾百年內，新的資產階級分子必然一代一代地產生，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爲轉移的 」。而最可怕的是那裏盛行禮治，在林彪當權時期搞了一套現代的「禮」，「他們就是拿了這一套『禮』來『治』黨、『治』國、『治』軍的，這就必然把我們的黨『治』成君臣父子黨，把我們的國家『治』成封建性的社會法西斯專制的國家，把我們的軍隊『治』成袁世凱北洋軍那樣的軍人。」社會上充滿的是「那些知法犯法、執法犯法，製造假案，公報私仇，私立專案，私設監獄，大興肉刑 ，草菅人命 ，罪惡極大的『大夫』。」在那段日子裏，「那些公式化的階級鬭爭『說教』，『渣滓洞』式的牛欄比之歷史上的『3.18』、『4.12』、『 5.30 』、『 6.23 』等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屠殺——僅廣東一省被殺害的革命羣眾、幹部就近四萬人，被關、管、鬬的革命幹部、羣眾上百萬人。」廣東人口約佔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二點五，若照同一比例計算，在林彪當權時期，全國被殺害的羣眾，幹部達一百六十萬人，而被迫害的則達四千萬人 ！ 首先揭破「 禮治 」的秘密的是楊榮國，他指出：「 他們的意志就是法律 」，「 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壓迫和剝削奴隸 ， 甚至加以屠殺 ； 奴隸們只能絕對服從，不許反抗。這就是所謂『禮治』。」那麼這社會比封建社會還不如，實際是個新奴隸社會。林彪體系乃至在林彪垮台的日子裏，那些「既得利益者」們「十分留戀林彪體系達到頂點時的那些『光榮的日子——成千上萬的人民人頭落地的日子 』，他們在『全面勝利』中得到的一切——地位、特權……乃至驅打奴隸的鞭子，全都是閃着聖光的寶貝 ，不容許奴隸有一點褻瀆 。 那時候中國的社會是他們的『天堂』，天堂裏的社會關係絲毫不可改變，如果林彪不允許『右派勢力抬頭』，那麼他們也不允許。」
在這個新奴隸社會裏，種種的政治運動，有種種官方的目的和說辭。但人民羣眾不是阿斗，人民羣眾也有自己對運動的看法。「當『反革命黑手』的牌子勒在脖頸上的深痕尚未消癒，楊榮國和他的助手們甚至是在『牛隊』裏就開始了他們批孔和批新孔的研究。」楊榮國們爲甚麼要揭穿

禮治的秘密？爲甚麼要指責孔子殺少正卯？「少正卯有甚麼罪？他無非是『聯絡人民自由集會結社，亂批評當局』罷了，這樣就該殺了麼?!」楊榮國寫了「孔子——頑固地維護奴隸制的思想家」，批孔就是爲了批新孔，批判新的奴隸制社會，批判作爲這個社會支柱的新禮治，筆誅那批將「聯絡人民自由集會結社，亂批評當局」作爲罪名的現代「大夫」。進一步，就「應當着重地批判經過董仲舒改造了的封建專制的思想體系，……在思想戰線上澈底的實現反封建的任務了。」在這個社會裏，作爲消滅貴族，統一中國，首次建立起封建專制皇朝的秦始皇被贊揚是可以了解的。「林彪在北京有他的馮、段，在地方也有他的督軍，那些『大將』、『督軍』，除了沒有來得及帶兵打倒北京以外，別的幾乎樣樣他們都幹出來了。」新的秦始皇豈不還有他的勞績在？但李一哲們「對秦始皇不表尊敬態度」，「因爲秦王朝終於損害了農民」，除了受到「來自六國舊貴族的反動否定」同時又受到「來自大澤鄉農民的革命否定」。林彪垮台，搞批林了。但「林彪體系確立的過程造成了一個文人既得利益的勢力，他們害怕洶湧起來的人民羣眾。淸算林彪體系的浪潮摧毀了他們既得利益的基礎，……他們罵人民羣眾是「復辟派」「回潮派」，他們打的旗號是「反復辟」，「反回潮」，好像他們就是革命，動他們不得。」「正是他們開歷史倒車，先是想開回70年8月以前，後來想開到71年9月以前，現在無可奈何開到74年3月以前。」但羣眾也來「反復辟」、「反回潮」，他們反對的是林彪體系的復辟和林彪路線的回潮，要求回到1968年夏天以前文化革命中出現的官僚靠邊站，羣眾大民主的局面。

面對着「袁世凱北洋軍那樣的軍隊」，有人搞學習「儒法鬬爭史」，統治集團看成中央集權、反對地方割據，以及黨的一元化領導，反對分權的鬬爭。而人民羣眾則聯繫到

當前社會無法無天，要「法制」，不要「禮制」。李一哲說：「我們不明白的是研究儒法鬬爭，爲甚麼有人總要在『愛國』還是『賣國』這些歷史上很不嚴密的概念圈子裏打主意呢？他們到底想把火往那裏燒？爲甚麼不可以聯繫一下林彪一伙多年來無法無天，橫行殺人，搶男霸女，根本不要法制的實際呢？古代的革新派——法家尙且反對世卿世祿，反對任人唯親，反對枉法徇私，反對走後門，反對刑不上大夫，我們現代的革新派怎麼就不可以拿來聯繫一下這些實際呢？難道今天這等事還少麼？聯繫一下這些，對於獲得人民的擁護，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不是很有實際利益麼？不聯繫林彪禍害的實際，侈談儒法鬬爭史，於民何益。」

統治階層的內部鬬爭中，少數派提出「反潮流」來爲自己作解。毛澤東說：「反潮流是馬列主義的一個原則」。有人借反潮流爲名來打擊羣眾「批林批孔」的潮流，指出這些是「回潮」、「復辟」。在文教戰線上樹立「反潮流」的榜樣，無非是要回復到沒有林彪的林彪路線，無非是將「反潮流」納入當權者所定的軌道。李一哲淸楚指出：「現在的情況，沒有『大人物』或中央報刊的認可和宣傳，任何思潮都不能形成潮流，尤其是不能形成湧來之勢的潮流。」那麼，眞正要反潮流的人，所要反的，豈不正是明明白白麼？張鐵生、黃帥和「黃帥」的被捧出來作爲反潮流的英雄，無非是迎合某些特殊階層的利益。張鐵生的「白卷本身就迎合了一股『空頭政治冲擊一切』在教育戰線的表現的潮流」；黃帥老師整黃帥的那一套；「『黃帥』對革命同志王亞卓的不同意見那樣無限上綱，氣勢洶洶，把他罵成『復辟勢力』，還不都是從林彪路線那裏來的。」眞正敢於反潮流的，有「鐐銬、鐵窗、皮鞭和子彈在等待着他們。」

爲種種政治目標而搞起的不同政治運動，目的無非是爲當

權一小撮人的政治利益，每一個運動，都少不了製造一套說辭來掩蓋問題實質。但這套說辭無論多動人，都免不了露出馬腳。即以「尊法揚秦批孔」爲例，「恢復被儒家歪曲了的歷史本來面目，肯定秦始皇和他建立的一統天下在歷史上的進步作用是很有必要的，但是這種肯定必須遵守嚴格的界限，以便以後對他進行無情的批判。」而「尊法批孔」就「不應當如某些人那樣，在批判地主階級保守派的同時，卻極力謳歌地主階級的所謂革新派，他們根本忘記了秦、漢以後的所謂儒法兩家都是地主階級的意識形態，它們的鬬爭實質都是維護封建專制這一基本事實。」官方理論家們對秦始皇無原則歌頌，對法家無原則肯定，則是完全違反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精神。這一點不單人民的眼睛雪亮，統治階層中人也心中有數。林立果的「571工程紀要」說：「筆桿子托派還在任意篡改歪曲馬列主義，爲他們的私利服務，他們用假革命的詞藻代替馬列主義，用來欺騙和蒙蔽中國人民的思想。」

李一哲大字報分析中國的社會性質。其實，對中共統治下的中國社會性質的分析，早在延安時期和大鳴大放已開始了。文革的爆發，正是社會矛盾集中反映。文革期間造反派對當時社會性質，已有很深刻的分析。作爲省無聯的理論家楊曦光在他草擬的「『極左派』公社成立宣言——中國向何處去？」(1968年1月)裏再三提出警告：「十七年來在中國形成『官僚主義者』的階級」，「這個『紅色』資本階級已經完全成爲阻碍歷史前進的一個腐朽的階級，他們與廣大人民的關係，已經由領導和被領導變成統治和被統治、剝削和被剝削的關係，由平等的共同革命的關係變成壓迫和被壓迫的關係，『紅色』資本家階級的特權和高薪，是建築在廣大人民羣眾受壓抑和剝削的基礎上。要實現『中華人民公社』就必須推翻這個階級。」楊曦光系統地總結了當時左派的看法指出：「引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會矛盾是新的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和人民大眾的矛盾，這個矛盾的發展和尖銳化就決定了社會需要一個較徹底的變動，這就是推翻新的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徹底砸爛舊的國家機器，實現社會革命，現實財產的權力的再分配——建立新的社會——『中華人民公社』，這也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綱領和終極目的。」也就在那時候，楊曦光大聲疾呼：「革命委員會就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產物！」而且預言了：「把革委會專政當成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最終目的，中國必然會走向蘇聯已經走的那條道路，人民又會回到資本主義的法西斯血腥統治下，革委會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道路是行不通的。」李一哲大字報所描繪的社會現象，豈不正是證實了楊曦光不幸的預言。

對中國現階段社會本質，左派革命青年提出的分析，在統治階層中得到證驗。「571工程紀要」(不管眞是林彪一伙的政變計畫，或者是毛澤東爲坐實林彪罪名的栽贓，它產生自統治階層，代表統治階層——最少其中一部份——對中國社會的了解總是不必懷疑的。)指出：「國內政治矛盾激化。

「統治集團內部很不穩定，爭權奪利，勾心鬬角，幾乎白熱化。

「軍隊受壓，中上層幹部不服不滿。

「一小撮秀才橫行霸道，並且握有兵權，四面樹敵，頭腦發脹，對自己估計過高。

「黨內長期鬬爭和文化革命中被排斥和打擊的幹部，敢怒不敢言。

「農民生活缺吃少穿。

「青年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

「紅衛兵初期受騙被利用，充當炮灰，後期被壓迫變成替罪羔羊。

「機關幹部被精簡，上『五七幹校』，等於變相失業。
「工人（特別是青年工人）工資凍結，等於是變相受剝削。」
「紀要」又說：「他們的社會主義實質上是社會法西斯主義，他們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把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制獨裁式的家長制生活。」而直斥毛澤東：「他不是眞正的馬列主義者，而是一個行孔孟之道，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他們的口號是：「全軍指戰員團結起來，全黨團結起來，全國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當代的秦始皇B—52！推翻扛着社會主義招牌的封建皇朝，建立一個眞正的屬於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社會主義國家。」
統治階層的某部分人，爲了爭權而正視部分的社會現實，提出反映羣眾要求的口號，以便利用人民羣眾，作爲自己爭權的工具，與左派革命者對社會的分析都得到相同的結論，則這社會的本質，豈不是很明顯的麼？
這是一個封建性的社會法西斯專制的社會。說它是封建性，乃在它明顯的等級制度和繼承性。說它是法西斯，也就指它是一個新的奴隸社會。這個社會是以「禮治」爲主要的招牌的。林彪體系是以天才史觀爲其思想上的綱領的，「幾百、幾千年出現了一個『天才』，無限崇拜『天才』，絕對忠於『天才』，一切照『天才』意志辦事，誰反對『天才』就打倒誰。」也就是說：「要人們將毛澤東思想當作宗教來禮拜哩！我們認識林彪的封建性，難道不正是以新的禮教原則——誰反對毛主席思想就打倒誰來表現的麼？」「而且任何一個大人物，只要他宣佈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化身，他便從此成爲神聖不可侵犯的，而『那一小撮』竟敢冒犯了他的尊嚴的革命羣眾便決不能成爲法律的保護的對象了！」

林彪死後，又有誰能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化身」？還不是那個在「林彪體系確立的過程造成一個文人既得利益的勢力」！批判李一哲的宣集文大字報，以及社會上一切運動，還都不正是以「天才」的意志作爲衡量一切事物的絕對標準！宗法性的話語出現在中共九大、十大黨章中，出現在70年憲法草案及四屆人大頒佈的憲法中。在在都說明了今日的「黨章」、「憲法」還是「以天才史觀爲其思想上的綱領的」，是「天才」主宰一切，以「天才」的意志爲意志的。統治階層人事有變動，而社會的性質則沒有一絲一毫的改易。那麼，圍繞着劉少奇、林彪和毛澤東的鬪爭，歸根結蒂還是權力鬪爭，豈不就很明顯麼？

特權的基礎——家庭

李一哲大字報的要害乃在於指出了「林彪體系」下的中國是一個「封建性的社會法西斯專制的國家」。「林彪體系的產生，乃是中國社會的歷史條件決定的。」因爲「我們中國是直接從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脫胎進入到社會主義的，延續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使它意識形態根深蒂固。」林彪體系的社會基礎乃是「從特權孵化出來的新生資產階級」。「這個特權階層是客觀存在的，是我們社會經濟條件下所不以人們意志爲轉移而產生的。」「新的資產階級佔有方式的本質就在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條件下，『化公爲私』，當國家或事業的領導人將無產階級的財產和權力按照資產階級的面貌實行再分配的時候，他便在實際上對這部分財產和權力實行了新的資產階級私人佔有。
「這種按照資產階級的面貌實行財產和權力再分配，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常見的是某些領導者將黨和人民給予的必要特殊照顧膨

脹起來，變爲政治和經濟的特權，並無限地蔭及到家族、親友乃至實行特權的交換，通過『走後門』之類的渠道完成其子弟在政治、經濟上實際的世襲地位；並且圍繞着他們的私利，改變事業的社會主義方向，實行宗派主義的組織路線，扶植起一批特殊於人民利益並與人民利益相對立的『新貴』集團和勢力來。

更重要的是，他們爲了維護已得的特權和爭取更多的特權，他們必然要打擊堅持原則的正直的革命同志，鎮壓起來反對他們特權的人民羣眾，非法地剝奪這些同志和羣眾的政治權利和經濟利益。

「這樣他們便完成了『人民公僕』向『人民的主人』的質的轉變，成爲我們稱之爲『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人們了。我們在本文裏提到的『黨內走資派和野心家的基礎是從特權中孵化出來的新生資產階級』，就是這個意思。

「按照基本路線所警告我們的，在今後幾百年內，新的資產階級分子必然一代一代地產生，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爲轉移的。」

中共特權階層的產生，並不是晚近的事，早在延安時期，王實味在「野百合花」裏討論到「平均主義與等級制度」時說：「我並非平均主義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卻實在不見得必要與合理——尤其在衣服的問題上（筆者自己是所謂『幹部服小廚房』階層，葡萄並不酸），一切應該依合理與必要的原則來解決。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麵湯，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一兩餐稀粥（在問到是否吃得飽的時候，黨員還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飽），另一方面有些頗爲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對上感覺到他們是異類，對他們不惟沒有愛，而且——這是叫人想來不能不有些『不安』的。」就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日子裏，延安的特權階層過的卻是「歌囀玉堂春、舞迴金蓮步」的生活。人

民共和國建立後，情況並沒有變好。由供給制改爲工資制，只有愈演愈壞。幹部分開三十級，一級工資和三十級工資相差超過三十倍。社會上各種工作，分別實行八級工資。此外還有大批的臨時工、合同工，工資當然比不上正常的工人，而且也沒有工作及福利的保障。集體所有制企業的工人，工資較國營爲低。農民的收入更低，更沒保障。還有很大一部份上山下鄉青年，辛辛苦苦工作，卻連自己都養不了，反要靠家庭支持。這還只是就實得工資而論。高級幹部有國家照顧，有住屋，有國家供應的司機、汽車，有廚師、保姆、勤務員，更高層的乃至有特別的護士、醫生，幹部特別的供應站，供應食物用品，有特別的招待所、療養所。總之，本身及家庭生活各種需要都由國家供應，談這些人工資的收入是沒有任何意義的，錢對他們，又有甚麼用處呢？

1965年軍隊取消「等級表面化的軍銜制」，但取消表面的制度，並不能改變實際等級的存在。看衣服多少隻袋子，看衣服的質地，看後面尾巴長度(所跟勤務人員的多少)，看所乘坐的汽車，看汽車放不放簾，在在都將等級顯示出來的。文革時期，當羣眾覺醒起來，揭露了大批特權階層生活的資料，最使人注意的是各地存在的「幹部子弟學校」，這類特殊的學校，配上特殊的師資設備，培養特殊分子。他們畢業後通過前門或後門，按自己的志願選擇，進入他們自己喜愛的學校，出校門進入機關門，去做官當老爺，此即「父是英雄兒好漢」之謂也。這正是李正天所指出的「政治經濟上實際的地位」。李一哲所指斥的「『一人得道，鷄犬升天』的黨風」，在毛澤東家族中，有很刺目的呈現。毛夫人江青，借着文革扶搖直上，成了當前中共一個重要的決策人，毛澤東的代表。女兒蕭力，文革時曾抓過解放軍報，以後一直負責抓文化戰線的工作。這還是較爲幕後的工作。毛澤東的侄兒毛遠新，文革

前還在軍工學院讀書，現已官居瀋陽軍區政委，遼寧省委書記，遼寧省革委會副主任，集軍政大權於一身。文革前還承歡膝下，牙牙學語的小女孩王海容(毛澤東堂姪女)，一個北京外語學院學生，此時也來個三級跳，從外交部禮賓司副司長，而部長助理，而副部長。其它的幹部，莫不如此。高級幹部，大權在握的，無所顧忌，公然讓自己的子弟親朋接班，地位較低的稍有顧忌的幹部則讓子弟走後門，上下成風，沆瀣一氣，如鍾志民般自動退學的，恐怕萬中無一。這也正是李慶霖向毛澤東告御狀中所說的「當今社會走後門成風」。就難怪李一哲憤憤地質問：「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是從天才家族的根苗中挑選的；還是在大風大浪中成長，在階級鬭爭中湧現的？」

其實，既然認定現階段中國社會帶有封建性質，則這種風氣的出現，也正不足爲奇的。當然，無論甚麼社會都有「走後門」的現象，但好像中國特別嚴重，究竟是甚麼原因呢？答案要從家庭制度中求。今日世界，恐怕很少國家的家庭制度，像中國大陸那麼強固吧！香港、台灣都是中國的地方，但家庭制度就遠不及大陸強固。當今的中國大陸社會，孩子是要靠家庭撫養的；除了人口的少數，可以享到退休金外，老年人的奉養，也要靠家庭。農村的分配還是以家庭爲單位的。上山下鄉的青年，經濟上不能自給自足，還得向家庭伸手要錢。更不要說一切意外要靠家族彼此互相支援了。而更嚴重的是在政治方面，同一家庭的人，命運幾乎是息息相關。孩子的前途受他家庭成分影響最大。某一家庭的成員在政治上出了問題，影響也是整個家庭的。譬如某人本來是幹部，犯了錯誤變成壞分子，他的子女也就從紅五類而變成了黑五類的子女。當然，黑五類的妻子可以離婚，脫離家庭；黑五類的子女也可以宣佈脫離家庭，但他的家庭成分是黑五類，那是不可改易的。既然同一家庭的人，彼此負有同當罪過的義務，則一

且其中某人飛黃騰達，其他人接受援引，鷄犬升天，也是他們的權利。經濟上的需要，又再加上政治的壓力，家庭的緊密自是不在話下了。我們有時也聽到「大義滅親」的故事，父母出問題，子女起來鬭爭、批判，譬如文革時劉濤批判她的父親劉少奇之類。這類批判，通常是得到被批判人的暗示、鼓勵。既然家庭成員的揭發批判成了必然的步驟，與其拖泥帶水，存「溫情主義」，倒不如表演慷慨激昂，或許也可借此減輕成員的罪過。就如文革時鄧小平被指爲中國第二個赫魯曉夫時，他就曾開家庭會議，動員子女對他揭發，告訴他們可以脫離家庭。這也是愛心的表現。愛通過如此曲折的方式表達，在那冷漠的甚至殘酷的外表下有多麼激烈的熱情，又豈是外間人能想像得到的呢！在中共大陸這樣結構的社會，除非是整個制度的改動，否則特權階層的產生，又豈是能夠避免的麼？

由家庭制度這個堅實的據點，很自然地孳生了地方主義，山頭主義；大地方中又有小地方，大山頭中又有小山頭，互相援引，用人唯親。毛澤東曾在一次談話中說過，延安時期，甚至躲警報，各個山頭的人也互不混雜。每一個重要政治人物的浮沉，除了影響到他的一家外，還關聯到他的親友，他的同事，他的部屬，就是泛家庭主義的最好說明。中國歷來是家族式的統治，皇帝就是這個大家庭的家長，是「天子」，代表神授的皇權；他是「聖人」，代表道德和眞理，因而有作之君、作之師的說法。在家盡孝，孝於皇帝即是盡忠。忠君就是愛國。當忠孝不能兩全，統治者當然鼓勵忠，鼓勵「大義滅親」。忠是封建皇朝的基本道德標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這種情況本質並沒有改變，這是社會的封建性質所決定的，難怪李一哲再三強調反封建的任務。

民主與法制的要求和反響

基於對現中國社會深刻的分析，李一哲提出反禮制、反封建、反特權；要求民主法制，一句話，就是要求保證人民對國家的管理權，並把這些寫進憲法。在中國，1954年的憲法也規定了人民的民主權利。但一直到文革高潮，官僚靠邊站，人民才獲得眞正的革命大民主。文革「鍛鍊人民羣眾自己解放自己的革命民主精神」，「但是，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並沒有完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任務，因爲它並沒有使到人民羣眾牢牢掌握住廣泛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武器。」「1968年以後的多次運動，也總是要打擊文化大革命中起來造反的人們，簡直把他們非打下十八層地獄不可。」但文革也「造成了一個新興的社會力量，他們是在這場大革命中，在毛主席的啓發下逐步地懂得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人們。林彪垮台以來民主精神普遍高漲，更形成了他們的羣眾基礎，他們大多數是林彪體系的受害者，他們對林彪體系有着切齒之恨，他們要求繼續革命，要求人民的革命大民主，要求恢復社會主義法制。」李一哲大字報的作者，正是這一股新興力量的代表。他們宣稱：「我們是『不畏虎』的年輕人，但也並非不知道虎的凶殘，甚至可以說，我們是被那種動物吞噬過一回，但終於咬不住吞不下的餘生者，臉上留着爪痕，不是漂亮人物。」大字報正是這部分人的呼聲。他們知道：即使他們的希望被寫入憲法，「新憲法的規定只是再次給了我們一個武器，要眞正實行還必須靠廣大人民的鬪爭。」

在一個封建性的社會法西斯專政的社會，民主與法制正是革命的口號，它總結了文革的成果，成爲中國人民明確的奮鬪目標。1968年極左派提出「奪軍權」「砸爛一切國家機器」的口號，對於今後中國何處去，只提出一個「中華

人民公社」——即巴黎公社式的大民主——的目標，缺乏明確的內容。李一哲總結文化革命的經驗指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經驗告訴我們，人民的大民主不能離開正確的路線；否則，革命非但不能完成其自身的任務，相反將會爲資產階級野心家所利用，而人民羣眾獲得的只是新的枷鎖。」文化革命而終於變成封建性的法西斯專政，可爲李一哲的論斷作註釋。人民羣眾爭取自身的權利，而且將獲得的權利用制度肯定下來，不但保證人民自己管理社會、國家，隨時撤換那些失去人民羣眾信任的幹部，對「鎭壓人民者實行鎭壓」，而且消除人民內部間的「派別專政」。

革命家們或許要批評李一哲的要求是一種改良主義，向特權階層要求民主、法制無異與虎謀皮。當然，要人民羣眾起來推翻封建的社會法西斯統治或許是一項更革命的主張，但當統治階層還沒有徹底腐爛，當革命條件還沒有充分成熟，當社會條件還沒有完全許可，革命的失敗只有更加強反動者的氣燄，損失了革命的力量及摧毀人民羣眾革命的熱情。即使革命成功，由於社會還缺乏條件，政權很容易又落到一批野心家手中。民主、法制的提出，自然不可能完全得到統治階層的接納。但由於統治階層內部矛盾，更重要是由於人民羣眾的壓力，即使只能獲得一點點的讓步(譬如貼大字報的權利)，這就打開了一個缺口，而爲人民的進一步要求創造了有利的條件。（當然要同時看到人們會對統治階層產生幻想而削弱了鬪志和力量。）要是民主、法制的要求被殘酷鎭壓下去，則在人民面前充分暴露了統治者的本來面目，人民羣眾只能將自己的願望通過鬪爭來實現。則「改良主義」本身，也有正面的價值在！

李一哲大字報的眞正弱點並不在於它的「改良主義」，乃是在於它對民主還沒有充分的認識。它道出了人民羣眾要求民主的心聲，它知道民主的權利要靠人民羣眾自己爭取，但同時它又說：「人民大民主不能離開『正確路線』」，

甚麼是「正確的路線」？還不是誰抓到權力就抓到「正確的路線」，而目前，毛澤東就是「正確的路線」的化身，「正確的路線」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在毛澤東指導下的「民主」。要求民主的同時卻又將反民主的武器交給統治者，是大字報的一個原則性的錯誤。它的根源是在於李一哲還對那個理想性的毛澤東和他的思想有幻想，他甚至眞的認爲有外於「林彪體系」的毛澤東體系，社會上眞有一種「二元狀態」，因而他的大字報雖然批判現實方面，尖刻有力，擊中要害；而在提出努力目標時，處處受掣，稍嫌疲弱。

在羣眾對李一哲大字報的支持擁護聲中，廣東省委宣傳部卻對李一哲進行批判。宣集文的批判文章，暴露了官方打手們的無能。既然李一哲是以理想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來對醜惡的現實——林彪體系作批判，事實既是確然存在，批林又是官方提倡，則在理論上和事實上，他們是不可能批判李一哲的。他們只能用李一哲所指斥林彪們「誰反對就打倒誰」的手法，歪曲事實，顛倒是非來誣害大字報的作者。宣集文的文章，是一個「林彪體系」對待革命羣眾的典型。李一哲大字報早就指出「林彪體系確立的過程中造成了一個文人既得利益的勢力」，他們宣稱自己是革命路線的化身，「把一派熱氣騰騰的批林局面打了下去。」因爲「清算林彪體系的浪潮摧毀了他們既得利益的基礎」。宣集文所能加在李一哲身上的無非是「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攻擊以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攻擊社會主義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一類的大帽子，完全不擺事實，講道理，對李一哲代表的人民大眾的要求，加以「資產階級」的標籤全盤否定。宣集文所用的邏輯，無非是某一觀念是考茨基說過、是林彪說過、是赫魯曉夫說過而李一哲還拿來討論，那末李一哲自然便是他們一流人。完全不問具體內容，不問具體環境。

宣集文文章最大的貢獻在於證實了我們的論證：林彪體系即實際的毛澤東體系。宣集文的確努力而且是成功地將這一點表明出來。他們不同意李一哲以文革時林彪體系取代毛澤東體系，社會出現了「一種暫時的二元狀態」的說法。這就使得李一哲所指控，有八億人民作見證的「林彪體系」的種種罪惡，都自然落到毛澤東體系上面去了。宣集文問：「『林彪體系』在文化大革命中『取代了毛主席的那一套』，林彪的修正主義路線『取代了』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統治地位了嗎？不，這是不折不扣的歪曲歷史，癡人的夢囈與謊言。應該指出，這是一種居心極其險惡的汚衊。我們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是遭受到林彪修正主義路線的干擾和破壞，這是階級鬬爭、路線鬬爭尖銳、複雜的一種表現。但毫無疑問，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始終是按照毛主席的戰略部署，在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指引下進行的，是在同劉少奇、林彪干擾、破壞反覆較量和鬬爭中進行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直處於主導地位，處於統治地位。正因爲如此，我們才取得了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才開創出今天如此一片革命和建設的大好形勢。也正因爲如此，林賊的反革命政變的陰謀才沒有得逞。這裏値得人們深思的是，李一哲爲甚麼把這個中央早已有明確結論，本來看得很清楚的問題，卻故弄玄虛，胡謅甚麼出現了『二元狀態』，妄圖用詭辯的手法，爲他們提出的毛主席革命路線被『取代了』的謬論及辯解。他們到底要打甚麼主意？」李一哲將理想——「毛澤東主義」供起來，以它來批社會現實——「林彪體系」，自然「批到林彪體系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那些人頭上了。」爲了避免被掛上「林彪體系」的牌子，他們索性戳破，將理想丟去，指出「毛澤東體系」即「林彪體系」的事實。

宣集文明白地表示他們對文革和李一哲不同的看法。對他們來說，「這場鬬爭的焦點和實質『是解決兩個司令的問

題，是解決革命與復辟、前進與倒退的問題。』」其實是一場權力的鬭爭。他們當權了，所以宣稱：文革勝利了！

李一哲的看法完全不同：「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並沒有完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任務，因爲它並沒有使人民羣眾牢牢掌握住廣泛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武器。」就是因爲人民還沒有掌握到國家和社會的管理權，社會沒有實現「人民的革命大民主」，而是實行「封建性的法西斯專制」，而林彪垮台並沒有改變這一事實，才促成李一哲寫出他的大字報，要求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不單對文革，對於「反復辟」、「反回潮」、「批林批孔」、「對秦始皇的評價」、「對法家的評價」等等，宣集文都有一套官方的看法。宣集文的文章，對於我們了解這個林彪掌權時期造成的「文人既得利益的勢力」的人的嘴臉，是很有幫助的。這班人在李一哲大字報前顫抖，語無倫次地自我辯護，迴避主要的問題，有意地混淆矛盾，惱羞成怒的破口大罵，既爲李一哲大字報所指斥的提供了一個活典型，且也將大字報不便明言的點破了，倒是一份極好的反面教材。

李一哲們將希望「寄托在街頭讀者身上」，也只有他們能夠同這張大字報有共鳴；那些「既得利益獲得者」那能了解一個革命者的胸懷呢？

在羣眾反迫害、反特權、要求民主與法制聲中，李一哲大字報所要獻給的人大，終於在1975年1月13至17日在北京秘密召開。議程是大會結束後才公佈出來的。李一哲對四屆人大的六點希望，除了「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列入憲法外，其它完全落空。這個羣眾不知道「代表」從何而來的大會所通過的憲法，表現了十足的禮制。一切政權集中到中國共產黨手中，而黨權則由中央委員會主席掌握。眞正體現了所謂一元化的領導。中共主席凌架於憲法之上，他比皇帝的權力有過之而無不及。人大結束後，照慣例應

舉行的學習四屆人大文件活動，完全給「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所代替。二月份起，「紅旗」雜誌、「人民日報」及全國刊物，相繼發表了有關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文章。「紅旗」三月號選輯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無產階級專政」的33則語錄。在編者按語中引用毛澤東的有關指示。同期，又發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四月號，刊登了張春橋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對李一哲大字報所代表的廣大人民羣眾「民主」和「法制」的呼聲，中央的反應是封建式的「憲法」和「專政」。姚文元、張春橋的文章，更是針對李一哲及其它大字報而發的，可以看成中共中央理論家們對李一哲式大字報的回響。

姚文元、張春橋是圍繞着毛澤東下面的話來做文章的：「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類如上台，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點馬列主義的書。」毛澤東這裏提到社會存在的八級工資，完全沒有注意到各不同行業工級的差別，臨時工、合同工與正式工人的差別，國營企業的工人和集體所有制工人的差別。不提到工人農民的差別以及農民之間的差別。而最重要的，他根本不敢提到官僚機構中30個不同等級間的差別以及官僚與人民之間的差別。

姚文元指出：「林彪集團不但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資產階級復辟的願望，而且代表了社會主義社會中新產生的資產階級分子篡權的願望。」這些「新的資產階級分子」從何而來？姚文元引用毛澤東的話：「列寧說，『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生產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工人階級一部分，黨員一部分，也有這種情況。無產階級中，機關人員中，都有發生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的。」姚氏進一步提出：「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國際

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影響的存在，則是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的政治思想根源。而資產階級法權的存在，則是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的重要經濟基礎。」張春橋從所有制的資產階級法權的存在，提出了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的必要。應該注意的是，毛澤東、姚文元、張春橋都明白到資產階級法權的存在爲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的重要基礎，但他們正是這新的資產階級分子利益的代表者，因而他們提不出切實的解決辦法。他們所能提出的無非是多讀書和全面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張春橋異想天開地總結說：「只要我們幾百個中央委員、幾千個高級幹部帶頭，同廣大幹部羣眾一起認眞讀書學習，調查研究，總結經驗，我們一定能夠實現毛主席的號召，搞清楚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保證我們的國家沿着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的道路勝利前進。」在這思想指導下，中共掀起學理論的運動。我們不禁要問，既然產生「林彪」一羣的「重要經濟基礎」沒有絲毫地改變，學理論爲何能改變社會現實？何況領導學理論的，又上是特權階層的人物，他們自身是「資產階級法權」的體現和受益者，他們自己都不能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則學理論又有甚麼用？

我們還需注意到「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李一哲大字報清楚地指出：「五十年代後期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危險是從舊社會包下來的資產階級左派，而六十年代初期以後，這個主要危險是黨內走資派。」自文革以來，中國大陸的鬬爭，都是黨的鬬爭，就非常雄辯地說明這一點。李一哲根據蘇聯的經驗認爲「新生資產階級在現中國的條件下，他們只可能搞封建性的社會法西斯專制，而不能與被打倒的老地主，老買辦們平分既得利益。」姚文元的文章有意地將林彪集團和地主階級搭上鈎，混淆不同的矛盾。但毛澤東自己不能不承認：「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裏，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

權派。走資派還在走。」則很明顯的，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羣眾和和共產黨內走資派的矛盾。誰是走資派？走資派第一是從「資產階級法權」中獲得特權，第二是當權派，用這二標準來量度毛澤東、張春橋、姚文元一流，則他們自是不折不扣的走資派，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但他們自己賊喊捉賊，裝出一副革命的臉孔，享受種種特權。他們也來講專政，則無非是「專無產階級的政」！人民羣眾成了被專政的對象。他們曾說，「階級鬬爭，一抓就靈」，無非是以「階級鬬爭」爲名，實行法西斯的統治，實行恐怖政策以壓服人民。他們慣於在人民內部，在他們黨內製造矛盾，以羣眾鬬羣眾的方法來混淆、掩飾當前的主要矛盾：人民對共產黨的矛盾！共產黨員與黨內一小撮當權派的矛盾。當專政的權力抓在這個「新生的資產階級」手中，對人民實行長期的全面的專政。他們的手法是騙，騙不服就壓，壓不服就抓，抓不服就關，關不服就殺，提倡在肉體上消滅反對他們的人。難怪人民要高呼：「秦皇的封建時代已一去不返了！」

關於天安門事件——4.5運動

李一哲大字報是經歷中共二十多年來統治，特別是經過文化革命洗禮後覺醒的人民羣眾對實現社會不滿的心聲；天安門事件則是羣眾用實際行動來表示他們的反抗和願望。這是一次規模巨大、影響深遠的、自發性的羣眾運動，爲中國民主運動史，寫下嶄新的一頁。

中共統治集團歷來就有「理想」派和實際派的分別。前者代表較多理想的成份，負責決策工作；後者則爲政策的執行者，較了解實際的情況。兩派相輔相成，有時又不免有矛盾和鬬爭。個人屬於那一派別，除了本身信仰、氣質有關外，也由本人當時所處的地位使然。我們可以看到有些人

似乎帶有較多理想的成份的人，一負責到實際政策的執行，就又表現出十分現實了。無論「理想」派、現實派，他們的共同目標是鞏固政權、保障整個統治階層的利益。一切違反這一目標的個人或行動，自然要受到自覺或強迫的壓制。毛澤東在文化革命時大搞羣眾運動以推翻「走資派」，但當羣眾運動按照自身的規律向前發展，以至於要衝決整個制度時，就是他下令軍隊鎮壓羣眾。羣眾要搞巴黎公社式的權力機構，他卻軟硬兼施，要建立軍人、革命幹部和羣眾代表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這種革命委員會又終於將羣眾代表排出其中，成了統治集團內「老、中、青」的三結合。我們應知道，「理想」派的「理想」有一定限度的，它要搞的是運動羣眾而非眞實的羣眾運動，但由於在理論上和在某些實踐上，他們多少鼓勵羣眾對理想的追求，羣眾由被動而變成自動，由朦朧而覺醒。羣眾開始按照他們的拍子走，但緩慢形成自己的節奏的過程中，走自己的道路必然地要跟那些羣眾運動的「偉大統帥、舵手和導師」的願望相違而引起衝突。羣眾認清這批「理想」派「理想」的局限性和虛僞性。事實上，由於文革的經驗教訓，文革以來的種種政治活動，現實派固然縮手縮腳，不敢發動羣眾；「理想」派也再三定下框框，企圖將羣眾運動限制在一個可控制的範圍，中共中央對每一次運動都明文規定不准串聯，不准搞紅衛兵式的組織。以代表羣眾運動的方向，以羣眾運動自居的毛澤東，最多也只是批准讓大字報上街，而且這種大字報上街還加上種種的限制，以至終於名存實亡。羣眾愈來愈認清他們的眞面目：無非借政治運動，運用羣眾來達到他們奪權的目的。這種奪權運動，爲了少數人的利益而使國家動盪，生產停滯，使人民羣眾日增反感。文革後的「理想」派是以江青爲首，上海一班「秀才」爲班底的一個「文人集團」。他們是在毛澤東的羽翼下成長起來的。多年來的精心培養，毛澤東已

成了中共黨、中國和八億人民的象徵，他代表一個權威，一個天授皇權式的巨大力量。毛澤東將身後事寄托在「理想」派身上。「理想」派有毛澤東作靠山，就可以有組織有計畫地伸長手到處抓權。他們發動一個又一個的運動，無非是借此培養實力，清洗一切反對或有反對他們的嫌疑的人。但他們只是一小撮的政治暴發戶，缺乏足夠的行政經驗，缺乏官僚層的基礎，與整個官僚制度發生矛盾，他們除了有毛澤東的權威，很難使廣大幹部信服和支持。他們打起革命的招牌，自命爲羣眾利益的代表，要羣眾去反對那些阻碍他們奪權的官僚，要羣眾按照他們的意旨去革命，將羣眾看成阿斗。當羣眾自己行動起來，違背他們的利益，他們立即搬出毛澤東的偶像來進行鎮壓。過去，毛澤東有兩重身份：作爲官僚制度的頂端，他代表這個制度，是這制度的決策人；另一方面，他又是理想主義的象徵，代表人民羣眾，代表革命。因而，他有時甚至回過頭來批評這一官僚的制度，鼓勵羣眾運動，成了人民羣眾的代言人。在建國後的每一歷史時期，在毛澤東手下，總有一批實際事務的執行者，人民羣眾或幹部層對某一政策或整個制度的不滿，常易將它推到執行的錯誤。文革了，劉少奇一批人被推倒了，林彪等垮台了，周恩來逝世了，鄧小平被批判了，一切可以作爲藉口的外圍都被解除了。以江青爲首的「理想」派在握的只有毛澤東權威的王牌，他們只能赤裸裸地將他抬出來。毛澤東成了「理想」派的護身符，一切對現有權力的批評都是對他的批評，一切的不滿再也不像過去般有緩衝，而是直接地結集到他身上，他再無推諉的餘地了。在這種情況下，羣眾幹部愈來愈看到他的眞面貌，毛澤東已不是整個統治的制度的代表，而降落到爲私利而不惜借用一切手段爭權的「理想」派一羣的代表。他不是全黨的領袖，只是黨內一個少數集團的頭頭。毛澤東自己再不具有超然的地位，而是直接介入黨國

的權力鬪爭。而對廣大人民，毛澤東理想的局限性也是淸淸楚楚的。理想派以毛澤東爲爭權的本錢，將毛澤東放在一個與人民、與廣大幹部對立，毫無遮攔的地位。毛澤東的偶像形象，隨着林彪事件而黯淡，而將愈來愈黯淡。

我們看現實派一邊 。 現實派並沒有一個組織和完整的綱領，沒有一個領袖，它囊括了大部份處理日常事務，執行政策的幹部 ，即是統治階層的大多數 ，特別是中下層幹部。他們的工作使他們直接地接觸到實際的情況，注重日常經驗，要求安定，要求強固制度，有很大的保守性；他們不可能接受羣眾運動 ，視羣眾運動爲洪水猛獸 ，因爲羣眾運動最先衝擊到的是他們。他們也明白爲了本身的利益，不能太多損害羣眾的利益。因爲將羣眾迫上梁山，無非將整個制度埋葬，於他們本身也沒有特別的好處。他們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意識使他們結集起來，成爲一股無形的巨大力量 。 在某些歷史時期內 ，有個別人因本身的地位，自覺或不自覺地成了這股勢力的代言人，但這股勢力並不因某一個或某幾個人的垮台而消失。除非是一次徹底的羣眾性運動，否則這股力量可以有消長，但只要有官僚制度存在，它將如影隨形地存在着。靠官僚制度本身是不可能打垮官僚制度的；靠特權階層，是不可能限制特權的膨脹的。這只是一個很淺顯的道理。只要抓權者不至於整個推翻這一制度本身，這股統治的技術力量即可爲所用。它倒不在乎其中個別人或某一部份人之被打擊。

文革初毛澤東想通過黨政軍現成的機構執行他的「革命路線」，實行奪權鬪爭，但因要動搖的是這制度的根本，所以處處受阻力而終於不得不借助於羣眾運動。當羣眾運動的發展超出可控制的範圍，作爲整個制度的代表人毛澤東又必然地回到這個制度中，並在其中獲得支持的力量。文革、林彪事件以後，統治階層分化加劇，內部矛盾激化，有毛澤東作靠山的少數派有組織、有計畫、有綱領、有步驟的抓權，統治階層的矛盾加強，「理想」派爲抓權製造種種政治運動，來作爲政爭的手段，他們用「理想」來打擊現實派的幹部 ，他們用「理想」來逼迫人民 。 而事實無非抓權，愈來愈虛僞。「五七幹校」、「一打三反」、「新四淸」、「重新整理階級隊伍」、⋯⋯「反潮流」乃至「反擊右傾翻案風」，無非是打擊幹部，無非是壓制人民。因而使社會矛盾激化、社會動盪 、 生產不前 。 由於「理想」派只將「理想」作爲工具 ， 人民已不相信這類「狼來了」式的謊言，與其生活在一種恐怖、困乏的環境裏，永遠沒有改善的可能，他們倒較希望安定，較希望國家在穩定中前進，人民生活得到相應提高。在目前的情況下，「理想」派成了統治階層內部的矛盾焦點，成爲人民與統治階層的矛盾焦點。在這種情況下，人民與現實派倒有一個要求安定、要求國家穩步前進的共同基礎了。

天安門事件就在這一歷史條件下爆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作爲國家總理的周恩來，是國家事務的實際執行者。他的才幹、組織和領導的能力，在當代是第一流的，即在人類歷史上來說，也是十分出色的。二十多年來，作爲國家行政機器的最高發動人，在這整個制度不斷官僚化僵化的過程中 ，作爲這一制度行政的主持人 ，周恩來成了整個官僚階層的代表者，他也始終不渝地爲這一制度服務。1949年以來的各個歷史時期，特別是文革期間，當這制度的內部矛盾已達無可調協，面臨着羣眾運動致命的打擊，整個制度日漸瓦解，周恩來盡了一己的才能，挽救了這一制度的內外危機。周恩來對官僚階層的貢獻是人所共知的。他在中國官僚層中獲得的擁護和敬愛，愈到後期則愈較毛澤東爲多。對人民羣眾來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建設和外交的成就，與周恩來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作爲官僚階層的代表，他是現實派的頭頭。這一派人要求鞏固制度，必然地反對一切羣眾運動，與羣眾自我解放的

目標相違。因而，文革中羣眾的左派如省無聯等組織，攻擊矛頭直向周恩來，指他是「中國紅色資本家的最大的代表」。周恩來在文革中竭力維持官僚制度和官僚層利益，使他們成爲羣眾運動的敵人。但文革以來，「理想」派的弄權，爲一小撮人的利益而置國家民族利益於不顧。以周恩來爲首的現實派提出了國家在安定中求發展的政策，較能符合羣眾的願望。周恩來扶病在四屆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說：「從第三個五年計畫開始，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設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時間，即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這一綱領代表羣眾的要求，也較正確地反映歷史的路向。

十大以後，由於病情惡化，周恩來主持的國家工作，逐漸由鄧小平接班，鄧小平儼然成了現實派路線的執行人。1975年夏天，鄧小平綜合毛澤東的指示，提出了學理論、批修、防修，安定團結，將國民經濟搞上去的「三項指示爲綱」。而自文革以來，「理想」派即從未停止過利用種種機會，如批林批孔、反潮流、學習儒法鬬爭史等政治運動，打擊現實派及其代表人。至此又搞「批水滸」和「反右傾」。大概75年秋天，「理想」派已開始全面對「三項指示爲綱」的現實派路線發動攻擊。先是反擊文教科技戰線上的右傾翻案風，10月11月間，毛澤東在黨內點了鄧小平的名，批判「三項指示爲綱」。「理想」派批判鄧小平，矛頭直指向周恩來。1976年元旦，毛澤東發表1965年所寫的兩首詞，其中有一首是批修的，爲「批修正主義路線」政治運動作輿論。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病逝。根據鄧小平的悼詞，周恩來臨死前還在病床學習毛所發表的兩首詞的，隱隱約約透露出周恩來死前所受「理想」派挾毛澤東而來的政治壓力。周恩來死後的火葬，揚灰於祖國大地的遺言（倘若這遺言是眞實的）側面反映他對自己身後權力鬬爭惡化的估計。而且，自周恩來入醫院以後，新聞界及社會傳聞多指他患心臟病；據說，75年秋天，中共中央曾有文件傳達總理心臟病經動手術，反應良好，正在康復中，而官方的訃告卻又說他於1972年已發現癌病。周恩來的葬禮，毛澤東不參加，而是由已在黨內被點名批判的鄧小平致追悼詞。既反映了毛澤東對周之不尊重，而要鄧小平致詞，又似乎有安撫解釋的作用。周恩來之死，舉國同悲，在世界上引起了極大的震動，但在中國，中央的反應十分冷淡。人民日報只用極少的篇幅，或者甚至不報導國內羣眾的悼念活動和國外輿論對周的讚揚，發表出來的無非官式來往的電訊。周恩來死了，大家問，誰來承繼他的職位、他的事業呢？

二月，出於外間的意料外，華國鋒以代總理身份出現。代替周恩來的不是大家認定的鄧小平。鄧小平在國內正受愈來愈多的指責。

三月份，社會上有數不清的小道消息，政治謠言。甚麼江青找美國人寫傳記，說她和毛主席結婚是被迫的。鄧小平親自將譯文交主席看，主席看後大怒，要與江青離婚。周總理、朱德替江青說好話。「毛主席批判江青！」「周總理死得不明不白！」「周總理的私人醫生失踪！」「周總理有政治遺囑！」「清明節前後一定有熱鬧看！」而在「理想」派大本營的上海，周恩來死後，有人對參加追悼會的羣眾澆冷水，而且出現批判周恩來的言論和大字報。2月29日文滙報刊出文章，暗批周恩來。立刻津浦線上火車廂就有「誰反對周總理，我們就打倒誰！」的標語。反右傾翻案風運動如火似荼，由打擊一批「黨內不肯悔改的當權派」變成打擊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集中打擊鄧小平。四月起羣眾藉送花圈紀念周恩來來表達自己

對當前局勢的看法。特別是在北京，天安門烈士紀念碑北面，掛着「我們敬愛的周總理永垂不朽」黑底白字的橫額。連續擁來的是寫着各式各樣表達心聲、堆了高達10多公尺的花圈和像片。花圈上寫道：「敬愛的周總理，我們日夜想念你！」「我們要維護你的英雄形象，將會完成你的光輝計畫！」「打倒反對周總理的叛徒！」成千上萬的羣眾滙集天安門，發傳單，發表演講，人民羣眾動起來了。「理想」派控制下的北京公安部門已嗅出火藥味，他們開始管制「壞分子」，他們開始「勸」羣眾不要被「階級敵人」利用，他們暗地裏盯睄到天安門去的人羣。大批的便衣警探出動了，混進羣眾隊伍中用威赫來阻止羣眾送花圈上天安門的熱潮，但羣眾報之以憤怒的拳頭和怒號。紀念碑前有大字報指控：「有人企圖阻止我們到天安門悼念總理，但甚麼也不能阻止我們悼念總理！」

四月四日，清明節，連日來，大批下放青年休假返北京，他們與老同學、文革時的老戰友相聚，大家所談的無非是「理想」派爲抓權而禍國殃民的事實。對當前局勢的不滿，對自身處境的憂慮，結集爲對總理努力目標的寄望。但當悼念活動受到壓制，則它代表不單是對被悼念者的敬意，而且，也寄托着對當權派的不滿和反抗。羣眾對公安部門的暗示不加理會而是報以老拳使當權者緊張，他們要更清楚表示他們的意圖，他們要抓人了。但他們遭到回擊，羣眾明顯地站在他們的對立面。紀念碑前的花圈愈來愈多，已堆高到15公尺，頂上是獻給毛澤東已逝的妻子楊開慧的花圈，羣眾的意思也愈來愈明顯：「打倒一切企圖攻擊周總理的反動派！」誰攻擊周恩來，還不是以江青爲首的「理想」派？羣眾寫着：「打倒慈禧太后！」「打倒英廸拉·甘地！」羣眾中有人高呼：「反對一切假馬列主義者！誰反對周總理，我們就打倒誰！」這些附有現實意義詞句的花圈已使「理想」派寢食難安，他們竟使出最笨拙

的手法，於深夜出動軍隊搬走花圈。是他們親手點燃4·5運動的導火線！

四月五日，公安部門已佈置好由中央警衞團、軍隊、警察、民兵組成的守衞隊伍，禁止羣眾在紀念碑前致送花圈。花圈在紀念碑前被搬走的消息傳遍整個北京城，一大清早，數萬羣眾自動聚集到天安門廣場，提出質問：「憑甚麼搬走我們的花圈？」得到的只是無聲的回答。爲着送花圈，他們衝破警衞的封鎖線。爲着找回花圈，他們衝擊人民大會堂，衝擊歷史博物館和軍營。一切阻擋這羣眾運動的人都被說服，被制服。阻擋這運動的汽車被搗爛、焚毀。紀念碑前又堆滿花圈。但統治者也沒有屈服，他們又出動民兵，在羣眾返家午飯的時刻搬走周恩來遺像和花圈。羣眾再一次結集，向民兵們索回他們的花圈，放火燒毀指揮進行這一罪行的民兵總部。下午六時半，官方廣播北京市革委會主任吳德的講話，搬出毛澤東的權威，要羣眾離開廣場，北京的民兵開始緊急集合。經過一天英勇而無望的鬬爭，廣場上人羣愈來愈少。數千羣眾留在廣場，守護他們的花圈。在國際歌聲中，他們獻出最後一批花圈，獻上他們的心聲，他們的詩作。有人高聲朗誦：

欲悲鬧鬼叫，我哭豺狼笑，灑血祭雄傑，揚眉劍出鞘。
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會一去不返了。
我們信仰馬列主義，讓那些閹割馬列主義的秀才們，見鬼去吧！我們要的是眞正的馬列主義。爲了眞正的馬列主義，我們不怕拋頭灑血。
四個現代化日，我們一定要設酒重祭。

九時半，總攻擊令自中南海下達，數萬民兵分成十路，配合着荷槍實彈的中央警衞團和軍警，撲向數千手無寸鐵的疲弱的羣眾。羣眾手拉着手，高唱：「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界的罪人，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作一

次最後的鬭爭……」在蒼茫暮色裏，在不停歇的歌聲中，操着大棒的民兵朝羣眾迎頭痛擊，多少人倒在血泊裏，更多人被抓上囚車。天安門再一次染上鮮血。多少年來，天安門是作爲新中國的象徵而存在着，而現在，又有多少人爲這個新中國的眞正誕生而犧牲，他們用自己的鮮血，他們的艱苦奮鬭，直接將名字刻上烈士紀念碑！歷史的進展如何緩慢和迂迴啊！

4·5運動在全國各地得到響應，羣眾自己行動起來祭周恩來並表達自己的心聲，各地的統治者自然都組織起來鎮壓此一羣眾性運動。根據官方報導，鄭州「有人借清明節搞與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類似的反革命破壞活動，並且行兇打死了電信局的焦春亮。」安陽發生武鬭，南京等地都發生過擁周鄧的羣眾示威。4月6日由毛澤東提議，中共中央政治局罷免鄧小平，將他指爲天安門事件的策動者，又任命華國鋒爲總理。統治階層內，「理想」派與現實派的鬭爭，終以「理想」派的一時勝利而暫告結束。

本書所附錄的「人民日報」記者和「工農兵通訊員」關於天安門事件的報導，反映了4·5運動的一個側面，反映出官方污衊羣眾運動的可恥手段。他們將一個自發性的羣眾運動說成是統治階層或某一個人所策動的。藉此將4·5運動變成一次黨內的路線鬭爭，變成一股社會逆流，以達到既打擊反對派，又打擊羣眾的一石兩鳥的願望。羣眾悼念周恩來，羣眾同情以周恩來爲首的現實派的穩健政治路線，同情爲執行多少於國家和人民較爲有利的穩健路線而被批判的鄧小平。他們中有些人喊出支持鄧小平的口號，因爲「理想」派多年來爲了一小撮人的私利，打着黨和國家的旗子，橫行霸道，胡作非爲，無法無天，損害到他們的利益。他們將某些寄望放在周恩來的接班人鄧小平身上是可以理解的。況且擁護敵人所反對的，豈不正是打擊敵人的方法麼？羣眾借着悼念周恩來，支持鄧小平，正面與

「理想」派爲敵。「理想」派所靠的，只是毛澤東愈來愈減退的權威，爲了鎮壓羣眾，「理想」派將這權威捧出來，毛澤東直接表示鎮壓羣眾運動，正面站到羣眾運動的敵對地位，羣眾也開始對他直接挑戰，喊出「打倒秦皇」的呼聲。文革以後隨之而來的種種羣眾運動，羣眾只能打着毛澤東的旗幟表達自己的願望，4·5運動的重大成就，就是羣眾掙脫毛澤東偶像地位的束縛，直接向他的權威宣戰。羣眾運動開始走上一條獨立的道路。

統治階層的內部鬭爭，因4·5運動而更形熾烈。鄧小平垮下來，現實派的一些重要人物或也將逐漸個別地被「理想」派所代替，只要毛澤東的權威還存在的一天，這種奪權會朝着有利於「理想」派方面發展。但現實派所代表的是大多數的幹部，不是一次大的羣眾運動的冲洗，只靠官僚的換班，是不可能完全將他們更易的。一旦毛澤東死了，「理想」派失去靠山，則現實派的反攻就可以從各方面開始。

而更重要的，現實派的政治路線是從現制度中產生，是與現制度較相適應的。「理想」派的理想，拿來作爲政爭的手段，是可以的，要是眞想實行起來，必然要與現有制度發生矛盾，而他們是靠現制度而存在的。「理想」派一旦抓到權力，處理日常工作，他們既不能，也不願改變現有的制度（畢竟靠這制度來保障他們的既得利益）。爲着使這制度運轉，爲着鞏固他們的統治地位，現實的情勢自將迫使他們收起「理想」的遮羞布，他們要不就是異想天開地堅持他們所謂理想而被這制度所吞噬。眞有理想的，就成爲理想的犧牲者。但更多，或幾乎全部，「理想」只是處境不同產生出來的，只是一種爭權的手段，在現實的需要之下，他們自然輕而易舉地拋棄了「理想」而與現實妥協。「理想」派在個人方面不一定會轉化成現實派，他們一旦當權，實質地轉化爲現實派是可預見的。毛澤東在生之

日，出現的是沒有劉少奇的劉少奇路線，沒有周恩來、鄧小平的周鄧路線，總之是沒有現實派的現實路線，是受制度本身所決定，不以個人意志爲轉移的。又何況，只要現實派一旦有反攻的可能，「理想」派的人，除了個別代表分子，一夕之間變爲現實派也是可能的。

天安門廣場4月5日夜的血跡，在不斷擴大中，統治階層在全國範圍內實行白色恐怖，逮捕殺害革命羣眾。但中國人民是殺不盡的，讓我們踏着先烈的血印，朝着他們的理想前進！

1976年5月30初稿

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

獻給毛主席和四屆人大

李 一 哲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張貼序言
（一）社會主義革命的新問題
（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教訓
（三）關於林彪體系
（四）關於批林以來的形勢
（五）談反潮流
（六）對四屆人大的希望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張貼序言

去年八月以後，人們以爲很快就會召開的四屆人大至今終於還沒有召開❶，但是我們獻給它的這篇文章，卻被認爲是我們的「體系」了。

我們在這篇文章裏初步批判了林彪體系，後來的文章繼續了批判，殊不料，我們的一些朋友卻把「體系」作爲一種嚇人的東西贈給了我們，也許我們在這一批判中涉及領域之廣闊，自我暴露之全面，眞的夠得上一個「體系」了。但是，這種體系——即使我們也可承認我們具有某種體系的話，也決不是異端於馬克思主義體系之外的東西，我

❶ 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73年8月24至28日在北京召開，周恩來所作的報告說：「最近，我們還要舉行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四屆人大一直等到1975年1月13日至17日才在北京召開。

們只不過是企圖以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武器去對林彪體系影響、禍害所及的範圍作一番認眞的清理罷了。實際上我們還遠沒有做到這一點。

林彪體系的新暴露與我們一年前對它的評論沒有發生多少矛盾，相反，使我們驚奇的倒是在許多方面得到了證實。這次街頭張貼的（第三稿）前五部分只作了少量修改，對於第六部分——即關於對人大的希望和對法制的建議，隨着一年來形勢發展，我們不滿意原來的寫法了，認爲有必要作深入一些的闡述，所以重新寫了，而更多的是去年只簡略提及，有待發揮和新牽連進來的問題，我們想在這篇序言裏說一說。

*　　　　*　　　　*

我們的「體系」之所以使某些人感到嚇人，首先是我們討論的這個題目本身。

據說，稍微有一點馬列主義常識的人是不會討論甚麽「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的。我們算是連一點馬列主義常識也沒有的，但是，我們卻知道六十年代以來世界上的幾件事情：一是多數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復辟了，一百多個黨大多數不信馬列了㊀；二是在我們中國出現了曾經並且至今還爲許多人很不理解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㊁；三是毛澤東同志總結了半個世紀社會主義實踐的經驗提出了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我們必須全文抄錄在這裏：「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着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鬭

㊀ 林彪事件後，1972年9月，中共中央發出了「中發(1972)25號」文件，批判林彪，附件有了1966年7月8日毛澤東給江青的信，信中說：「全世界有一百多個黨，大多數的黨都不信馬列主義了。」

㊁ 對文化大革命之不了解，大概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文革初毛澤東就多次指幹部對這一運動的不理解。1966年10月

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鬭爭，存在着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要認識這種鬭爭的長期性和複雜性。要提高警惕。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要正確理解和處理階級矛盾和階級鬭爭問題，正確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不然的話，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會走向反面，就會出現復辟。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㊂

於是，我們知道，社會主義制度是要改善的，它並非盡善

25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就曾提及：「五個月不到，難怪同志們還不那麽了解。」又說：「果然很多同志不那麽了解。」1974年中共中央文件：「王洪文在『中央讀書班』的報告」（1974年1月14日）就指出：「……在我們隊伍內部，包括黨內外，有的同志直到今天對文化大革命還像七、八年前那樣很不了解，很不認眞，很不得力，有的甚至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個別的甚至把文化革命描繪得一團漆黑，簡直像洪水猛獸一樣，有的說一搞文化革命就毛骨悚然。」

㊂ 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1962年9月24日）說：「那麽，社會主義國家有沒有階級存在？有沒有階級鬭爭？現在是可以肯定，社會主義國家有階級存在，階級鬭爭肯定是存在的。……我們這個國家，好好掌握好好認識，好好研究這個問題。要承認階級長期存在，承認階級與階級鬭爭。反動階級可能復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靑年人，教育幹部，教育羣眾，教育中層和基層幹部，老幹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們這樣的國家還會走向反面。走向反面，也沒有甚麽要緊，還要來個否定的否定，以後又會走向反面。如果我們的兒子一代搞修正主義，走向反面，雖然名爲社會主義，實際是資本主義，我們的孫子肯定要起來暴動的，推翻他們的老子，因爲羣眾不滿意。所以，我們從現在起，就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開大會講，開黨代會講，開全會講，開一次會就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還有一條比較清醒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這一段話，經過補充修改，成了這條黨的基本路線。

盡美，它在那麼多國家打不過新資產階級，出現資本主義復辟和在中國必須進行「第二次革命」㈠的事實就是明證。無產階級必須在今後這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中，進行多次文化大革命，使社會主義制度日臻完善。

以上幾點，不算馬列主義常識。然而，我們卻可以據此斷言，社會主義各方面的問題，其中也包括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的問題，完全可以而且應該討論的。「異端邪說」有甚麼可怕？眞理是同謬誤作鬬爭中發展起來的。

列寧說得好：「我們決不把馬克思的理論看作某種一成不變的和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恰恰相反，我們相信，它只是給一種科學奠定了基礎。社會主義者如果不願落後於實際生活，就應該在各個方面把這個科學向前推進。」（引自列寧全集第四卷一八七頁）

我們的「體系」之所以叫某些人感到害怕，第二是因爲我們在一年以前的這篇文章裏根據嚴酷的階級鬬爭事實和基本路線的啓示，提出了新生的資產階級，新的資產階級佔有方式以及同他們作鬬爭的問題。

正當我們的文章對於走資派和野心家的社會基礎的闡述遭

㈠ 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㈡ 小說「紅樓夢」主角。他的反禮教、自由戀愛和出家，被稱爲叛逆封建家庭，叛逆本階級的革命行動。

㈢ 鍾志民，1953年出生。父親鍾學林，是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1974年爲福州軍區政治部副主任，主管幹部工作。母黎明，是已退休的老幹部。鍾志民文革初在南昌二中當紅衞兵，贊成「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觀點。1968年初中畢業，下放到瑞金縣沙洲壩公社插隊，三個月做了四五十工分。（按一個正常勞動力，每天工作可得十工分）1969年徵兵，以人事關係佔了另一社員名額入部隊。1972年4月大學招生，由父親給有關部門打電話，依個人志願，保送入南京大學政治學系哲學專業。由於社會羣眾輿論對「走後門」的不滿，引起思想的改變。1973年5、6月份聽了有關「毛主席給李慶霖同志的信」傳達報告，看到羣眾強烈的反應，認識到走後門入大學的錯誤，

到一些朋友的批評的時候，一個處於享有各種特權的階層中的青年以賈寶玉㈡所不可能有的勇氣叛逆了出來。雖然鍾志民㈢學生退伍的行動不過是李慶霖㈣憤怒的呼喊，

要求退學。家中不同意，南大革委會主任王勇也不贊成。但他終於在9月28日給校黨委寫了「退學申請報告」（載「人民日報」1974年1月18日）。鍾志民退學後回到部隊，即由部隊發出退伍證回到農村，成了「反潮流」的典型人物。當時曾引起全國多宗退學申請。鍾志民事件資料見「要敢於反潮流」（人民出版社，1974）頁59至73。

㈣ 李慶霖本是福建莆田縣小學教員。大兒子數年前下放農村，「每年的口糧只有濕谷二百斤」（晒乾、脫殼後約爲一百斤米），「大半時間要回家吃『黑市糧』」。「風裏來，雨裏去，衣服補了又補，襪子破了也沒法買雙新的」，「說來也怕見笑，連理髮的零錢也沒有」。「原先住在一戶農民家裏」，後來「房東放出風聲，說是兒子要結婚」，示意他搬出去，「看來連個立腳的地方也沒有了」。「有關部門卻不加過問，完全置之不理」。李慶霖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險，上書毛澤東，痛陳下鄉青年的淒涼遭遇。他問：「日後我見了閻王，孩子怎樣辦？眞是不敢想像了！」信中說：「在叫天不應，叫地不靈的情況下，只好冒昧寫信到北京，向你老人家『告御狀』。」信中歷數特權階層的罪惡。指出他們裝模作樣地帶頭送子女下農村，風頭一過，又借「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通過人事關係，將子女調離農村，去參軍、當工人、上大學。「完成了貨眞價實的『下鄉鍍金』的歷史過程。」李慶霖憤憤不平地寫道：「面對當今我們社會上『走後門』成風和任人唯親的現實」，「政治無倚無靠」的一般羣眾子女，便只有「在農村扎根一輩子」的份兒。1973年4月毛澤東親自給他覆信：「寄上三百元，聊補無米之炊。此類事全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李慶霖信的內容，載1973年7月發至全國各工廠、機關、學校、部隊、公社等單位的中共中央文件內，由單位領導向羣眾傳達。

李慶霖後來被提拔爲「縣革委會教育組副組長、全省高等院校招生領導小組副組長」。（以上節錄自錢南萃：「『告御狀』的李慶霖」，載中華月報1975年3月號，頁39至40）

李慶霖出席四屆人大，並成爲四屆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

在特權階層中引起的微弱的回聲，但是在人民羣眾中這個回聲卻引起了連鎖般的震動了。這一叛逆行動嚇壞了一些人，鼓舞了一些人，有人切齒痛恨，有人衷心歡迎。這些互不相同的反響，不正是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我國階級關係的變動和新的階級矛盾狀況嗎？

新的資產階級佔有方式的本質就在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條件下，「化公爲私」，當國家或事業的領導人將無產階級的財產和權力按照資產階級的面貌實行再分配的時候，他便在實際上對這部分財產和權力實行了新的資產階級私人佔有。

這種按照資產階級的面貌實行財產和權力再分配，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常見的是某些領導者將黨和人民給予的必要特殊照顧膨脹起來，變爲政治和經濟的特權，並無限地蔭及到家族、親友乃至實行特權的交換，通過「走後門」之類的渠道完成其子弟在政治、經濟上實際的世襲地位，並且圍繞着他們的私利，改變事業的社會主義方向，實行宗派主義的組織路線，扶植起一批特殊於人民利益並與人民利益相對立的「新貴」集團和勢力來。

更重要的是，他們爲了維護已得的特權和爭取更多的特權，他們必然要打擊堅持原則的正直的革命同志，鎮壓起來反對他們特權的人民羣眾，非法地剝奪這些同志和羣眾的政治權利和經濟利益。

這樣他們便完成了「人民公僕」向「人民的主人」的質的轉變，成爲我們稱之爲「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人們了。我們在本文裏提的「黨內走資派和野心家的基礎是從特權中孵化出來的新生資產階級」就是這個意思。

按照基本路線所警告我們的，在今後幾百年內，新的資產階級分子必然一代一代地產生，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爲轉移的。承認不承認這個新生資產階級（以黨內走資派爲代

表）是資本主義復辟的主要危險，這點，乃是當前無產階級革命派與保守派之間的分水嶺，是肯定或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論問題。你今天不承認，可以，因爲有錢守維㊀、黃國忠㊁們幫忙，還有蔣匪幫經常派人來。廿年不承認，也許可以，勉強維持到五十年，一百年以後又怎麼辦呢？總歸還是要承認的。

我們的「體系」之所以嚇人，第三，是我們斷言：「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並沒有完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任務，因爲它並沒有使人民羣眾牢牢掌握廣泛的人民民主的武器」。這豈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嗎？這樣的斷言有甚麼根據呢？

當我們再次面對這篇文章的時候，廣東的革命羣眾運動又一次興起半年之久了，很有意思的是，作爲它的序幕和武漢幾乎一樣，撕大字報和貼大字報的鬭爭。

在外國人眼裏看來，中國是完全不應該有這樣的鬭爭的。當埃塞俄比亞皇宮前面出現貼在牆上用大字寫成的傳單時，西方通訊社毫不猶豫地把它稱之爲「中國式的大字報」。

可是，「中國式的大字報」在中國卻遭到了災難，前幾年不說，今年五月，廣州市委組織的「政治市容清掃隊」已經裝備好水龍頭和掃把，隨時可以把任何大街小巷出現的大字報清除乾淨。如果說他們終於沒有清除乾淨，這只是因爲前仆後繼的大字報的不斷湧現罷了。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是還在繼續嗎？誰曾經宣布過大字報使命的完結呢？毛主席在「介紹一個合作社」一文裏關

㊀ 樣板戲「海港」中的暗藏特務。
㊁ 樣板戲「龍江頌」中暗藏在龍江大隊的階級敵人，原名王國祿。解放前守山泉，打死盼水媽（戲中另一人物）的兒子。

於大字報「應當永遠使用下去」㊀的那段論述不也是「最高指示」，應當「堅決執行」「堅決照辦」的嗎？可是當被鎮壓下去的革命羣眾從地下爬起來，企圖繼續運用這個武器去批判林彪路線，並爲自己的政治經濟利益而鬪爭的時候，他們卻首先要爲自己本來已有的民主權利本身作一番苦戰哩！正當廣州街頭貼——撕——貼大字報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十八號文件㊁下來了，毛主席又一次地爲大字報表了態。在林彪路線淫威下，萬馬齊瘖㊂幾年之後，大字報重新被宣佈爲合法，十八號文件的深遠意義，至今還沒有完全向人們展示出來，但人們要是看不到這一點將是一個極大的錯誤。社會主義社會人民的權利最根本的是人民對國家和社會的管理權，而十八號文件正是爲這種人民的管理權和批評權開闢了一個廣闊的天地。即使人們對這場革命羣眾運動再次興起原來所抱的期望絕大部份沒有達到，他們獲得了十八號文件本身便是一個偉大的勝利。

如果說，我們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第七年的下半年得出它「沒有完成任務」的結論爲時過早，我們是樂於承認的，因爲現在在大革命第八個年頭結束的時候，人民羣眾絕對的無條件的使用大字報這個廣泛的人民民主的武器的權利，畢竟由歷史性的十八號文件確立了。但是一年以前，有多少人承認文化大革命進入了第八年呢？即使在今天，如果不是毛主席說了話㊃，也是沒有人承認的，這其中不是包含了複雜的內容嗎？

我們的「體系」之所以嚇人，第四是因爲我們提出了「林彪體系」，並指出了它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經確立的事實。甚麼是「體系」？就是事物有聯屬關係的全體——全部系統。林彪體系就是林彪那一套包括理論、綱領、路線、方針、政策、辦法、黨風、學風、文風、作風，在政治、法律、軍事、經濟、文化教育各個領域對抗黨中央、毛主席，禍害人民、流毒全國的東西。六年前，林彪那一整

套「體系」的確立，無疑破壞了甚至取代了毛主席的那一套。到「九·一三」事件㊄（它是林彪那一套與中國人民的矛盾激化到絕對不可調和的表現）以後，才開始顯著地逐步破壞、拋棄林彪那一套，歷史事實難道不是這樣麼？

我們不妨回憶一下林彪體系「鼎盛」時期的情景吧！

我們沒有忘記代替一切，獎懶罰勤的突出（空頭）政治，

㊀ 見「介紹一個合作社」，寫於1958年4月15日，收入「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其中關於大字報的論述：「大字報是一種極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鄉村、工廠、合作社、商店、機關、學校、部隊、街道，總之一切有羣眾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經普遍使用起來了，應當永遠使用下去。淸人龔自珍詩云：『九洲生氣恃風雷，萬馬齊瘖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大字報把『萬馬齊瘖』的沉悶空氣衝破了。」

㊁ 即中共中央1974年第18號文件，重新規定不准撕掉大字報。1974年4月間，周恩來對「批林批孔」運動作了十八字的總結指示：「不准串連，不准武鬪，地方找證據，中央作決定。」毛澤東加上：「鼓勵貼大字報，不阻撓貼大字報」十二個字。據說，同年5月5日主席辦公室傳達指示：「大字報貼在馬路上，我看沒有甚麼不好，外國人要看，中國人更要看，羣眾有氣，就讓他們出氣。大不了以後洗一洗。」

㊂ 參本頁 註㊀。

㊃ 中共中央文件「中發（1974）26號」（10月）傳達毛澤東的新指示：「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爲好。全黨全軍要團結。」

㊄ 根據中共中央1971年9月18日發出「中發（1971）60號」文件：「關於9·12林彪叛黨事件的公報」稱，林彪趁毛澤東到南方巡視的機會，企圖炸毀專車，謀殺毛澤東。陰謀敗露，於9月12日下午乘坐英國製三叉戟軍用運輸機投敵叛國，在外蒙溫多爾漢附近墜毀。林彪、葉羣、林立果和駕駛員一名死亡。因爲墮機事件發生在13日凌晨，故稱9·13事件。

念經式的「天天讀」㊀，越搞越虛僞的「講用」㊁，越鬧越荒謬的「靈魂深處爆發革命」㊂，鼓勵政治投機的「表忠」，不倫不類的「忠字舞」，不勝煩瑣的忠孝禮儀——早祈禱、晚贖罪、集會、集隊、上下交接班、買賣東西、寫信、打電話，甚至吃飯等等，都塗上、罩上激烈的宗教色彩和氣氛㊃。總之，讓忠字佔領百分之百的時間，百分之百的空間，而這個「好」那個「好」的運動㊄，則是「左！左！左！」的比賽，「……最……最……最」的競爭，不計其數的「積極分子代表大會」㊅，實際上是假、惡、醜行徑的博覽，「一本萬利」㊆的賭場。

我們也沒有忘記那損害工農羣眾基本利益的「公產風」，「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黨風，鼓吹「有用就是眞理」㊇「立竿見影」㊈的學風，提倡講假話的「新八股文風」，「小節無害」㊉論所鼓勵的腐敗惡棍的作風，以及「當今社會走後門成風」㊉㊀……。

㊀ 天天讀毛主席語錄。

㊁ 毛澤東思想講用會。

㊂ 在靈魂深處爆發對一切「非無產階級思想」的革命。

㊃ 在忠字化運動時期，各機關、工廠、商業、學校單位，城市的街坊鄰里、農村生產小隊，都騰出一間空房，加以粉刷，牆上掛毛澤東像，像下貼「忠」字。有時兩旁還有對聯，如「主席揮手我前進，主席指示我照辦」之類。又設供桌，置毛澤東選集四卷，稱「忠字室」。家中各處掛毛澤東像，像下設「忠」字，各處都有毛語錄，田間也有語錄牌。汽車、火車、船隻上也掛毛像，毛語錄。各人身上又戴毛章。有些地方自行車前都要掛語錄牌。早上起來，先在屋內向毛像三鞠躬，朗讀毛語錄，稱爲早請示；晚上睡前向毛像報告一天工作、思想，如犯錯誤向毛像請罪，稱爲晚滙報。上下班在車上，由售票員帶大家行禮，或呼萬歲，或讀毛語錄，或唱毛語錄譜成的歌。到工作單位或學校，先集隊在忠字室行禮，讀語錄，呼萬歲，並唱「忠字歌」，跳「忠字舞」。其它集會前也如此。一般都是開會時唱「東方紅」，散會時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忠字歌普通指「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一歌。口唱「忠字歌」，右手高舉毛語錄，頻頻揮動，雙腳依節拍左右交替踏前踏後，即謂「忠字舞」。如在飯堂、飯店吃飯前，也須語錄、萬歲一番。交接班、買賣東西，先來這套儀式。寫信、打電話開頭先來：「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林副主席永遠健康！」下班後則經常開會學毛著。毛澤東有新指示到，不論工作時間或三更半夜，必集會大鑼大鼓迎接「最高指示」，立即開會學習。農村城市的高音喇叭整天不停播送毛語錄、語錄歌、最高指示。

㊄ 如「四好連隊」、「四好標兵」、「五好戰士」等類運動，由軍隊擴展至社會。

㊅「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代表大會」。

㊆ 林彪1959年9月「在全軍高級幹部會議上的講話」說：「要好好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學了馬上可以用，好好學習，是一本萬利的事。」

㊇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我們一定要抓住政治不放，抓住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不放。這是革命的需要，是形勢的需要，是對敵鬬爭的需要，是備戰的需要，是徹底取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的需要，是防止和反對修正主義的需要，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需要。那些壞傢伙攻擊我們是實用主義，這絕不是實用主義，是行之有效，符合實際的客觀眞理。」

㊈ 林彪1966年12月16日給「毛主席語錄寫『再版前言』：「學習毛主席著作，要帶着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在『用』字狠下功夫。……帶着問題選學毛主席的語錄，是一種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好方法，容易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㊉ 林彪在1966年8月10日指示紀要：「要注意不要迷失政治方向，擁護毛主席的，突出政治的，是頭號大好，不然的話，就是頭號大壞，其它都是中好中壞，小好小壞，到底哪一條是第一位，哪一條是第二位，這是兩種幹部政策。一種是注意小節，不注意大節。一種也是注意小節，主要是注意大節。有的幹部，小節不那麽好，生活作風，男女關係，工作態度，工作方法有毛病，不大好，但是他擁護主席，突出政治，有革命幹勁。還有一種幹部小節毛病不多，沒有甚麽男女關係問題，人緣也好，是和事佬，他也不偸雞摸狗的，但他反對毛主席，反對突出政治。如果用這種幹部，我們的軍隊就會變成修正主義軍隊，我們的幹部政策，要注意大節。

㊉㊀ 參頁49註㊃。

我們更沒有忘記那些公式化的階級鬭爭「 說教 」、「 渣滓洞 」㊀式的牛欄比之歷史上的「 三・一八 」㊁、「 四・一二 」㊂、「 五・卅 」㊃、「 六・二三 」㊄等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屠殺——僅廣東一省被殺害的革命羣眾、幹部就近四萬人，被關、管、鬬的革命幹部、羣眾上百萬人。

然而，有人卻閉眼不承認林彪體系曾經確立的這個有八億人見證的事實，厚着面皮硬說「 時時處處 」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線佔統治地位，這豈不是等於說，血腥的屠殺，長期不能翻的案都是「 革命路線 」決定的麼？

如果不曾有林彪體系的確立，爲甚麼落實政策㊅的號召發出五年多，經過三十次申、五十次令，才落實到賀龍同志那裏呢？

如果不曾有林彪體系的確立，爲甚麼會發生「 廬山大笑話 」㊆呢？

堅持林彪體系的頑固派發誓不讓被他們打下去的共產黨人再從地上爬起來。爲此，他們找到訣竅，就是以「 莫須有 」的罪名把對他們危害較大的革命同志打成「 反革命大黑手 」、「 反革命壞頭頭 」、「 五、一六 」、㊇「 現行反革

㊀ 渣滓洞，國民黨特務（ 軍統 ）設在重慶歌樂山關政治犯的秘密集中營。小說「 紅岩 」對裏面的生活有詳盡的描寫。「 紅岩 」作者之一羅廣斌曾被關在這集中營裏。解放後與楊益言合作寫成此書，有很多讀者。文革時羅廣斌是四川的造反派，被保守派迫死。

㊁ 1926年 3 月18日，北洋軍閥段祺瑞鎮壓學生愛國運動，殺死學生二十多人。

㊂ 1927年 4 月12日，在上海的國民黨人，以蔣介石爲首，發動清黨，捕殺大批共產黨員及工農革命份子。

㊃ 1929年 5 月30日，上海公共租界英國巡捕轟擊徒手民眾及學生，死傷多人。上海全埠罷工、罷市、罷課。

㊄ 五卅慘案發生後，廣州人民於 6 月23日舉行援滬大遊行。至沙面對岸沙基，沙面英兵突然以排槍及機關槍向遊行隊伍掃射，英、法、葡艦隊並開砲助擊，殺死羣眾百多人。又稱沙基慘案。

命分子 」、「 叛徒 」等等，長期監禁、肆意虐待。到甚麼也打不成的時候，就把本來很清楚的問題，弄得似乎永遠也搞不清楚，以此藉口，長期掛着，等待時機，捲土重來，難道大量的事實不正是這樣麼？

㊅ 落實平反及恢復名譽的政策。

㊆ 依中共中央文件「 中發（ 1972 ）12號 」及其附件「 毛主席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同志的談話紀要（ 1971年 8 月中旬至 9 月12日 ）」，以及其它批判林彪資料透露：1970年 8 月23日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九屆二中全會，討論三項議程。首天審查「 憲法修改草案 」，陳伯達發言，提出設置「 國家主席 」，建議由毛澤東擔任。發表有關天才的意見，指出毛澤東是當代最偉大的天才。林彪、葉羣和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分別在23、24到25日中午發言，支持陳伯達建議。與會一百多中央委員贊成。自從劉少奇被罷官後，毛澤東即反對設國家主席，以免於權力分散成二中心。而且六次表示他不願當國家主席。陳伯達的提議如獲得通過，毛既不願當主席，當然就由林彪擔任。爲了達到這一目的，他們事先連周恩來和康生（ 九屆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 ）都不通知。毛澤東在「 紀要 」中說：「 我看他的突然襲擊、地下活動是有計畫、有組織、有綱領的。綱領就是設國家主席，就是『 天才 』，就是反對『 九大 』路線，推翻九屆二中全會的三項議程。有人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這次會議開始那幾天，大部份中央委員不知底裏，附和林陳反毛還以爲自己已「 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 」，這就成了「 廬山大笑話 」。

㊇ 「 5・16 」全名是「 首都5・16紅衛兵團 」，以毛澤東主持所製發的「 5・16 通知 」作爲組織的名稱。1967 年 7 月 1 日開會宣告成立。主力是北京「 鋼院延安公社 」、「 林院紅衛兵 」、「 北外 616 」等，成員主要是大中學生。據說他們跟中央文革小組林杰、王力、關鋒、戚本禹都有關係，又有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人幕後操縱。他們提出了「 踢開中央文革，自己鬧革命！」「 揪軍內一小撮！」「 周恩來是資本主義復辟的總根子！」等「 極左 」口號。8 月11日，陳伯達、江青指爲反革命集團而被取締，成員被逮捕審查。9 月 8 日姚文元在「 評陶鑄的兩本書 」中公開指責5・16。以後全國展開清查5・16分子運動，很多文革活躍的造反派都被打成5・16分子而被拘捕鎮壓，5・16成了鎮壓造反派的藉口。

林彪體系的產生，乃是中國社會的歷史條件決定的。

我們中國是直接從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脫胎進入到社會主義的，延續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使它的意識形態根深蒂固。不僅在舊民主主義時期，而且在新民主主義時期㊀，都沒有給予摧毀性的打擊。封建時代獨裁專斷的惡習深中於羣眾乃至於一般共產黨員的頭腦之中，難道不是這種情況才提供了林彪體系以風靡一時的條件，以至把毛主席「逼上梁山」㊁的麼？難道不是這種情況，使得林彪黨徒在其勢力所及之處，以鎮壓人民民主來宣告「全面勝利」的麼？

我們說林彪體系，我們同時還指出「天才史觀則是其理論綱領」即思想上的綱領。爲甚麼呢？幾百、幾千年出現了一個「天才」，無限崇拜「天才」，絕對忠於「天才」，一切照「天才」意志辦事，誰反對「天才」就打倒誰，這不是一條極其完整的思想政治路線麼㊂？不准思想、不准研究、不准探索、不准對任何一個問題「問一個爲甚麼」，「天才史觀」簡直取消了八億個大腦。

現在，人們看得很清楚了，他們從天才史觀出發，搞了那麼一套「體系」，這是一套現代的「禮」。他們就是拿了這一套「禮」來「治」黨、「治」國、「治」軍的，這就必然把我們的黨「治」成君臣父子黨，把我們的國家「治」成封建性的社會法西斯專制的國家，把我們軍隊「治」成袁世凱北洋軍那樣的軍隊。可不是麼？林彪在北京有他的馮、段㊃，在地方也有他的督軍，那些「大將」、「督軍」㊄除了沒有來得及帶兵打到北京以外，別的幾乎樣樣他們都幹出來了。

人們會問：既然「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沒有完成其自身任務反而曾經確立了林彪體系而且至今未被清算」，那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還有甚麼積極成果可言呢？

我們回答說：不！我們說林彪體系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中曾經得到了確立，但這並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絕對地被它所取代。我們說那時候似乎是出現了一種暫時的二元狀態（這是兩個司令部的存在決定的），就好像董仲舒確立了儒家的地位並沒有馬上停止了漢武帝的法家路線一樣。而且，在我們斷言林彪體系曾經確立了的同時，已經指

㊀ 根據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以爲，中國的民主主義革命是「改變這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使之變成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14年爆發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和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是第一段，「是屬於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在這以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卻改變爲屬於新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一直到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才結束。前者是舊民主主義時期，後者是新民主主義時期。

㊁ 1966年7月8日毛澤東給江青的信說：「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會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國都吹起來，眞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們逼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是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這就叫做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吧！」

㊂ 下面是林彪幾則高舉毛澤東的語錄：
「毛主席在全國、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偉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論、文章和革命實踐，都表現出他的偉大的無產階級天才。」——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5月18日。
「毛主席是當代無產階級最傑出的領袖，是最偉大的天才，有最高的革命責任感，最現實的革命精神。」——接見中央文革小組時的講話，1966年8月8日。
「毛主席這樣的天才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毛主席是當代最大的天才。」——接見高等軍事院校、政治學院和總政治部、宣傳部負責同志時的講話，1966年9月18日。

㊃ 馮國璋、段祺瑞，袁世凱手下兩員大將，北洋軍閥「直系」和「皖系」頭子。

㊄ 民國初年各省設都督，掌管一省軍政大權；三年改稱將軍，專管軍事；五年改稱督軍，後廢。

出：「但這只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方面是它造成了它的反面，即造成了一個新興的社會力量」。在這裏，我們想引用馬克思的一段耐人尋味的話：

「革命向前進展並爲自己開拓道路，不是由於它獲得了悲劇式的勝利反而由於它產生了一個團結和堅強的大革命，由於它產生了一個敵人，而主張變革的黨只有在和這個敵人鬭爭中，來發展成了眞正的革命黨」㊀。（「1848—1850法蘭西階級鬭爭」）

這就不用我們囉嗦了。

在林彪體系統治十分嚴密，顯得似乎會永世長存的那些日子裏，忠於馬克思的共產黨人就是根據馬克思指示冷靜地觀察着這一歷史現象，知道它是暫時的，他們滿懷着必勝的信念進行着不屈的鬭爭。

現在我們看到了，從1968年以來，我們黨和林彪體系這個新式的敵人之間進行的這場空前激烈、複雜的鬭爭，對於黨內的今後的發展何等重要呵！沒有空前強大的敵人，就沒有空前的激烈鬭爭，就不會造成空前強大的革命力量，也就不會完成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空前艱巨的革命任務。歷史的辯證法就是如此。

我們的「體系」之所以叫人害怕，第五是我們涉及了林彪路線是右還是「左」的問題。

「九・一三」事件後。全黨、全國人民根據他們的切身經驗和毛主席批判林彪一伙的一系列指示，批了林彪這個「當面說好話，背後下毒手」的「左」派朋友㊁。他們批了林彪「殘酷鬭爭、無情打擊」的宗派路線，批了「政治冲擊一切」㊂，批了「公產主義」，批了「頂峯論」和「絕對論」㊃，這一批，批到了林彪體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那些人頭上了。於是有人出來說，不許批了，「批了羣眾了」。

羣眾整整挨了三年批，挨了三年鬭，沒有人出來說一句

話，保護一下。現在突然有人說，不許批極「左」了，羣眾一下子有了保護了，眞是受寵若驚！這裏，我們倒確是很想和這些保護羣眾不挨批的理論家們討論討論。

理論家們問，「林彪路線的實質是『左』還是右呢？」這一問眞是荒唐得鄭重，黨內機會主義路線無論其表現形式是「左」是右，其實質都是右，因爲它們結果都必然導致革命的損失甚至失敗。這裏是沒有「左」和右的區別的，難道我們的理論家們眞的連這點常識都沒有？

可是，歷史上那個黨內的機會主義者沒有表現過時「左」時右呢？

理論家們，林彪不是宣揚孔孟之道麼？怎麼說極「左」呢？可是從1960年到1971年的報紙和文件上，我們怎樣才能查到「最高、最高」的林副主席號召我們學習孔孟之道

㊀ 新本此段譯文較清楚：「革命向前進展並爲自己開拓道路，不是由於它獲得了直接的悲喜劇式的勝利，而是相反，由於它產生了一個團結而堅強的反革命，產生了一個敵人，而主張變革的政黨只是在和這個敵人的鬭爭中，才發展成了眞正的革命政黨。」（人民出版社，1973）

㊁ 周恩來在中共十大的報告說：「林彪及其一小撮死黨是一個『語錄不離手，萬歲不離口，當面說好話，背後下毒手』的反革命陰謀集團。」

㊂ 林彪講話中經常強調「政治第一」，他1960年10月在「全軍最高級幹部會議上的講話」：「政治是基礎，甚麼工作都要政治掛帥，政治起主帥作用。」在批林運動時被濃縮爲「政治衝擊一切。」

㊃ 「頂峯論」即是說「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峯」。絕對論是「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這些都是中共中央爲批林定下的罪名，經過濃縮的語言。「頂峯論」雖沒完整出自林彪的嘴，但文革時出版的「林彪語錄」，有此一標題。絕對論據說原來是一個戰士提出，楊成武寫了「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一文，毛澤東以爲「絕對權威的提法不妥，從來沒有單獨的絕對權威，凡權威都是相對的。」1967年3月24日林彪在整肅楊成武大會上講話曾予以批判。

的指示呢？他們要使人們學董仲舒㊀，也要人們將毛澤東思想當作宗教來禮拜哩！我們認識林彪的封建性，難道不正是以新的禮教原則——誰反對毛主席思想就打倒誰來表現的麼？作爲劉少奇、周揚一類非常仇恨毛澤東思想的人的對立面，林彪不是「左」得很麼？

這是把「延安」和「西安」放在一鍋煮，越煮越糊塗。「五七一工程紀要」㊁只能說明林彪集團是反革命匪幫，怎麼說明他在黨內的機會主義路線。

必須把反革命兩面派在黨內的機會主義路線與他的反革命陰謀活動區別開來，斯大林對托洛茨基作過這樣的區別〔參考毛選一五三頁註（三〇）〕㊂，毛主席對張國燾作過這樣的區別〔參考毛選二五八頁註（一〇）〕㊃，爲甚麼對林彪卻可以不作這樣的區別呢？

這是明目張膽的偸換概念，混淆兩類矛盾，這本身就體現了林彪在黨內的形「左」實右路線。

現在我們看到了那些參與了「五七一」計劃陰謀，響應政變的死黨，以所謂的「路線錯誤」逍遙法外，而不少僅僅在某些方面執行了劉少奇、林彪在黨內貫徹的錯誤路線的好幹部卻繼續被當做敵人加以無情打擊。這樣的事實難道還不足以發人深省麼？

㊀ 1966年8月林彪說：「漢朝廢百家，獨尊儒術，有個董仲舒。我希望大家當董仲舒。」

㊁ 「571工程紀要」是「中共中央文件」「中發（1972）4號」附件，作爲批林材料。「571」是「武起義」的諧音，「紀要」是一個政變綱要，以「工程」命名只是爲掩護的緣故。「文件」寫道：1971年2月，林彪、葉羣派林立果（林彪之子，空軍作戰部原副部長）從蘇州去上海，接着又從上海去杭州，找他們的同伙研究和製定反革命政變計畫。3月18日，林立果帶于新野（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原副處長）從杭州回上海。當晚，林立果對于新野和已在上海的李偉信（空四軍政治部秘書處原副處長）說：「根據目前局勢，要設想一個政變計畫。」林立果要立即把周宇馳（空軍黨委辦公室原副主任）從北京叫來商量，並

馬克思說：「如果說現象形態和事物的實質是直接合而爲一的，一切科學就都成爲多餘的了。」（資本論）

我們的理論家們，你們爲甚麼對林彪成爲黨內機會主義路線總頭子時期（1966—1971）㊄推行的實右而形極左路線那個形左的問題諱莫如深呢？我們能舉出一百個、一千個現象形態來說明林彪的「左」，而你們能舉出多少林彪作爲機會主義路線總頭子時期在黨內表現的現象形態的右呢？

「假作眞時眞亦假，無爲有處有還無」。「紅樓夢」第一回太虛幻境掛這幅對聯卻是很有現實意義的哩！

說：「剛才已經把我們在杭州研究的情況，給『子爵號』（葉羣的代號）說了一下，她說在上海要注意隱蔽、安全。

3月20日，周宇馳到上海。林立果召集周宇馳、于新野、李偉信開會，研究製定政變計畫。林立果說：「這事與首長（指林彪）談過，首長叫先搞個計畫。」林立果、于新野等按照林彪的旨意和在杭州同陳勵耘（空五軍政委）商量的框框，在1971年3月22日至24日寫出了反革命政變綱領。

㊂ 原註引斯大林1937年在聯共中央全會上的報告說：「過去，在七八年前，托洛茨基主義是工人階級中這樣的政治派別之一，誠然，是個反列寧主義的，因而也就是極端錯誤的政治派別，可是它當時總是一個政治派別。……現時的托洛茨基主義，並不是工人階級中的政治派別，而是一夥無原則和無思想的暗害者、破壞者、偵探間諜、殺人兇手的匪幫，是被外國偵探機關僱用而活動的工人階級死敵的匪幫。」

㊃ 原註謂毛澤東說1935年至1936年中央與張國燾間路線分歧「已經解決」，「至於後來張國燾公開叛黨，墮落爲反革命，那已不是領導路線上的問題，而是個人的叛變行動了。」

㊄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劉少奇、鄧小平被批判。改組機構，改選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林彪被選爲唯一副主席，並確定爲毛澤東繼承人。至1971年9月13日事件林彪死亡爲止。

「黑格爾在一處說過:一切巨大的世界歷史事實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他忘記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以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以笑劇出現……」(馬克思「路易波拿巴霧月十八日」)㊀。

如果王明反對李立三的「左傾」是第一次的話,現在誰又高興來扮演第二次出現的王明呢?

我們的「體系」之所以令人望而生畏,第六是我們對「反復辟」、「反回潮」㊁口號的評論。但是,我們去年在評論中所作的判斷已經被證實了。

甚麼時候發生了「復辟」,甚麼時候發生了「回潮」呢?今年以來某些大人物和權威性的文章(例如「評湘劇園丁之歌」㊂)告訴我們,「復辟」和「回潮」發生在一九七二年,今年三月,「廣州日報」頭版頭條大吹特吹的市一醫院的那張所謂「反潮流」大字報裏甚至把一九七一年說成是「熱血沸騰」,「火紅的年代」,而一九七二年後便幾乎是進入了「復辟的年代」了。

林彪垮台是在那一年?一九七一年秋。可是,爲甚麼林彪不垮台到處都是好好的「一片紅」了,「全面勝利」了,林彪一垮台就是「復辟」了,那裏也是「回潮」了,年代也不火紅了,熱血也不沸騰了。這倒是咄咄怪事!

難道第十次路線鬬爭㊃中,一九七一年秋的偉大勝利導致的直接結果㊄,不是人民的進一步解放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鞏固,相反的倒是爲「復辟」和「回潮」開闢了道路嗎?這是對第十次路線鬬爭的嘲弄。

毫無疑問,人民羣眾是反復辟的,但是他們親眼看到的鮮血淋淋的殺氣騰騰的復辟行動是開始於一九六八年下半年㊅,並以一九六九年法定林彪爲接班人達到高潮㊆。(這便是某些人「熱血沸騰」的東西)經過一九七〇年八月至一九七一年八至九月的決戰㊇,隨着林彪垮台,這種復辟行動恰恰是到一九七二年才大致上全面停止下來,從而開

始人民羣眾的反攻。某些人正是把這種人民的反抗說成是「復辟」,因此,他們的「反復辟」,實際上是反反復辟。顯然,高呼「反復辟」的口號有兩種人,也是截然相反的內容。但是,「反復辟」這個口號的實際效果比我們原來預料要好,因爲人民的革命不會對革命的口號容易發生懷疑的,他們一般沒有對一九七二年開始「復辟」、「回潮」這種提法發生大多數的敏感,於是,儘管魚龍混雜,糾纏不清,但一九七四年的批林批孔運動,「反復辟」畢竟還是成了人民羣眾向林彪及其黨人作鬬爭的旗幟了。

現在需要研究一下的是,爲甚麼那些堅持林彪體系的頑固派在林彪垮台後,在「禮崩樂壞」㊈的形勢下要高喊「反

㊀ 此段引文不大清晰,可能據舊譯本。新譯本此段是:「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他忘記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作爲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爲笑劇出現。……」(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

㊁ 「反資本主義復辟」,「反修正主義路線回潮」。

㊂ 湘暉作,載人民日報1974年8月2日。 參攷再版後記

㊃ 指與林彪集團的鬬爭。

㊄ 指粉碎「林彪政變」計畫的9·13事件。

㊅ 1968年7月27日「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清華大學,8月間「工宣隊」、「貧宣隊」先後進駐全國各級學校。在軍隊支持下將66——68年度中學畢業生下放農村,紅衛兵運動結束。

㊆ 1969年4月14日九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第一章總綱寫道:「林彪同志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最忠誠、最堅定地執行和捍衛毛澤東同志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

㊇ 指由廬山會議到9.13事件的一段時間。

㊈ 照中共「批孔」的官方說法,「禮」「樂」是奴隸社會的支柱,「禮崩樂壞」正是奴隸社會崩壞的象徵。

復辟」「反回潮」呢？

很清楚，他們現在的地位，是隨着林彪的體系的確立而確立的，動搖了林彪的體系無疑是動搖了他們的地位。他們叫喊「反復辟」，乃是他們對一九六九年「全面勝利」的規定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深入發展的現實矛盾尖銳化的反映。

他們十分留戀林彪體系達到頂點時的那些「光榮的日子——成千上萬的人民人頭落地的日子」，他們在「全面勝利」㊀中得到的一切——地位、特權……乃至驅打奴隸的鞭子，全都是閃着聖光的寶貝，不容許奴隸有一點褻瀆，那時候中國的社會是他們的「天堂」，天堂裏的社會關係絲毫不可改變，如果林彪不允許「右派勢力抬頭」，那麼他們也不允許。

因此，一九七二年後，當寶貝的聖光越來越暗淡，奴隸們的態度越來越放肆，「天堂」裏的社會關係越來越不穩，念「緊箍咒」也越來越不靈（「金箍」在「全面勝利」時套在奴隸們頭上）的時候，他們急了。於是，他們口中念念有詞，祭起了非常革命的法寶，叫做「反復辟」！

在堅持林彪體系的頑固派看來，九屆二中全會後，特別是「九・一三」後，是一年不如一年。正是他們開歷史倒車，先是想開回七〇年八月以前，後來想開到七一年九月以前，現在無可奈何開到七四年三月以前㊁。當然，他們是絕不甘心放棄倒退四年的目的的。可笑的是他們卻指斥人民爲「復辟派」、「回潮派」。這裏，我們倒要問問他們：難道被林彪一伙破壞了的黨的、軍隊的、工人階級內部的團結不要恢復嗎？難道被林彪一伙破壞、拋棄了的「三大作風」㊂，我軍的優良傳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㊃不要恢復嗎？被林彪一伙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黨史、軍史要不要恢復其本來面目呢？被林彪一伙用壓、抓、打、殺代替了「懲前毖後、治病救人」與「團結——

批評——團結」的方針要不要恢復？被林彪一伙「從客觀到主觀」的模式篡改了的「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文藝創作方針要不要恢復呢？被林彪一伙「政治冲擊一切」代替了的「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教育方針要不要恢復呢？被林彪一伙破壞踐踏了黨的一系列政策——依靠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的政策、幹部政策、知識分子政策、上山下鄉政策，華僑政策、各項經濟政策……要不要恢復呢？被林彪一伙天才觀壓抑下去了的「五敢精神」㊄要不要恢復呢？難道林彪一伙炮製的從中央到地方成千上萬的假案翻不得、平不得嗎？難道大批雖然犯過這樣或那樣錯誤但經過長期考驗證明是對黨忠誠的老幹部就

㊀ 指林彪在九大獲得法定繼承人的地位，林系軍人紛紛獲得重要職位。

㊁ 參大事表。1970年8月，中共在廬山召開九屆二中全會，毛澤東與林彪爲設國家主席問題起衝突。陳伯達被免職，全黨開始「批陳整風」。毛澤東在黨內公開批評林彪及其追隨者。
1971年9月指9・13事件。
1974年3月起，批林批孔運動激化，羣眾開始衝出框框，大字報大量上街，以「批林」爲名批各地當權派並要求平反。個別地方有罷工。

㊂ 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寫道：「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中產生了新的工作作風，這主要的就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羣眾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即所謂「黨的三大作風」。

㊃ 三大紀律：一切行動聽指揮，不拿羣眾一針一線，一切繳獲要歸公。
八項注意：說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不打人罵人，不損壞莊稼，不調戲婦女，不虐待俘虜。

㊄ 敢想、敢說、敢做、敢闖、敢革命。

不應該再使用了？鄧小平㊀、趙紫陽㊁這些同志根本就不應進入中央委員會是不是呢？即使給他們出路也要把帽子拿在「羣眾」手裏，隨時準備給他們再戴上是不是呢？

在堅持林彪體系的頑固派看來，我們在這裏以老大不敬的態度提出一連串「挑釁性」問題本身就是「復辟」、「翻案」的證據，更不用說這整篇序言和本文以及「廣東怎麼辦？」、「星火燎原館的始末」……，還有甚麼「革命死了，革命萬歲！」㊂篇篇都是「大毒草」，都夠得上「反革命宣言」的資格了。如果是在三年前，早就打成「反革命」了，於是他們哀嘆：回到三年前有多好呵！

三年以來，中國人民確確實實看到了一些「彷彿是向陳舊東西的回答」（列寧）的東西 ，可是 ，那又有甚麼辦法呢？事物按照其自身的規律（包括否定之否定規律）向前發展的，歷史車輪不可抗拒，它是不會照顧甚麼人的面子的。「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㊃我們奉勸那些狂熱追隨林彪而至今還保有「高官厚祿」的大人物，不妨把這對聯徘徊吟咏，深入領略領略其中的意味吧！

那麼，是不是一九七二年就沒有任何「回潮」呢？我們說存在着各種修正主義路線的各種表現，但決不能說是「回潮」。因爲「回潮」這種提法本身就是美化林彪體系確立的時期，把它說成是沒有修正主義的「無差別境界」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當然也決定教育路線和文藝路線。林彪一伙的思想、政治路線是反動的，他們的教育路線、文藝路線也不會是革命的。如果說張玉勤㊅事件是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的表現，不如說是林彪路線在教育戰線的反映。難道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是以死人爲基本特徵的嗎？被林彪路線整死的人何止萬千，年過半百，久經風霜的老革命幹部尚且被逼死，何況十五歲的女孩子？黃帥的老師整黃帥的那一套，是從修正主義教育路線那裏繼承來的，還是更多的從林彪路線那裏來的㊆？後來，「黃帥」對革命同志王亞卓的不同意見那樣無限上綱，氣勢洶洶，把他罵成「復辟勢力」，又是

㊀ 鄧小平文革前爲中共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務院副總理。文革被鬬垮。1973年 4 月復出，任國務院副總理。1973年 8 月中共十大中被選爲中央委員。1975年 1 月十屆二中全會選鄧小平爲中共中央副主席。四屆人大，鄧小平被任命爲副總理又兼任總參謀長。1976年起先在報刊作不點名批判。 4 月 5 日天安門事件後，4 月 6 日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依毛澤東提議，決定免除鄧小平黨內外各職，留黨察看。

㊁ 趙紫陽文革前是中共中南局書記，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及廣東軍區第一政委。文革時被鬬垮。1971年復出，任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書記、革委會副主任。1972年 8 月調任廣東省委書記、省革委會副主任。1973年 8 月當選十屆中委。1974年 4 月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及革委會主任。1975年12月調任四川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成都軍區第一政委。

㊂ 李一哲在「批林批孔」時期寫的大字報。1974年 4 月貼出「廣東怎麼辦？」，以後又陸續發表下面各篇。

㊃ 宋朝詞人晏殊（991—1055）「浣溪沙」句子 。 周恩來十大報告中曾引用第一句。

㊄ 復旦大學歷史教授周谷城提出的論點。「無差別境界即無矛盾、無鬬爭的境界或絕對境界。」參周氏所作「史學與美學」（1961年 3 月16日的光明日報）、「藝術創作的歷史地位」（1962年12月新建設）。此說提出後即被批判。

㊅ 張玉勤事件，未見公開透露。按上下文，張玉勤爲15歲女學生，在林彪當權時期被當時的教育路線迫死。參攷後記

㊆ 黃帥是北京海淀區中關村第一小學五年級女紅小兵，十二歲 。 1973年 10 月 21 日給北京日報寫信 ， 並附上日記數則，批評老師壓制學生。信和日記以「一個小學生的來信和日記摘抄」爲題，編者加很長的按語，載1973年12月12日「北京日報」。12月28日「人民日報」又加按語轉載。黃帥成爲反潮流的英雄。

從那裏來的呢㊀？難道誰反對我就給人家扣個帽子然後加以「打倒」的霸王作風是一個十來歲的女孩子身上固有的嗎？

談到教育路線「反潮流」的問題，我們提到過張鐵生㊁，張鐵生反的是甚麼潮流呢？據說是所謂「智育第一，分數掛帥」回潮的潮流。說實話我們從他的答卷除了能夠找到他向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妥協的證據外，是找不出挑戰的證據的。而且他的白卷本身就迎合了一股「空頭政治沖擊一切」在教育戰線的表現的潮流，雖然這個潮流走向反面也出現了一些「智育第一，分數掛帥」，但它還遠遠沒有形成潮流呢！於是張鐵生之所以成了幸運兒，不過是某些人爲了可以利用來作爲一九七二年後「復辟」「回潮」的活證據罷了。

我們的「體系」頗嚇住了一些人，第七還因爲我們對秦始皇不表尊敬態度。但現在看來這沒有甚麼可怕了。儒法鬬爭史的批判正在深入展開，對秦王朝封建的肯定已經開始變得有原則了起來。「文滙報」剛剛開展着很有意義的討論。毫無疑問，法家先驅者們對中國社會由奴隸制向封建制轉變所引起的歷史作用是偉大的。然而，奴隸制代替原始公社的建立又何嘗不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大進步？歐洲近代革命史上的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 ， 不是也曾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嗎？既然我們那樣無情地批判了資產階級——從克倫威爾到羅伯倫斯庇爾㊂，從「百科全書派」到別、車，從貝多芬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㊃，爲甚麼對地主階級的秦皇朝卻要看得那樣光明呢 ？ 恢復被儒家歪曲了的歷史本來面目，肯定秦始皇和他建立的一統天下在歷史上的進步作用是很有必要的，但是這種肯定必須遵守嚴格的界限，以便以後對他進行無情的批判——這是我們這個從半封建半殖民地脫胎出來的社會主義社會仍然面臨着的反封建任務所決定的。

很可以令人感興趣的是，我們發現一九六五年末到一九六六年初我們的報刊對歷史人物的評價與現在我們的報刊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存在着多麼巨大的矛盾啊！「一切反動派和機會主義頭子都是尊儒反法的」，可是無論是吳晗筆下

㊀ 黃帥的信和日記發表後，內蒙古生產建設部隊十九團政治處幹部王亞卓給黃帥寫信：「黃帥，我向你提意見，不單是對你個人的作法談看法 。 現在許多學校裏 ， 老師們都成了謹小慎微的君子 ， 學生動輒是大字報 ， 謂曰『反潮流』、『做教育革命的闖將』，其實這是一股很不好的潮流。」1974 年 2 月 11 日「人民日報」發表黃帥的公開覆信，指責王亞卓：「你把我們革命的師生引向分裂，把我們從教育革命前進的大道引向劉少奇、林彪利用孔老二搞資本主義復辟的邪路，如果不是別有用心，也是一個政治上的糊塗蟲。你的話同資產階級復辟勢力的語言是多麼相似！」請注意大字報這裏將「黃帥」加上引號。因爲大家都可看出，這封信不會出自一個十二歲五年級小學生的手筆。 參攷再版後記

㊁ 張鐵生是遼寧興城一中1966年畢業生，1968年下放農村。努力勞動，1971年當上生產隊長。1973年被推薦報名上大學，因爲工作緊張，沒時間溫習功課。「文化考查」時在理化卷上寫信給領導：「……對於幾何題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題眼瞪着，眞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我不願沒有書本根據胡答一氣，免得領導閱卷浪費時間。所以自己願意遵守紀律，堅持始終，老老實實地退場。……我所苦悶的是，幾小時的書面考試，可能將我的入學資格取消。我也不再談些甚麼，總覺得實在有說不出的感覺。我自幼的理想將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這是我唯一強調的理由。」此信1973年 7 月19日遼寧日報發表， 8 月10日人民日報加以轉載，兩報都加編者按語，認爲此信批判現行大學招生路線。張鐵生成了反潮流的英雄。1973年 9 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通訊員文章「敢於鬬爭的青年人」，小題爲「記遼寧省下鄉知識青年張鐵生」。張鐵生終被批准入遼寧農學院獸醫系學習。1975年 1 月出席四屆人大，被選爲常委。 參攷再版後記

㊂ 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 1599—1658），英國革命領袖，貴族出身。1628年起任國會議員，領導反對英王。1642年英國內戰，統率國會軍隊數敗王軍。1649年廢除君主，實行共和。克倫威爾爲共和國實際領袖。1653年發動政變， 成爲共和國「護國主」，一直至死。

（轉下頁）

的海瑞㊀還是田漢筆下的武則天㊁那個不是法家呢？然而對他們的批判確確實實變成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導火線。

我們認爲，今天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比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六年對歷史人物的評價確實有了更多的歷史唯物主義精

（接上頁）

羅伯斯庇爾（**MAXIMILIEN MARIE ISIDOREDE ROBESPIERRE 1758—1794**），法國革命領袖，雅各賓黨的領導人之一。1792年被選爲國民公會議員。次年7月雅各賓黨獲得政權，他領導公安委員會，掌握政府實權。又開始淸除黨內艾貝派和丹諾派，使自己一派獨掌大權。1794年6月改組革命法庭，實行恐怖政策，失去民衆支持。7月27日被陰謀政變推翻政權，被逮捕。第二天即被送上斷頭台。

㊃ 「百科全書派」，指十八世紀末期法國革命的思想先驅者，因爲他們共同參加編纂「百科全書」而得名。當時主持編纂者是狄德羅，參加編纂的有達蘭貝爾、伏爾泰、愛爾維修、霍爾巴赫、孔狄亞克和盧梭等。他們的政治、哲學觀點各不同，但反對經院哲學、反教會、反封建制度、反特權的見解則一致。「百科全書」及這一派人的著作，成了法國革命之思想武器。

別林斯基（**V. BIELENSKI**, 1811—1848），俄國文學批評家，革命民主主義者，俄國文學批評的奠基人。他反對農奴制度，支持啓蒙運動，對俄國現實主義文學的發展影響極大。

車爾尼雪夫斯基（**TCHERNYCHEVSKI**, 1828—1889），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傑出的文藝批評家。革命民主主義的奠基者。他思想多方面見解與馬克思主義相符合。1861年參加推翻沙皇政權的秘密活動被捕，在監牢內寫了著名的長篇小說：「怎麼辦？」1864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亞，過了20年流放生活。1883年從流放地歸回，六年後去世。

貝多芬（**LUDWID VAN BEETHOVEN**,1770—1827），偉大的德國作曲家，也是維也納古典樂派最後和最高的代表。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STANISLAVSKY KONSTANTIN SERGEVICH**）蘇聯傑出的導演、演員、戲劇教育家和理論家。自幼愛好劇藝，並參加演出。二十年代出版一系列演劇理論的著作，創造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的表演法。曾獲列寧勛章。以上諸人於文革時受到「無情的批判」。

神，這是革命深入的結果。但是，既然吳晗說海瑞是「愛護人民的」，曾經遭到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篇文章的批判㊂，那麼，現在又有人說，「法家是愛護人民的」，這豈不眞是一個嚇死人的「回潮」麼？海瑞無疑是個法家，而且是一個歷史上難得的少數民族出身的法家。

現在有人從秦始皇到孫中山，羅列了一大堆「落實政策」的名單，可是爲甚麼對海瑞卻要刻薄妒恨，拒不「落實政策」，最近還要在報上臭駡幾句呢？這說明駡法家的人還是有的。何況我們對秦始皇還沒有駡哩！

我們不明白的是研究儒法鬬爭，爲甚麼有人總要在「愛國」還是「賣國」㊃這些歷史上很不嚴密的概念圈子裏打主意呢？他們到底想把火往那裏燒？爲甚麼不可以聯繫一下林彪一伙多年來無法無天，橫行殺人，搶男霸女，根本不要法制的實際呢？古代的革新派——法家尙且反對世卿世祿，反對任人唯親，反對枉法徇私，反對走後門，反對刑不上大夫，我們現代的革新派怎麼就不可以拿來聯繫一下這些實際呢？難道今天這等事還少麼？聯繫一下這些，對於獲得人民的擁護，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不是很有實際利益麼？不聯繫林彪禍害的實際，侈談儒法鬬爭史，於民何益？

在我們看來，既然封建的社會法西斯專制是我們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危險，反封建依然是我們繼續革命的一個重要

㊀ 吳晗於1959年底寫劇本「海瑞罷官」。1960年11月13日完稿，發表於北京文藝1961年1月號。2月，由北京劇團馬連良等演出，大獲好評。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滙報刊出姚文元「評新編『海瑞罷官』」，正式揭開文革序幕。

㊁ 指田漢劇本「謝瑤環」。田漢於1965年被批判，1966年2月1日「人民日報」點名批判。

㊂ 見本頁註㊀。

㊃ 中共「尊法反儒」，說法家是愛國派，儒家是賣國派。據說這是江靑提出來的。

內容，那麼批林批孔問題除了應當研究我國由奴隸制向封建制的社會大變動時期的思想政治上的路線鬪爭寶貴的歷史經驗教訓以外，應當着重地批判經過董仲舒改造了的封建專制的思想體系。如果「五四運動」的「打倒孔家店」是提出了徹底的反封建口號，那麼我們今天的批孔運動就應該是在思想政治戰線上徹底的實現反封建的任務了。我們不應當如某些人那樣，在批判地主階級保守派的同時，卻極力謳歌地主階級的所謂革新派，他們根本忘記了秦、漢以後的所謂儒法兩家都是地主階級的意識形態，它們的鬪爭實質都是維護封建專制這一基本事實。而忘記了這一點，他們不也就忘記了我們今天應當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批孔的根本任務了麼？

我們的「體系」之所以嚇人，最後還因為據說它拾起了一九五七年右派的餘唾。

是的，「民主」、「法制」的口號是右派分子高呼過的。可是自從一九六六年以來，革命造反派和人民羣眾所呼喊的右派呼喊過的口號難道還少麼？「砲轟黑省委」、「反迫害、反鎮壓」㊀不是至今還使那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反對派們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視為「右派翻天」麼？李慶霖信件的「右派言論」比一九五七年的右派是大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我們的一些朋友完全不去想一想，為甚麼「民主」「自由」的口號在一九五六年的布達佩斯曾經集合起來了反革命，而同樣的口號在一九七〇年的波羅的海南岸卻成了波蘭工人階級戰鬪的旗幟了呢？為甚麼一九五五年蘇聯出兵匈牙利曾遭到了我國右派分子的反對，而一九六八年蘇聯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卻遭到了中國人民的抗議了呢！

批評我們的朋友完全沒有根據基本路線對六十年代以來國際和中國的社會階級關係的變動作一番分析，他們不明白五十年代後期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危險是從舊社會包

下來的資產階級右派，而六十年代初期以後，這個主要危險則是黨內走資派了。似乎同樣的口號，反對的卻是不同的內容。一九五七年右派在民主的口號下反對的是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而一九六六年以後人民羣眾在民主的口號下反對的則是黨內走資派的資反線㊁，特別是反對林彪所推行的那種面目極「左」而實質極右的封建專制的社會法西斯路線，他們的目的則是為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這個道理應當是不難懂得的。

*　　*　　*

關於重寫的第六部分，我們不打算多講了，留給人們評判吧。作為對「四屆人大」的希望，無論它們能否得到充分的實現，重要的是，林彪體系的冰山正在溶化，思想開始解放，問題已經提出在願意研究社會主義的人們面前了。可以補充的一點是：我們希望參加「四屆人大」的代表（儘管我們不知道這些代表是怎樣選出來的），不要忘記了一九七一年廬山大笑話的沉痛教訓。

*　　*　　*

對我們這篇冗長的序言，如果讀者們竟能夠看得下去，不覺得索然無味，我們只能感到高興，現在再寫幾句就可以結束了。

我們是所謂「不畏虎」的年輕人，但也並非不知道虎的凶殘，甚至可以說，我們是被那種動物吞噬過一回，但終於咬不住，吞不下去的餘生者，臉上留着爪痕，不是漂亮人物㊂。

顯然，我們讀馬列很少，主要是受了嚴酷現實的教育，懂得一點，說幾句坦率的話。我們在這裏，只不過是為

㊀ 文革時造反派經常喊出的口號。
㊁ 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㊂ 李正天曾坐過幾年監。

了對「全國人民——我們還總算其中一分子——的代表大會」及其以後的革命發展表示我們的希望和信心，也是試一試違了報上的「禁」，犯了刊上的「忌」，冒犯了大人物，究竟會怎麼樣？也算是以身試「禮」吧！如果我們因此而得到某些理論權威的特別關照，我們只能認為是好事，必定會從他們那裏得到更多的教益，雖然我們並不怎樣期望他們。

然而，我們把受教益的期望更多地寄托在街頭讀者身上，衷心希望同志們給我們提出批評指正意見，特別希望街頭理論家、政治家、法律家、哲學家、批評家、觀察家們不吝賜教。我們希望越來越多的同志公開討論這些問題。

我們深信：在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烈士的鮮血澆灌的土地上，應該是生長鮮花的時候了。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七日　稿

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本文）

人們都在關心着四屆人大的召開，尤其關心着與每個中國人命運密切相關的國家法制。

人們為甚麼這樣關心呢？二十多年來的革命動盪，發生了一些甚麼新的問題使得人們必須關心新的國家法制這個四屆人大的產兒呢？

（一）社會主義革命的新問題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已經進行了兩次大鬬爭：一次是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與劉少奇集團的鬬爭，一次是與林彪集團的鬬爭。

鬬爭的實質是要解決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搞資產階級專政還是搞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

過去的反右和社教運動㊀也進行了這樣的鬬爭，所要解決的也是這個問題。那麼新的問題又是甚麼呢？

㊀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對象為各級中下層幹部。八屆十中全會（1962年9月24至27日）以後，中共先後在農村搞四清（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運動，又在城市展開新五反（反官僚主義、反本位主義、反特殊化、反貪污、浪費盜竊、反投機倒把）運動。1965年1月中共中央提出取消城市新五反，一律稱呼為四清運動。又搞「重劃階級成分」及建立「階級檔案」。

新的問題就是劉少奇集團特別是林彪集團要搞的不是一般的資產階級專政，而是要搞封建性的社會法西斯專制。

黨內走資派和野心家的社會基礎是從特權孵化出來的，新生資產階級在現代中國的社會條件下，他們只可能搞封建性的社會法西斯專制，而不可能與被打倒的老地主、老買辦們平分既得利益。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集團的反革命演變的得逞不能使白俄恢復他們的貴族世襲就是證明。

早在六十年代初期，毛主席就向全黨全國人民警告了社會法西斯主義的危險。他告訴我們，如果我們這樣的國家發生復辟，那就不只是一般的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他說：「這是一個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希望同志們好好想一想。」㊀

十年過去了，中國人民整整想了十年，難道不是林彪路線給人民帶來的禍害才幫助人們眞正開始理解毛主席的警告了嗎？

既然社會主義革命到今天的特點是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企圖是搞封建性的社會法西斯專制，那麼革命人民應當拿起甚麼武器去反對他們呢？

（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教訓

在對當前中國社會政治經濟關係的深刻研究中，毛主席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從形式上說，實際是一個最廣泛的人民的革命大民主，它是「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羣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是防止和反對社會法西斯主義的武器。

從戰略的觀點來看，與其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所要解決的首要任務是揭露和摧毀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不如說是爲了鍛鍊人民羣眾自己解放自己的革命民主精神。

「革命就是解放生產力」，還有甚麼能比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羣眾精神振奮，意氣風發的議論國家大事，批評錯誤路線更能成爲生產力解放的標誌呢？

上了憲法的人民羣眾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以及未上憲法的串連自由都在這場大革命中眞正實行起來，並得到了以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的支持，這是中國人民數千年來沒有過的，生氣勃勃的，這是革命的奇勳。

但是，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並沒有完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任務，因爲它並沒有使人民羣眾牢牢掌握住廣泛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武器。

一九六八年夏季，社會主義的法治「突然不靈了」，「政權就是鎮壓之權」㊁靈了起來。在範圍廣大地區內，到處在抓人，到處在鎮壓，到處是寃獄。社會主義法制跑到那裏去了呢？據說，它沒有用了，因爲這是舊人大的憲法，而新人大還沒開，現在是無法無天了！

這是在我國進行的一場社會法西斯主義的演習，演習的總指揮是林彪。

「對廣大人民羣眾是保護還是鎮壓」？毛主席憤慨地發出了這樣的質問。

林彪爲甚麼要鎮壓人民的民主呢？他們不是還鼓吹過「天

㊀ 見1963年5月毛澤東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又稱「前十條」）。

㊁ 林彪1966年5月18日上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上層建築的各個領域，意識形態、宗教、藝術、法律、政權，最中心的是政權。政權是甚麼？孫中山先生說是『管理眾人之事。』但他不理解，政權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反革命是這樣，革命也是這樣。這想用自己的習慣語言，政權就是鎮壓之權。當然，政權的職能不僅是鎮壓。」

然合理」㊀的無政府主義思潮麼？

把林彪體系當作正統的毛澤東思想來崇拜，這是中國人民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不可避免的歷史錯誤。

林彪及其黨徒把人民的革命運動當作他實行篡權復辟的「借用力量」，於是對待「天才」的態度這個準則代替了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個準則。「共誅之」、「共討之」㊁和「誰反對就打倒誰」㊂的原則向法制挑戰，成了保衛對「天才」絕對崇拜的上方寶劍。當他的地位一經確立並由黨刊宣布以他的地位的確定作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勝利」的標誌時，他便要建立「新秩序」了，就要「正名」了。在這方面，他還有他的董仲舒哩㊃！

甚麼「新秩序」？就是「最後勝利論」、「四大過時論」、「政權即鎮壓論」、「軍黨論」㊄，總之，就是把我黨我軍搞成「君臣父子，不得犯上」的關係的社會法西斯論。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告訴我們，人民的大民主不能離開正確的路線；否則，革命非但不能完成其自身的任務，相反將會爲資產階級野心家所利用，而人民羣眾獲得的只是新的枷鎖。

（三）關於林彪體系

甚麼是林彪體系？這是指林彪已成爲黨內機會主義路線總頭子的時期，他在黨內推行了那一整套對抗毛主席，流毒全黨、全國的東西。這就是哲學領域的唯意志論，歷史領域的天才史觀，政治領域的政權即鎮壓論，經濟領域的「公產」論和對外關係的大國沙文主義等等，天才史觀則是其綱領。

毛主席一開始就和林彪體系發生了矛盾，當林彪體系尚未

確立時，毛主席給江青同志的信㊅便是這一矛盾的表現，而林彪體系一旦確立，並使中國革命乃至世界革命面臨着巨大危險時，這個矛盾便不可避免地尖銳起來。

如果我們不去懂得毛主席對林彪法西斯主義鎮壓人民民主的深惡痛絕，我們又怎麼能夠懂得毛主席爲甚麼在廬山提出了「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歷史」㊆的問題

㊀ 林彪1966年10月25日「在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革命的羣眾運動。他天然是合理的。盡管羣眾中有個別的部分，個別的人，有『左』或右的偏差，但是羣眾運動的主流總是適合社會的發展，總是合理的。因此，我們應相信羣眾、依靠羣眾的創造性。」

㊁ 林彪說：「我們現在擁護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後我們也擁護毛主席。……毛主席活到這麼一天，九十歲，一百多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在他身後，如果有誰做赫魯曉夫那樣的秘密報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壞蛋，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3月18日上午）

㊂ 1967年3月24日在整肅楊成武大會上，林彪作講話，會上周恩來、江青、姚文元、羣眾此落彼起呼口號。江青：「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誰！誰反對林副主席就打倒誰！」周恩來：「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保衛林副主席！」「誰反對江青同志就打倒誰！誓死保衛江青同志。」姚文元說：「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誰！誰反對林副主席就打倒誰！」講話結束前，林彪帶領喊口號有：「誰反對毛主席我們就打倒誰！誰反對黨中央我們就打倒誰！」

㊃ 參頁62註㊀。

㊄ 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稱爲「四大」。
黨由軍隊建立，槍指揮黨即謂「軍黨論」。

㊅ 指1972年9月中共中央文件中發（1972）25號附件，1966年7月8日毛澤東給江青的信。林彪是於1966年8月的八屆十一中全會被確立爲毛澤東的繼承人的。參頁59註㊁。

㊆ 中共中央文件，中發（1972）12號附件「毛主席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同志的談話紀要」（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寫道：「毛主席說，要學習列寧紀念歐仁・鮑狄埃逝世二十五週年那篇文章，學唱『國際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不僅要唱，還要講解，還要按照去做。國際歌詞和列寧的文章，全部是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觀點。那裏邊講的是，奴隸們起來爲眞理而鬪爭，從來就沒有甚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誰創造了人類世界，是我們勞動羣眾。在廬山會議時，我寫了一個七百字的文件（原註：即毛主席「我的一點意見」一文），就提出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歷史這個問題。」

呢？我們又怎麼能夠懂得廬山的大鬬爭所反映的整個中國社會的深刻危機呢？我們又怎麼能夠懂得廬山的大笑話所應當給予我們的教訓呢？

「路線鬬爭不可知」的說法和「路線鬬爭不過是中央內部的權力之爭」的說法之所以錯誤，是因爲它站在唯心史觀的基礎上，否認了一切錯誤路線，無論是「左」還是右的，給人民羣眾的利益所帶來的直接損害。人民羣眾爲了維護和爭取自身的利益，總是要以各種形式（甚至包括消極或「反動」的形式）去進行抵制和反抗。中央的鬬爭無非是社會鬬爭的集中表現罷了。

（四）關於批林以來的形勢

林彪體系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達到了頂點，但這只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它造成了它自己的反動，即造成了一個新興的社會力量，他們是在這場大革命中，在毛主席的啓發下逐步地懂得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人們。林彪垮台以來民主精神的普遍高漲，更形成了他們的羣眾基礎，他們大多數是林彪體系的受害者，他們對林彪體系有着切齒之恨，他們要求繼續革命，要求人民的革命大民主，要求恢復社會主義法制。

這一次，人民的要求又披着歷史的外衣出場了，哲學家作了新的政治變革的前導，這個人是楊榮國㊀。

當「反革命黑手」的牌子勒在脖頸上的深痕尙未消癒，楊榮國和它的助手們甚至是在「牛隊」裏就開始了他們批孔和批新孔的研究。這位白髮蒼蒼的教授是一個眞正的造反派，他首先揭破了「禮治」的祕密，「他們的意志就是法律」，楊榮國同志控訴說：「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壓迫和剝削奴隸，甚至加以屠殺，奴隸們只能絕對服從，不許反抗，這就是所謂『禮治』」。

楊榮國反覆地控訴「禮治」，反覆地控訴孔子殺少正卯，少正卯有甚麼罪？他無非是「聯絡人民自由集會結社，亂批評當局」㊁罷了，這樣就該殺了麼?!

毛主席支持了楊榮國派要革命要民主的呼聲，給李慶霖那封到處謂之「反動告狀書」的覆信㊂，是多麼大的鼓舞了人民羣眾啊！眞的，一九六八年以來，沒有見過人民羣眾「這樣的興高采烈」。「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這是把多少人民羣眾壓抑在心裏頭的對林彪法西斯主義的仇恨的呼聲喊出來啊！

但是，興奮很快就過去了，伴隨而來的是對李慶霖式的信件大肆的封鎖、恐嚇和鎭壓，李慶霖的遭遇引起了廣大羣眾的同情和躭心。他們在說：「幸虧信讓毛主席收到了」，他們在想，是甚麼壓制着他們的民主權利呢？

林彪的垮台，並不等於他的體系的完結。林彪體系確立的過程造成了一個文人既得利益的勢力，他們害怕洶湧起來的人民羣眾。淸算林彪體系的浪潮摧毀了他們既得利益的基礎，他們耍了一個詭辯，歪曲主席的思想，把林彪體系實質的極右說成是甚麼「右傾」，或者迴避林彪在成爲機

㊀ 楊榮國，中山大學哲學教授。卅年代末期在桂林師範學院講授中國古代哲學史，即已提出孔子爲奴隸制社會思想家的說法。49年後仍堅持此說。文革時受迫害，被關到牛欄編入牛隊。(牛鬼蛇神隊伍)在「牛隊」裏繼續作「批孔和批新孔」的研究。「批林批孔」時因政治需要被捧出來，成了「批孔」理論權威，在報刊發表數篇指導性文章，又到處演講。現任「中山大學」革委會副主任，四屆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

㊁ 公元前 498 年孔子爲魯司寇攝相事，殺魯之聞人少正卯。楊榮國說：「孔子攝行魯國宰相的職務，……不到七天，便把魯國一位革新派人士少正卯殺了。…… 少正卯大概是反對這行將腐朽的禮治，而要施行適應時代要求的一人。」此問題之研究可參看：趙紀彬「關於孔子誅少正卯問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㊂ 參頁49註㊃。

會主義路線總頭子時期，他所推行的那一套對抗毛主席流毒全國的東西，用林彪那些見不得人的反動言論來掩蓋林彪見不得人的蠱惑言論。他們站在要求批判林彪體系的人民的反面，把一派熱氣騰騰的批林局面打了下去。他們罵人民羣眾是「復辟派」「回潮派」，他們打的旗號是「反復辟」「反回潮」，好像他們就是革命，動他們不得。

可笑的是他們也來批孔，他們千方百計地掩蓋被楊榮國揭發出來的「禮治」的秘密，把血淋淋的「禮治」說成是一種假仁假義。肯定焚書坑儒的革命作用使他們自以爲有了可乘之機，他們無原則地吹捧秦王朝的封建專制，非歷史主義地鼓吹要從肉體上消滅一切反對派，這實際上是在爲社會法西斯主義作輿論，以完成林彪未竟的事業。他們不敢觸及秦王朝面臨的兩個否定：即來自六國舊貴族的反動否定和來自大澤鄉農民的革命的否定㊀。農民爲甚麼要反對秦王朝？秦滅六國時，農民「莫不虛心而仰上」，不都是擁護它的麼？因爲秦王朝終於損害了農民。人民羣眾爲甚麼要反對林彪體系？當年橫掃一切的紅衛兵運動不是高喊着林彪「誰反對就打倒誰」的口號去作英勇的戰鬪的麼？也因爲林彪體系終於損害了人民羣眾。幾千年來凡是損害了人民的利益的人，終究是要被人民打倒的，這就叫做奴隸們創造歷史。

那些「既得利益者」罵所謂「復辟派」「回潮派」要復舊，是的，人民羣眾中也許有不少人在林彪體系面前產生了一種懷舊情緒，但這只是因爲當前林彪體系直接損害了他們，他們客觀上要求進步，主觀上卻不懂得進步而已。這幾乎是一個歷史規律。被毛主席稱爲天才的陳勝、吳廣，不都是自命扶蘇㊁，自號楚王㊂，在反革命復辟的旗號下，舉行了他們的革命起義麼？既然我們無產者對這樣打着反革命旗號的農民起義都要給予他們以歷史上崇高的地位，爲甚麼今天廣大人民羣眾在批林鬪爭中有了一些錯誤的懷舊情緒，就非大興問罪之師不可呢？更何況否定之否定，「彷彿是向舊的事物的回復」，不也是列寧的辯證法麼？革命的道路要筆直而筆直是王明的形而上學，對革命作辯證的否定不是歷史的退步而是歷史的前進。

當然，如果眞正的反革命復辟派孔鮒㊃之流可以混進從大澤鄉出發的革命隊伍，今天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面臨的反攻倒算和辯證否定，便更可魚龍混雜。我們必須反對反攻倒算派，以捍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然而，當前批林的主要危險，是在「反復舊」的旗號下維護林彪體系的錯誤潮流。

總之，批林以來的形勢，縱橫觀之，鬪爭是激烈的，批林整風仍是首要任務。第十次路線鬪爭尙在繼續深入。也許在這種深入之中，它還孕育著第十一次路線鬪爭哩！

（五）談反潮流

「十大」廢除了林彪塞進「九大」的「共誅之」「共討

㊀ 依照階級分析及當前「批孔」觀點，六國貴族代表奴隸階級，他們反秦（封建政權）是違反歷史潮流的，所以是「反動否定」。陳勝、吳廣在大澤鄉起義反秦，是農民對封建統治的反抗。對秦王朝來說，是「革命的否定」。

㊁ 公子扶蘇是秦始皇長子，始皇死，爲秦二世逼迫自殺。民間以爲他還活着，陳勝、吳廣利用來反秦二世。

㊂ 陳勝、吳廣發動起義的地區是楚國故地，民間流傳「亡秦必楚」。15年前楚將項燕曾率領軍隊在這一帶跟秦將王翦、蒙武作戰，故起義軍借用項燕名義，陳勝自立爲楚王。

㊃ 陳勝稱楚王，建國號「張楚」。孔子八世孫孔鮒帶着孔子傳下來的禮器去投奔，封博士。

之」的原則，而代之以反潮流的原則㊀。這是「十大」的一個大功績。

然而，現在情況是一個口號響亮了，人人都來喊：反潮流！

今年（七三）年八月，不是有個張鐵生的也出來「反潮流」了麼㊁？結果一沒有殺頭，二沒有坐牢，三也好像沒有老婆要離婚，反倒是扶搖直上，據說到甚麼學府深造「反潮流」的奧祕去了。可是，那些爲反對林彪體系作了眞正戰鬬的革命者，不少的情況是殺了頭的，頭還是殺了，坐了牢的，仍舊坐着，罷了官的，照樣罷着，他們那有那麼優哉游哉？「你們是爲被打倒的牛鬼蛇神翻案」、「你們是『571』」，不對。林彪的「571」不過是企圖把受他的體系損害的人民羣眾，當作一種「借用力量」去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罷了。「借B52打B52」本身何罪之有㊂？甚至「571」自己也明白那些被損害的人民羣眾是毛主席的力量，而不是它的力量呢！

人民羣眾不是阿斗，他們深知所受的根源，它們攻擊的鋒芒是向着林彪體系，他們誰也沒有表現出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政策的憎恨，相反，他們憎恨那些歪曲和阻撓這個路線和政策的林彪及其體系的既得利益者。他們要求民主、要求社會主義法制、要求保障人民羣眾的革命權利和人身權利。「甚麼？你們要民主？你們是反動派！因爲你們是反動派，所以不能給你們民主。」㊃他們振振有詞，喜歡引用毛主席關於人民民主專政的一段話。

但是反動派的頭上是沒有「反動派」三個字的。「只給人民以民主」，很對。可是，你們還爲林彪體系大喊大叫時，又給了反對這個體系的人民羣眾那怕一點民主沒有呢？給他們的只是殘酷的鬬爭和拘押呢！「不給反動派以民主」，應該這樣。但不要忘了林彪體系風靡一時，甚至廬山成百個中央委員跟着跑㊄，不就是爲反動派服務的民

主麼？這個民主不用你給他也有，一他有權，二他有革命的旗號；你不給人民羣眾，他就沒有，一他沒權，二他有時也打不出革命的旗號。

歷史教訓我們，即使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革命派有時會被認爲是反動派而沒有民主，反動派有時會被認爲是革命派而有民主，甚至出現了革命派遭到鎭壓，反動派青雲直上的反常局面。我們必須對誰是革命派，誰是假革命派，誰是反動派，誰是被打成的「反動派」作認眞的分析。分析的標準只能是看誰的社會實踐代表了廣大人民羣眾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對待所謂「天才」的態度。

世界上沒有超階級的民主。馬克思主義的大師們對階級的民主作過許多論述，他們是把整個的革命階級和反革命階級來加以對立的考察的。

㊀ 中共十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第一章總綱寫着：「全黨同志要有敢於反潮流的精神」。王洪文所作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加以說明：「毛主席指出：反潮流是馬列主義的一個原則。許多同志在討論修改黨章時，聯繫黨的歷史和自己的經歷，認爲這是黨內兩條路線鬬爭中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我們黨在民主革命前期，曾經幾次出現錯誤路線的統治，在民主革命後期和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在以毛主席爲代表的正確路線佔主導地位的情況下，也有過某種錯誤路線、某種錯誤觀點一度被許多人當作正確的東西加以擁護這樣的教訓。以毛主席爲代表的正確路線，同那些錯誤的東西進行了堅決的鬬爭，並且取得了勝利。事關路線，事關大局，一個眞正的共產黨員，就要出以公心，不怕撤職，不怕開除黨籍，不怕坐牢，不怕殺頭，不怕離婚，敢於反潮流。」

㊁ 參71頁註㊁。

㊂ 「571工程紀要」以B—52代表毛澤東。「紀要」之八，「政策和策略」一開頭就說：「打着B—52旗號打擊B—52力量，緩和羣眾輿論。」

㊃ 語見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

㊄ 參頁57註㊆。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人民內部的派別鬬爭所反映的階級鬬爭的經驗，把派別的民主突出地推到了願意研究新問題的馬克思主義者的面前，因爲反映這個階級鬬爭的雙方都應當有民主的權利。一派壓一派是不靈的。這種後遺症至今難道還少麼？於是，它使我們懂得，若不把革命隊伍內部現在可稱之爲「潮流派」和「反潮流派」之間，過去那種壓制與被壓制，甚至鎮壓與被鎮壓的關係，改變成基於團結的批評與反批評的關係，階級的民主是不會存在的。人民民主專政將變成人民派別專政，這個專政派別若是「正確」，它不能團結廣大人民羣眾，它若是錯誤的，便將是社會法西斯的開始。

王洪文同志報告號召人們發揚「五不怕」㊀去反潮流。但是，現在的情況，沒有「大人物」或中央報刊的認可和宣傳，任何思潮都不能形成潮流，尤其是不能形成湧來之勢的潮流。古今往來，中國總會有人爲了說話而不怕殺頭的。魯迅自然是不怕殺頭的一個。但是魯迅尙且可以到日本朋友那裏去發表文章，今天「五不怕」的人們又能到那裏發表他們的文章呢？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幽靈，時常在他們的身邊徘徊㊁，他們不止一次地想到了恢復革命大字報的權威。但是，林彪體系壓迫着他們，「忠」字化的森嚴禮儀在束縛着他們，鐐銬、鐵窗、皮鞭和子彈在等待着他們。

一九六八年以來的中國現實就這樣嚴酷地向人們提出了這麼一個問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死」了麼？

（六）對四屆人大的希望

革命無疑是天下最有權威的東西。曾經使全世界在它的面前目瞪口呆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它所給予中國的社會深刻震動和它的深遠意義，必將影響我們今後的社會主義

整個歷史階段。

即將召開的「四屆人大」，它將怎樣反映被人們稱之爲中國的「第二次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呢？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表現。那麼，它所要制定的國家根本大法——新憲法裏，它將怎樣表現經過文化大革命的中國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羣眾的意志呢？

現在人民羣眾在想些甚麼？要求甚麼呢？他們對「全國人民」的代表大會抱着怎樣的希望？

一、要法制，不要「禮制」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是以「造資反線的反」「奪走資派的權」㊂爲其基本內容的。但是可以說，鎮壓（人民民主）與反（資反線）鎮壓貫串了整個文化大革命的全過程，而且，一九六八年以後的多次運動，也總是要打擊文化大革命中起來造反的人們，簡直把他們非打下十八層地獄不可。正是把文化大革命的羣眾運動鎮壓下去之後，林彪體系才得以確立，他們才能把封建宗法性的字句塞進一九七〇年的「新憲法」（草案）㊃中。

這個基本事實說明了封建性的社會法西斯專制是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危險。

㊀ 參頁87註㊀。

㊁ 「共產黨宣言」寫道：「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徘徊」。李一哲套用這句話。

㊂ 即「造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反」，「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

㊃ 1970年中共第九屆二中全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第一章第二條：「毛澤東主席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是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元首，是全國全軍的最高統帥。林彪副主席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是全國全軍的副統帥。毛澤東思想是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

我國是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脫胎進入社會主義的，幾千年的封建專制所形成的傳統，頑強地盤踞在思想、文化、教育以及法律等上層建築各個領域。

劉少奇，特別是林彪身上所表現出來的強烈的封建性和宗法性，難道還不足以證明，反封建依然是我們繼續革命的一個重要內容嗎？

還有甚麼能比「誰反對毛澤東思想就打倒誰」的原則更能成爲維護林彪體系「禮治」的神聖支柱呢？名爲樹人，實爲樹己㊀。如果林彪能夠名正言順地上台的話，豈不是誰反對林彪就打倒誰了(實際上他是已經實行了)嗎？而且任何一個大人物只要他宣布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化身，他便從此成爲神聖不可侵犯的了，而「那一小撮」竟敢冒犯了他的尊嚴的革命羣眾，便決不能成爲法律的保護的對象了！

如果我們不去反對這種封建性的「君臣父子，不得犯上」的禮治原則，我們能把無產階級專政的「鎮壓敵人，保護人民」的法治眞正實行起來嗎？

這是一個極大的矛盾，一方面黨的一元化領導決不可動搖，一方面「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派」，而這些走資派恰恰是他們把持的地方和部門的一元化領導的具體體現者。

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應當怎樣保護人民羣眾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下對黨內走資派和錯誤路線鬬爭的權利呢？這是擺在「四屆人大」面前的一個大課題。

不用說黨的領導應當細心傾聽羣眾的意見，也不用說人民羣眾對黨的各級領導實行革命監督的權利，更不用說對走資派造反有理了，即使羣眾的意見是錯誤的，過火的，或者對黨的政策某些方面不理解而發生不滿，難道就可以「說不服就壓，壓不服就抓」麼？而且，香花與毒草、正確與錯誤、革命與反革命，又常常是不那麼容易鑑別的，

要有一個過程，要經歷時間的考驗，因此，我們不應當怕光明正大的反對派，界限是服從紀律不要搞陰謀詭計㊁。

「四屆人大」應當明文規定，除了殺人、放火、流氓、盜竊等刑事犯和挑動武鬬、組織陰謀集團分子必須實行專政外，應當保護人民羣眾的一切應有的民主權利。

二、限制特權

承認不承認中國正在出現一個如蘇聯那樣的特權階層（劉少奇、林彪等不過是他們政治上的代理人罷了），這是肯定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論問題。

必須首先指出，我們的黨員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但是，這個特權階層是客觀存在的，是我國社會經濟條件下所不以人們的意志爲轉移而產生的。

「當今社會走後門成風」的現實從那裏來？對社會的產品肆意揮霍，高級的驚人享受，是從那裏來的？相當的部分高幹子弟理所當然有財產權力的變相世襲從那裏來的？新資產階級佔有方式和維護這種佔有方式的政治手段憑藉的又是甚麼呢？文藝、教育、「五．七幹校」、上山下鄉、吐故納新㊂、上大學、培養接班人等等，幾乎每個被人們稱之爲「新生事物」的地方，都可以成爲特權顯聖的場所。

㊀ 毛澤東批判林彪、陳伯達說：「甚麼『大樹特樹』，名曰樹我，不知樹誰，說穿了是他自己。」（見「毛主席在外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同志的談話紀要」）

㊁「毛主席說，希望你們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見「毛主席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負責同志談話紀要」）

㊂ 毛澤東文革時曾作指示：「一個人有動脈、靜脈，通過心臟進行血液循環，還要通過肺部進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進新鮮氧氣，這就是吐故納新，才能朝氣蓬勃。不清除廢料，不吸收新鮮血液，黨就沒有朝氣。」

難道我們不可以說蘇聯的演變是從蘇聯的高級幹部實行了高薪制而向資產階級專家看齊的麼？在我們中國，對據說爲革命流了很多血汗的老幹部實行某種特殊的照顧，即使是傳統所允許的，老百姓也沒有表示多大的異議的話，但是我們能夠輕視對政權的腐化作用和對新的社會關係帶來的影響麼？我們能夠對正在產生和形成的新貴族、新的資產階級熟視無睹嗎？

我們不是空想社會主義者，我們承認我們社會現階段在存着種種差別，它並不是一個法令所能完全消滅的。但是，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的自身發展的規律，不是要擴大這些差別而是要消滅這些差別，更不允許這些差別擴大爲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特權 。 特權本身是和老百姓的利益根本對立的。爲甚麼我們要那麼迴避對於特權的批判呢？爲甚麼要用所謂「好人」「壞人」的問題去偸換「走後門」反映在路線上的大是大非呢？

四屆人大應當明文規定限制特權的條文。

三、保證人民對國家和社會的管理權

一九六九年的「新黨章」、一九七〇年的「新憲法」（草案），把林彪這樣一個法西斯魔王法定爲接班人的事實㊀，使中國人民看到了一個極其可怕的陰影。同時，也給人民提出了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我們應當怎樣保證我們黨和國家的政權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裏呢？無產階級事業接班人應當怎樣才能「千千萬萬」地湧現出來呢？使「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青年成了勇敢的闖將」的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使毛主席和廣大人民羣眾非常反感的是那些充滿宗教情緒的「活學活用」（即投機取巧）的「積極分子代表大會」㊁。

毛主席提出了接班人的五條 ，但林彪也提出了他的三條㊂。在林彪體系得到了確定的那幾個年頭，幹部的選拔和

培養，主要地是用了林彪的三條。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是從天才家族的根苗中挑選的；還是在大風大浪中成長，在階級鬬爭中湧現的呢？這個問題直到如今理論和實際還是多麼矛盾啊？

㊀ 參頁65註㊆，頁89註㊃。

㊁ 即「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代表大會」。毛澤東曾多次接見此類大會代表。

㊂ 1964年7月14日中共中央「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毛澤東提出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五個條件；後經過整理修改，載入九屆、十屆中共黨章，內容如下：「㈠認眞學習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批判修正主義；㈡爲中國和世界的大多數人謀利益；㈢能夠團結大多數人，包括反對過自己反對錯了並且認眞改正錯誤的人，但是，要特別警惕個人野心家、陰謀家和兩面派，防止這樣的壞人篡奪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保證黨和國家的領導權永遠掌握在馬克思主義革命家手裏；㈣有事同羣眾商量；㈤勇於批評和自我批評。」

林彪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提出全面考查幹部的標準說：「我們按毛主席講的無產階級事業接班人的五條原則，提出三條方法，主席同意了。

㈠高不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反毛澤東思想的罷官。

㈡搞不搞政治思想工作，同政治思想工作搗亂的、同文化大革命搗亂的罷官。

㈢有沒有革命幹勁，完全沒有的罷官。

這三條同主席的五條原則是完全一致的，我們要按毛主席的五條原則和這三條特別是第一條作爲選擇和使用幹部的標準。」

1966年8月1日林彪在軍事幹部會議上提出「關於幹部路線問題」時說：「根據毛主席歷來的指示，根據毛主席提出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五個條件，結合我軍實際情況，提出了培養和選拔幹部的三條標準，這就是：第一、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忠於毛主席，忠於毛澤東思想；第二、突出無產階級政治，密切聯繫羣眾；第三、有革命幹勁。識別幹部、選拔幹部，一定要注意大節，貫徹黨的階級路線。當然也要注意小節，但主要是看大節，看是不是符合這三條標準。」

「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人民給的。我們的幹部不應是做官當老爺，而是人民的勤務員。但是權力是最能腐蝕人的。一個人的地位改變了，是最能考驗他爲大多數人謀利呢，還是爲少數人謀利？能否保持爲人民服務的精神，除了他自己的努力之外，最主要的是人民羣衆的革命監督。而羣衆運動是一個革命者保持革命精神的最豐富的源泉。

應當怎樣規定人民羣衆對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的革命監督權利呢？並且應當怎樣明白規定，當某些幹部（特別是中央機關的高級幹部）失去了廣大人民羣衆信任的時候，人民「可以隨時撤換他們」呢？

「四屆人大」應當回答這些問題。

四、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制裁反動派

我們的憲法、黨章以及中央文件不是寫上了人民的民主權利麼？是的，寫了，不但寫了，而且還規定了「保障人民民主」，「不准打擊報復」，「嚴禁逼、供、信」㊀。可是事實上都是經常不能保障，卻是經常「准」對革命幹部和羣衆實行法西斯專制，關的關、殺的殺，製造假案，甚至大興野蠻的肉刑就是「嚴禁」不了！

中國人民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根本任務，在正確路線指引下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可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個革命綱領，在反動派的手裏就變成爲對羣衆的革命意圖的諷刺，從而成爲不共戴天的敵人手中最厲害的殺人武器。

不懲辦一些堅持反革命路線、變無產階級專政爲法西斯專政、血腥鎮壓和屠殺革命羣衆的民憤極大的蔣匪幫，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是確立不起來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不能鞏固的。必須對鎮壓人民者實行鎮壓。「四屆人大」應當明文規定，制裁那些知法犯法，執法犯法，製造假案，公報私仇，私立專案，私設監獄，大興肉刑，草菅人命，罪

惡極大的「大夫」們的條例。

五、落實政策

一九六九年「九大」就已經提出「當前的主要任務，是落實（政策）」，至今五年了，林彪垮台也已經三年了，爲甚麼許多重要的黨的無產階級政策落實不了？

同時近年來，政策的多變，甚至「朝令夕改」（有認識上的原因但主要是反映了路線鬬爭的激烈）加上土政策層出不窮，造成了人們的思想混亂，甚至對黨懷疑。我們認爲「四屆人大」應重申黨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那些經實踐證明是正確的應長期實行的政策，並應通過法的適當形式體現出來。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對於那些嚴重破壞黨的政策的人應當嚴肅處理。

六、各盡所能按勞分配

一九六八年夏季以後，由於政治上的民主權利的壓制，特別是林彪的法西斯的組織路線，他們任人唯親和對逆己勢力採取懲罰主義的人事調動，搞大換班，使得「各盡所能」、「任人唯賢」的原則受到了破壞，人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受到了摧殘。

我們在看到特權膨脹的同時，同樣清楚地看到了工農勞動羣衆在所謂「公產主義」的口號下，他們許多合理的經濟利益遭到了剝奪。工人多年沒有提高工資了，而且還取消了曾作爲他們工資一部份的合理獎金；而農民羣衆在無償的「忠」字糧，高徵購以及「割私有制尾巴」㊁的運動

㊀ 嚴刑逼供而予以採信，即刑求。

㊁ 捐獻糧食以表示忠於毛主席和他的革命路線，叫「忠字糧」。超過定規，高額向農民徵購農產品，謂「高徵購」。

將農民私有財產充公，叫「割私有制尾巴」。

中，遭到了更大的損害。這個林彪的極「左」路線所帶來的危險性，現在越來越充分地顯現出來了。

列寧不是歡呼「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爲「偉大的創舉」嗎？中國的勞動人民在革命戰爭時期；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高潮中，在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不是也湧現了無數富於自我犧牲精神大公無私的革命英雄麼？這正是極爲寶貴的人民羣眾的歷史主動性。但是，能不能由此而絕對化，認爲精神可以代替一切了，可以代替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了？顯然這是極其荒謬的，它必然受到歷史規律的懲罰，它也已經遭到了懲罰。

文化大革命中，我們反對了高工資、高獎金、高報酬，但是我們應當絕對地否定獎金的作用麼？一個比較積極、認眞負責、超額完成任務或者有所發明創造的工人，爲甚麼不可以比他的同級工資多得些適當的獎勵？一個業餘從事寫作或者對某一專業有新發現、新發明的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爲甚麼不可以得到適當的物質鼓勵呢？空頭政治的原則是獎懶罰勤的原則。無產階級政治掛帥的「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是調動和保護人民羣眾社會主義積極性的原則，而且認眞實行這個原則，也是對特權的最有效的限制措施呢！

「四屆人大」應當明文規定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條文。

我們對「四屆人大」抱有很大的希望。我們希望能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一個勝利的大會，開成一個反映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廣大人民羣眾統一意志和願望的大會。

但是，毛主席在與林彪反黨集團激戰的關頭引吭高唱悲壯的國際歌㊀，已經深深地震動了廣大人民羣眾。他們知道，新憲法的規定只是再次給了我們一個武器，要眞正實行還必須靠廣大人民自己的鬭爭。

一九五四年的憲法不是也規定過人民的民主權利麼？毛主

席不是還多次說到：「沒有廣泛的人民民主，無產階級專政就不能鞏固」麼？但是，一方面存在着林彪爲代表的鎮壓人民的反民主勢力；另一方面也由於人民羣眾自已對這個民主權利運用得太少了（這是由於中國封建傳統的根深蒂固，也由於我國生產還比較落後，人民的文化水平還不高，因而比較缺乏民主精神的緣故），毛主席提出多年的「造成一個生動活潑政治局面」的目標，還遠遠沒有達到。

正如一個南方水鄉的客人來到沙漠中才覺得水的可惜一樣，文化大革命中人民羣眾的民主權利也是在遭到剝奪的時候，才更感到民主權利的珍貴。盡管一九六八年把廣大人民羣眾（尤其是革命造反派羣眾）殘酷地鎮壓下去了，但是「現在的世界潮流，反民主的反動派只是一股逆流。」一個徹底摧垮林彪體系的羣眾運動在不久的將來必定會到來，他們必將重新恢復和發展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切精神。

一九七三年 九 月十三日初稿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二稿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 七 日定稿

㊀ 參81頁註㊆。

啓 事

根據不少同志的建議，爲了能夠方便更多的人對我們此文的觀點加以研究、批評、批判，我們打算將此文油印，但鑑於我們的困難，懇切希望廣大革命同志能夠在紙張上給予我們支持，十張、百張、千張、萬張，多多益善，少少無拘。

若願意幫助的，請與廣州新港路廣東人民藝術學院（原廣州美術學院）李正天聯繫。

致

崇高革命敬禮

李 一 哲 十一月十一日

附錄一：

對「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的批判

宣集文

在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偉大勝利，批林批孔運動普及、深入、持久地開展，無產階級專政空前鞏固，社會主義到處都在勝利前進的一片大好形勢下，在社會主義祖國南大門——廣州市的大街上，李一哲拋出了一張洋洋兩萬餘言的反動大字報「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及其「序言」（以下簡稱「民主與法制」）。在這裏，作者提出了自稱是「全面」「自我暴露」的李一哲「體系」。這個李一哲「體系」，對於革命的人民來說，無疑是一份極好的反面教材。它又一次從反面教育了革命的人們，在大好形勢下，「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鬭爭」！

這張反動大字報在「批林」的幌子下，對偉大領袖毛主席、黨中央，對社會主義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對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進行了一系列的極其惡毒的攻擊。它還極力鼓吹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法制，妄圖糾集一切牛鬼蛇神，煽動羣眾，製造混亂，在中國重演「匈牙利事件」。總之，這張大字報的要害就是反對和擺脫黨的領導，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

李一哲反動「體系」的出現，絕不是偶然的。它是當前階

級鬭爭深入發展的反映，正如許多革命羣眾尖銳指出的：李一哲在此時此地迫不及待地拋出他們的反動「體系」，是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的，是蓄意破壞毛主席關於要安定、要團結的指示㊀，破壞當前大好形勢，破壞四屆人大的召開，一句話，就是要無產階級下台，資產階級上台！對李一哲的這張大字報的反動本質，我們必須從政治上、思想上予以徹底的揭露和批判。盡管它打着「批林」的幌子，披着「社會主義」的僞裝，裝着「關心羣眾」的樣子，耍着兩面派的手法，到處大喊大叫他們的「體系」如何「嚇人」，如何「叫人害怕」，如何「令人望而生畏」，如何「咬不動，吞不下」，用盡了一切爲了嚇唬別人，也爲了給自己壯膽、打氣的詞句。但是，革命人民在長期鬭爭中深深懂得，這不是甚麼「勇敢」，而是膽怯心虛。在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鍛煉的廣大革命羣眾面前，在革命大批判的烈火熊熊燃燒起來的時候，它終必原形畢露，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落得個可恥的下場！

下面，我們分四個問題，對李一哲的反動「體系」進行批判。

一、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攻擊以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

李一哲在「民主與法制」這張反動大字報中，儘管玩弄了種種隱晦的手法，但其通篇攻擊的矛頭，始終是指向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指向以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其險惡用心，較之一九五七年的資產階級右派以及吳晗之流，實在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對此，我們必須給予迎頭痛擊，堅決捍衛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捍衛以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

特別令人不能容忍的是，李一哲在他們的「體系」中，明目張膽地含沙射影，指桑罵槐，叫嚷着：「我們對秦始皇不表尊敬的態度。」這是他們從林彪以及資產階級右派那裏學來的、借以惡毒攻擊我們偉大領袖的一套慣用的卑劣手法。誰都知道，在「『571工程』紀要」中，林彪一伙不是借古諷今，藉攻擊秦始皇，大肆攻擊毛主席、攻擊無產階級專政嗎㊁？李一哲在他們的大字報中，竟然膽敢揀起林彪一伙的破爛，與林彪一伙同唱一個調子。這位自稱「不畏虎的年輕人」，畢竟還算「坦率」一些，他們按捺不住心頭之恨，不但對秦始皇「不表尊敬」，而且還聲言要「對他進行無情的批判」。這也充分說明，李一哲之流比起他們那些老奸巨滑的前輩來，倒稱得上是「初生之犢」，勇氣十足！他咬牙切齒地污衊我們肯定秦始皇的作用，是「爲社會法西斯主義作輿論，以完成林彪未竟的事業」。請看，他的反動矛頭究竟指向誰，不是昭然若揭了嗎？剝掉李一哲「體系」的僞裝，用毛主席爲我們規定的識別香花與毒草的「六條標準」㊂和「三要三不要」㊃的

㊀ 1974年10月中共中央發出「中發（1974）26號」文件，傳達毛澤東一項最新指示：「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爲好。全黨全軍要團結。」

㊁ 「571工程紀要」指責毛澤東：「…… 濫用中國人民給予予的信任和地位，歷史地走向反面，實際上他已成爲當代的秦始皇。」「他不是一個眞正的馬列主義者，而是一個行孔孟之道，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㊂ 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八、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毛澤東提出了識別「香花」、「毒草」的六條標準：「㈠有利於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㈡有利於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而不是不利於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㈢有利於鞏固人民民主專政，而不是破壞或者削弱這個專政；㈣有利於鞏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壞或者削弱這個制度；㈤有利於鞏固共產黨的領導，而不是擺脫或者削弱這種領導；㈥有利於社會主義的國際團結和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國際團結，而不是有損於這些團結。這六條標準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兩條。」

㊃ 參頁91註㊁。

基本原則來衡量，我們就不難看出，李一哲不僅是在反對毛主席對秦始皇的科學評價，而且是同中外反動派一樣，借攻擊秦始皇來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

李一哲在他們的「體系」中，瘋狂地反對毛澤東思想。他們採取魚目混珠的手法，把我們全黨衷心擁護、黨章上明確規定的以毛澤東思想作爲黨的指導思想汚衊爲「封建性」的「新的禮教原則」，並且別有用心地把它汚衊爲「維護林彪體系『禮治』的神聖支柱」。這是無恥的讕言，惡毒的攻擊。半個多世紀以來的革命實踐證明：中國革命的一切勝利，都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我們的黨章一再重申：「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爲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在中國共產黨人和全國人民看來，對毛主席、毛澤東思想的態度，過去是、現在是、今後仍然是區分革命或反革命，眞革命或假革命的一個重要標準。李一哲這張披着「批林」外衣的大字報，對林彪的「語錄不離手，萬歲不離口」，僞裝「擁護」毛主席，假借「捍衛」毛澤東思想進行反革命活動的兩面派陰謀一字不提，卻在那裏大肆攻擊以毛澤東思想作爲黨的指導思想是甚麼「封建性」的「新的禮教原則」，要砍掉這條「神聖支柱」。胡說甚麼「不准思想，不准研究，不准探索——簡直取消了八億個大腦！」其罪惡目的就是煽動地富反壞右㊀、牛鬼蛇神起來，同他們一起瘋狂反對毛澤東思想。同時，他們還掛着「批林」的招牌，全盤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億萬羣眾掀起的學習毛澤東思想的羣眾運動，對懷着滿腔熱情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廣大革命羣眾，極盡攻擊、汚衊之能事，字裏行間，切齒之聲可聞，這亦充分暴露了他們對毛澤東思想的極端仇恨。

李一哲在他們的「體系」中，瘋狂攻擊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對「海瑞罷官」的批判。胡說甚麼吳晗說海瑞是「愛護人民的」曾經遭到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篇

文章的批判，那麼現在又有人說：「法家是愛護人民的」，這豈不是一個嚇死人的「回潮」麼！並且公然提出要對海瑞「落實政策」。請問：「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篇文章」是誰領導、誰批准的？李一哲爲海瑞抱不平的矛頭究竟指向誰？這個問題，不但我們心裏明白，就就連李一哲他們自己也明白，不然，他們爲甚麼對「第一篇文章」故意躲躲閃閃呢？李一哲在他們的「體系」中，還大肆攻擊我們黨中央關於批林整風和批林批孔的一系列指示，他們汚衊黨中央提出的批判林彪路線的極右實質是甚麼「王明反李立三」。言下之意，就是王明不反李立三之「左」而反李立三之右，結果犯了比李立三更「左」的路線錯誤，而今天黨中央好比「第二次出現的王明」，不反林彪之「左」而反林彪之右，同樣是犯了更「左」的機會主義路線錯誤。他們煞費苦心地在「左」右問題上大做文章，其目的無非是用以掩蓋林彪妄圖從根本上改變我們黨的基本路線和政策，顚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的極右實質。他們還放肆攻擊我們黨中央關於把「走後門」問題放在運動後期妥善解決，以免冲淡批林批孔的指示，胡說這是「迴避對於特權的批判」，攻擊黨中央用「好人」、「壞人」的問題，掩蓋「路線上的大是大非」，妄圖挑起羣眾對黨的不滿，搞亂黨中央對批林批孔運動的部署。他們胡說十大提出的反潮流原則是個「茶餘飯後，說說而已」的空洞的口號（「二稿」），並用惡毒的語言譏諷張鐵生、黃帥的反潮流精神，胡說這些革命小將，充當了「某些人」「可以利用」的工具。顯然，上述這些謬論，都是直接攻擊黨中央和中央領導同志的。他們極力要造成一種印象：反潮流只是一句空話。這正好說明，他們所主張的「反潮流」，同我們所主張的反潮流，有着原則的區別。細讀這張反動

㊀ 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簡稱爲「地富反壞右」，又稱「黑五類」。

大字報，不難一眼就可以看穿，他們所要反的，不是修正主義、資本主義的錯誤思潮、錯誤路線，而是以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以及中央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決策。這樣的「反潮流」，難道是我們所能容許的嗎？

二、惡毒攻擊社會主義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

李一哲肆意歪曲馬列主義，採取揑造事實，顚倒是非，強栽硬塞的卑劣手法，惡毒攻擊社會主義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他們編造了一套所謂我國已經出現了「新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關係的變動」的謬論，並以此作爲立論的根據，汚衊我國各級黨政領導是「特權階層」、「新貴集團」，惡毒攻擊我國無產階級專政是「封建性的社會法西斯專制」；美化自己是「一個新興的社會力量」，要依靠他們來進行所謂「新的政治變革」。李一哲還自我標榜說，「我們的『體系』……提出了新生資產階級新的資產階級佔有方式以及同他們作鬪爭的問題。」

應當指出，李一哲的這個「體系」，並不是甚麼新貨色，而是在馬列詞句掩蓋下推銷的新老修正主義的黑貨。不管他們用了多少個「新」字來嚇唬人，他們的僞裝必須剝掉，他們販賣的那些反動謬論，必須堅決予以揭露和批判。

駁所謂各級黨政領導是「特權階層」、「新貴集團」。

李一哲根據他們對「新的階級矛盾」的分析，得出來這樣一個結論，即：「中國正在出現一個如蘇聯那樣的特權階層」，並且汚衊各級黨政領導已經「完成了『人民公僕』向『人民的主人』的質的轉變」，是「新生資產階級」，是「新貴集團」。

「中國正在出現一個如蘇聯那樣的特權階層」嗎？各級黨政領導已經「完成了『人民公僕』向『人民的主人』的質的轉變」了嗎？這是李一哲的無恥揑造，是對我們黨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最惡毒的誹謗。

我國是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指引下，我國基本上完成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㊀，在政治思想戰線上進行了一次比一次更深刻的社會主義革命。特別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偉大勝利，粉碎了劉少奇、林彪兩個資產階級司令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深入人心，各級領導的階級鬪爭、路線鬪爭和繼續革命的覺悟大大提高，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更加鞏固。解放二十五來，我國已經由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變成了一個初步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是誰也抹煞不了的事實。而李一哲竟然睜着眼說瞎話，在那裏編造一套套謊言。這能夠騙得了誰呢？

誠然，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在我們幹部隊伍裏，某些人存在着特殊化、特權思想和「走後門」之類的不正之風；某些意志薄弱者，由於受資產階級的腐蝕，有的人「化公爲私」，個別甚至貪汚盜竊，投機倒把，蛻化變質；甚至存在着混進黨內竊踞領導職位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例如劉少奇、林彪）。這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階級鬪爭的反映。毛主席正是根據國內外階級鬪爭的現實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㊁。我們黨正是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堅持一條馬克思主義的路線，用馬克思主義戰勝修正主義，用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使我國沿着社會主義道路勝利前進。所以，我國沒有出現像蘇聯那樣的特權階層，更沒有蛻變爲社會帝國主義。李一哲故意迴避這些具有決定意義

㊀ 將生產資料由私有變爲集體所有或國有，叫做「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

㊁ 參頁47註㊂。

的事實，而在那裏玩弄卑鄙手法，把我們黨反對的並與之作鬬爭的東西，甚麼「走後門」、甚麼「化公爲私」、甚麼「特殊化」、「特權思想」等等硬栽到我們黨的頭上，把它說成是黨的各級領導幹部特別是國家的領導人所固有的，妄圖用此得出我國已經形成「特權階層」的結論，這豈不是十分荒唐可笑嗎？

也許李一哲會辯解說，我的大字報不也說過「黨多數幹部是好的和比較好的」的話嗎？的確，他們是這樣說過，但這只是欺騙人的幌子。如果他們確實承認黨的多數幹部是好的和比較好的，那就應該承認這些幹部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是努力貫徹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就應該承認這些幹部正是在毛主席的領導下，爲了保證我們的黨和國家不改變顏色，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同修正主義、資本主義以及各種沒落階級的意識形態作鬬爭，堅持黨的優良作風，堅持黨的羣眾路線，堅持幹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的制度，不斷在三大革命鬬爭㊀中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如果承認了這些事實，那他們惡意揑造的「特權階層」、「新貴集團」不就是不攻自破了嗎？但是李一哲是不肯罷休的。他們的謊言越編越多，越造越離奇。甚麼「我國階級關係的變動和新的階級矛盾」呀！甚麼「新資產階級佔有方式」呀！不一而足，妄圖用僞裝的馬列主義來嚇唬人。甚麼叫做「新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關係的變動」呢？李一哲「體系」告訴人們，革命的對象變了，敵人已經不是被中國人民親手打倒的地、富、反、壞、右以及他們在黨內的代理人劉少奇、林彪之流，而是由各級黨政領導組成的「新生資產階級」、「特權階層」。革命的動力也變了，他們叫囂要依靠甚麼「新興的社會力量」（所謂「新興的社會力量」是些甚麼人，本文還要揭露、批判），來推翻他們炮製出來的「特權階層」、「新貴集團」。這就是他們講的所謂「新的階

級矛盾」和「階級關係的變動」，這就是李一哲心目中的社會主義中國的「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

李一哲惡毒攻擊我們黨，攻擊社會主義制度，汚蔑各級黨政領導是「特權階層」的謬論是赤裸裸的。他們不是得意忘形地把鍾志民堅持毛主席革命路線，退學、退伍、下鄉務農的革命行動，汚蔑爲從「享有各種特權的階層中」叛逆出來嗎？而那位曾跟隨毛主席南征北戰，並決心改正所犯「走後門」的錯誤，表示堅決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的老紅軍，卻成了他們咒罵爲「特權階層」的典型㊁。他們使用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無限誇大的手法，得出結論說這是「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我國階級關係的變動和新的階級矛盾狀況」。顛倒是非，混淆黑白，何其毒也！

李一哲爲了替自己的反動理論辯護，引證了黨的基本路線，並明目張膽地加以歪曲和篡改。黨的基本路線明明是說「存在着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我們必須堅持反復辟的鬬爭。而李一哲卻說「特權階層是客觀存在的，是我國的社會經濟條件所不以人們意志轉移而產生的」，「黨內走資派和野心家的社會基礎是從特權孵化出來的新生資產階級」，當權的各級領導已經「完成了『人民公僕』向『人民的主人』的質的轉變」。這就從根本上歪曲了黨的基本路線，誣衊了我國社會主義的現實。

黨的基本路線告訴我們，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鬬爭，資本主義復辟和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鬬爭，是不可避免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還沒有解決。但是，絕不能說，產生特權階層，復辟資本主義，是不可避免的，更不能說，這已經成

㊀ 階級鬬爭、生產鬬爭、科學實驗合稱「三大革命鬬爭」。是毛澤東提出來的。

㊁ 指鍾志民父親鍾學林，參頁48註㊂。

爲現實。只要我們黨有一條馬克思主義路線，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繼續革命，就能夠戰勝資本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李一哲說特權階層是客觀存在，是我國社會經濟條件下不以人們意志轉移而產生的，就是說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本身決定的，不可避免的。這是一種妄圖瓦解社會主義制度的反動理論，也是對我國社會主義現實的惡毒誣衊。

其實，李一哲的這些破爛，一點也不新鮮，臭名昭著的帝國主義代言人杜勒斯，㊀早在二十多年前就鼓噪拍賣了。「民主與法制」的作者，難道眞的不想同杜勒斯之流「劃清界線」嗎？

駁所謂「封建性的社會法西斯專政」。

李一哲在污衊我國已經出現資本主義復辟，各級黨政領導已經變成「特權階層」的同時，懷着刻骨的仇恨，咬牙切齒地咒罵我國無產階級專政是「獨裁專斷」，是「封建性的社會法西斯專制」，污衊我們偉大的黨是「君臣父子黨」，污衊我們偉大的人民軍隊是「北洋軍那樣的軍隊」，並且叫囂要加以「徹底摧垮」。這就充分暴露了他們極端狂妄的狼子野心。

李一哲向無產階級專政的猖狂進攻是在「反對林彪體系」的口號下進行的。這是無產階級專政下階級敵人慣用的兩面派的卑鄙伎倆。試問，你們瘋狂反對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污衊我們各級黨政領導是「特權階層」，攻擊我們黨的一系列路線、方針、政策，難道矛頭是指向林彪的嗎？難道你們不正是由此得出結論：現在的政權已經變質，而必須加以「徹底摧垮」嗎？假的就是假的，僞裝應當剝去，撕開畫皮，顯露在人們面前的只不過是幾個妄圖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小丑而已。

爲了對無產階級專政進行攻擊和污衊，李一哲竟捏造事實，說甚麼「六年前，林彪那一套（體系）的確立」，

「取代了毛主席的那一整套」，於是，「社會主義的法制突然不靈了」，我國的無產階級專政「突然」蛻變爲「封建性的社會法西斯專制」了。但是事實是怎樣呢？眾所周知，六年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經過激烈的搏鬭，粉碎了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不斷排除了林彪路線的干擾，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斷取得了新的勝利，在毛主席的革命大聯合的偉大號召下，各省、市、自治區紛紛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實現了全國一片紅，無產階級專政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李一哲竟把這說成是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突然」蛻變爲「封建性的社會法西斯專制」，這不是別有用心的誣衊又是甚麼？

李一哲顚倒是非，混淆黑白，把我們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描繪成「陰森恐怖」的世界，比之歷史上北洋軍閥和蔣匪幫的反動統治，「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完全是惡毒的攻擊。毛主席在駁斥反動派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污衊時曾尖銳地指出：「『你們獨裁。』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總之是一樣，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只讓人民有發言權。」㊁很顯然，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感到「陰森」、「恐怖」的只是一小撮反動派，而絕不是革命人民。李一哲把無產階級專政說成比北洋軍閥、蔣匪幫反動政權還「可惡」，並胡說甚麼「魯迅尙且可以到日本朋友那裏去發表文章，今天『五不怕』的人們又能到那裏去發表他們的文章呢？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幽靈，時常在他們的身邊徘徊。……鐐銬、鐵窗、皮鞭和子彈等待着他們。」李一哲如此咬牙切齒來攻擊無產階級專政，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

㊀ 美國艾森豪當總統時期的國務卿，極端的反共分子。
㊁ 語出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

革命，惡毒咒罵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甚麼「幽靈」。他們究竟愛甚麼，恨甚麼，為誰鳴冤叫屈，代表那個階級講話，不是十分清楚了嗎？

李一哲為了汚衊無產階級專政，還製造了一個「理論」根據，即所謂「封建性的社會法西斯專制」的產生，也是中國的社會歷史條件決定的，因為「延續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使它的意識形態根深蒂固」，「封建時代獨裁專斷的習慣深中於羣眾乃至一般共產黨員的頭腦之中。」㊀但這是枉費心機的。首先，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基礎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它和一切反動沒落階級的意識形態是根本對立的。其次，我們從來認為封建沒落階級的意識形態，延續了兩千多年，一直影響到現在，這正是我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在意識形態領域階級鬬爭長期性、複雜性的一種表現，同這種傳統觀念作鬬爭，包括在上層建築各個領域實行全面的專政，是無產階級面臨的重要任務之一。當前深入開展的批林批孔運動就是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領域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一場政治思想上的大革命。李一哲把與無產階級專政格格不入的封建意識形態硬栽到無產階級專政的頭上，把「封建時代獨裁專斷的惡習慣」強加給廣大羣眾和我們黨的廣大黨員，以此作為他們「論證」現在的無產階級專政已經是「封建性的社會法西斯專制」，從而達到他們不可告人的目的，這是絕對辦不到的。

李一哲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攻擊和誣衊實際上並不是甚麼新的創造，而是從新老修正主義者那裏揀來的破爛。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的頭目考茨基㊁就曾誣衊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是「獨裁」、「專制」；現代修正主義的頭子赫魯曉夫也曾打着「社會主義民主、法制」的旗號，惡毒咒罵斯大林，詆譭無產階級專政；叛徒、賣國賊林彪，在「『五七一工程』紀要」中更是肆無忌憚地攻擊無產階級專政是「封建

專制獨裁」、「社會法西斯主義」㊂。由此可見，在李一哲的身邊的的確確是游盪着一個幽靈，那就是考茨基、赫魯曉夫、林彪之流的幽靈。如果不把無產階級專政「摧毀」，他們是死不甘心的。

毛主席在四十一年前曾經指出：「世界上一切革命鬬爭是為着奪取政權，鞏固政權。而反革命的拚死同革命勢力鬬爭，也完全是為着維持他們的政權。」新中國成立以來的階級鬬爭實踐證明，一切階級敵人要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總是要把矛頭指向無產階級專政。現在李一哲也這樣做，這正好從反面說明，無產階級專政對於勝利了的人民是一個護身的法寶，「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樣地不可以須臾離開的東西」。

戳穿所謂「新興的社會力量」。

李一哲之流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依靠的是甚麼力量呢？用他的們話來說，就是「一個新興的社會力量」。這是他們根據所謂「我國階級關係的變動和新的階級矛盾狀況」提出來的。

到底這個「新興的社會力量」是些甚麼人？李一哲說，這個「新興的社會力量」的「羣眾基礎」，就是在「民主精神的普遍高漲」中匯集起來的人。這些人是甚麼階級的，可不必問，只要是有「民主精神」，敢於反抗所謂「封建性的社會法西斯專制」的，縱然是牛鬼蛇神，或者是甚麼人，都行。

㊀ 這是毛澤東的話，參「代序」頁6—7。
㊁ 考茨基（**Karl Johann Kautsky**, 1854—1938）奧國人，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第二國際理論家，被現有的共產黨政權認為著名的修正主義者。考茨基提倡「純粹民主」和「超階級民主」理論，反對布爾什維克，指責列寧獨裁。
㊂「517 工程紀要」指斥中共社會：「他們的社會主義實質上是社會法西斯主義，他們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把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制獨裁式的家長制生活。」

李一哲們自詡是「一個新興的社會力量」；林彪一伙在其「『五七一工程』紀要」中則說「在全國只有我們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氣蓬勃」，「革命領導權歷史地落在我們艦隊㊀頭上」。請看，他們的黑話何其相似乃爾！不僅反動思想非常一致，而且語言也幾乎一模一樣。

在我國八億人口中，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貧下中農㊁是工人階級的最可靠的同盟軍。工人階級是新的生產力的代表，它的階級地位和所從事的大工業生產，決定了它最有遠見，大公無私，最富於革命的徹底性。我們的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我們的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黨和國家的性質決定了我們必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這是我們黨的階級路線。毛主席教導我們：「整個革命歷史證明，沒有工人階級的領導，革命就要失敗，有了工人階級的領導，革命就勝利了。」要取得我們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勝利，除了堅定地依靠整個工人階級、依靠工人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軍貧下中農之外，是不能去依靠任何其他階級或別的甚麼「新興的社會力量」的。李一哲的大字報，非常鮮明地表明：他們依靠的根本不是工人階級，根本不認爲工農兵是革命的主力軍，根本不認爲地、富、反、壞、右是階級敵人，而在對所謂「特權階層」、「新貴集團」等蠱惑人心的口號下，卻提出要依靠他們自己的所謂「新興的社會力量」，妄圖從根本上取消黨的階級路線，以便混水摸魚，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惡目的。

現在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了李一哲的「體系」，肆意地歪曲、篡改了馬列主義，惡毒地攻擊社會主義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污蔑我國社會的階級關係已發生了新的變化，出現了新的矛盾，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都發生了質的變化；於是，中國革命的任務、對象和動力統統都變化了。他們妄圖用這一套謬論從根本上代替和改變黨的基本路線和政策，號召牛鬼蛇神出籠，同他們一起在中國進行一場

所謂「新的政治變革」，以達到其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的罪惡目的。這完全是癡心妄想，白日做夢。

三、惡毒污衊、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

無產階級專政的敵人，在這些年來，凡是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黨中央，攻擊社會主義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毫不例外地都必然攻擊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及當前的批林批孔運動，——這是因爲，這些革命運動是他們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最大障礙。

在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問題上，李一哲也極盡歪曲、顛倒、污衊之能事，進行了極其惡毒的攻擊，顯示出他們對這場革命運動的不滿和仇恨。

當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在偉大領袖毛主席領導下，粉碎了以劉少奇爲頭子和以林彪爲頭子的兩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取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進一步鞏固了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時，李一哲卻別有用心地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沒有完成其自身任務」，相反，是「確立了林彪體系」，是「林彪體系」「取代了毛主席的那一整套」；「革命死了」！

當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在偉大領袖毛主席領導下，深入批林批孔，在上層建築各個領域向修正主義、資本主義、孔孟之道等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展開進攻，徹底清算和肅清林彪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和孔孟之道的流毒、影響時，李一哲卻顛倒黑白地說：批林批孔是千方百計地掩蓋

㊀ 在「517工程紀要」中，艦隊是林彪集團的代號。
㊁ 貧下中農是貧農和下中農的合稱。

「血淋淋的」「禮治」的「秘密」，「實際上是在爲社會法西斯主義作輿論，以完成林彪未竟的事業」，並別有用心地「警告」人們：「當前批林批孔的主要危險是在反『復舊』的旗號下維持林彪體系的錯誤潮流」。

在李一哲的眼裏，這幾年，整個形勢都已陷入「在林彪路線淫威下萬馬齊瘖」的「災難」之中！這種對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以來的形勢的污衊、攻擊，及其由此流露出來的對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刻骨仇恨，實難令人相信竟會出自自稱還總算是人民的一分子的李一哲之流的嘴裏！我們說，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形勢「好得很」；而李一哲之流卻睜着眼睛說「糟得很」！一字之差，兩種立場，眞假革命，暴露得非常明顯。

駁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沒有完成其自身任務」，「革命死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體系」「取代了毛主席的那一整套」。

這裏，李一哲不僅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性質、任務作了惡毒的歪曲和篡改，而且對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在偉大領袖毛主席領導下進行了八年的文化大革命，作了全盤的否定。他們甚至喪心病狂地把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與國民黨反動派、北洋軍閥、帝國主義屠殺革命人民的「三·一八」（一九二六年北洋軍閥段祺瑞屠殺北京革命羣眾的「三·一八慘案」）、「四·一二」（一九二七年蔣匪幫發動反革命政變的「四·一二事件」）、「五·卅」（一九二五年上海英帝巡捕槍殺中國人民的「五·卅慘案」）、「六·二三」（一九二五年英、法帝國主義在廣州屠殺中國人民的「沙基慘案」）相提並論，胡說甚麼「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是李一哲的反動立場徹頭徹尾赤裸裸的自我暴露。

甚麼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性質、任務？「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

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羣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鬭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鬭爭的繼續。」這場政治大革命，目的是粉碎修正主義，奪回被資產階級篡奪了的那一部分權力，在上層建築包括各個文化領域實行全面的無產階級專政，鞏固和加強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保證我國繼續沿着社會主義道路大踏步前進。很明顯，這場鬭爭的焦點和實質「是解決兩個司令部的問題，是解決革命與復辟、前進與倒退的問題。但是李一哲卻有意迴避兩條路線鬭爭的實質和要害問題，而抽象地空談甚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是一個最廣泛的人民的革命大民主」（「二稿」。作者作賊心虛，在第三稿中改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從形式上說實際上是一個最廣泛的人民的革命大民主」），是要解決「使人民羣眾牢牢掌握住廣泛的人民民主的武器」，也即所謂「絕對的、無條件的使用大字報」的「民主權利」——「人民的革命大民主」。「民主」、「民主」、「民主」就是一切，一切爲了「民主」。並且據說是這個「民主」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災難」，所以「革命死了」。這不是明目張膽地歪曲和篡改毛主席和黨中央提出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性質和任務嗎？當然，我們這裏分析的，只不過是問題的一個方面，而且可能還不是十分重要的一個方面；因爲在李一哲的心目中，究竟要的是一種甚麼樣的「民主」，爲甚麼他們那麼「熱愛」這種「民主」，那才是一個更能觸及實質性的問題。有人設計了這樣一張漫畫：李一哲左手拿着「民主」的長矛，惡狠狠地指向黨、指向無產階級司令部；右手拿着「法制」的盾牌，保護着一大羣牛、鬼、蛇、神，妄圖逃脫革命利劍的懲罰。對於這個問題，本文的第四部分還將談到，但是，在這裏，我們可以正告自稱「不是異端於馬克思主義」的大字報作者，馬克思主義從來認爲，

民主這個東西，從來就不是一種目的，而只是一種手段。把「絕對的」、「無條件的」民主權利作爲目的、任務去喧嚷，革命的人們終會看到，這只不過是李一哲之流爲了當前政治上某種不可告人的目的和需要而耍的一種權術罷了。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沒有完成其自身任務」？「革命死了」？不，八年來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劉少奇叛徒集團和林彪反黨集團，摧毀了以劉少奇爲頭子和以林彪爲頭子的兩個資產階級司令部，清除了我國無產階級專政機構內部的隱患，使我們的黨更加純潔、更加堅強，無產階級專政空前鞏固，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更加深入人心，促進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不斷向前發展。這是一個極其偉大的勝利。面對我們的國家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出現的這種蒸蒸日上、欣欣向榮，社會主義到處都在勝利前進的大好形勢，「民主與法制」的作者卻通通視而不見，而是躲在陰暗的角落裏向隅而泣，發出了「革命死了」的哀鳴。人們不禁要問：你們究竟爲誰而泣？爲誰哀鳴？你們那個「死」了的「革命」是那個階級的「革命」？

「林彪體系」在文化大革命中「取代了毛主席的那一整套」，林彪的修正主義路線「取代了」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統治地位了嗎？不，這是不折不扣的歪曲歷史，癡人的夢囈與謊言。應該指出，這是一種居心極其險惡的污衊。我們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是遭受到林彪修正主義路線的干擾和破壞，這是階級鬬爭、路線鬬爭尖銳、複雜的一種表現。但是毫無疑問，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始終是按照毛主席的戰略部署，在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指引下進行的，是在同劉少奇、林彪的干擾、破壞反覆較量和鬬爭中進行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直處於主導地位，處於統治地位。正因爲如此，我們才取得了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才開創出今天如此一片革命和建設的大好形勢。也正因爲如此，林賊的反革命政變的陰謀才沒有得逞，這裏值得人們深思的是，李一哲爲甚麼把這個中央早已有明確結論、本來是看得很清楚的問題，卻故弄玄虛，胡謅甚麼出現了「二元狀態」，妄圖用詭辯的手法，爲他們提出的毛主席革命路線被「取代了」的謬論作辯解。他們到底要打甚麼主意？

通觀了「民主與法制」全文，答案就明白了：李一哲所以要揑造出文化大革命中林彪路線「取代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佔了統治地位這個謊言，實際上是要打着「批林」的幌子，欺騙和煽動人們，把佔統治地位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當作林彪體系來批判和否定，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及其偉大成果當作林彪體系來批判和否定，把不斷得到鞏固和發展的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當作林彪的一套來批判和否定。當然，在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鬬爭鍛鍊的革命人民面前，他們種種陰謀詭計，是決不可能得逞的。

駁所謂批孔「實際上是爲社會法西斯主義作輿論，以完成林彪未竟的事業。」

這個極其赤裸裸的反動觀點表明，李一哲對批林批孔運動的不滿和仇恨，簡直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批林批孔運動，是上層建築領域裏馬克思主義戰勝修正主義，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的政治鬬爭和思想鬬爭，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繼續。孔孟之道作爲一種剝削、壓迫之道，反革命復辟之道，歷來就是一切反動派的精神支柱，因而同樣是林彪的反動思想武器。林彪一伙要搞「克己復禮」[1]，復辟資本主義，鼓吹

[1] 「在九大以後，從1969年10月19日到1970年元旦，兩個多月的時間裏，林彪及其死黨就寫了四條『悠悠萬事，唯此爲大，克己復禮』的條幅」——批「克己復禮」，1974年2月20日「人民日報」社論。

「天才史觀」，招降納叛，大搞陰謀詭計，這一切無不乞靈於孔孟之道。林彪本人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孔老二信徒。因此，批孔就是批林的一個組成部份，是深挖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義的老根。把這樣一場偉大的鬬爭，污衊成是「完成林彪未竟的事業」，這不是別有用心地顛倒黑白，惡意攻擊，又是甚麼？

賊喊捉賊，歷來是一切反動派慣用的伎倆。不知甚麼時候，「民主與法制」的作者也學上了這一手。他們在把自己打扮成「反林英雄」時，殊不知得意忘形，露出了自己亦步亦趨地追隨林彪的馬腳。林彪和他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不是喋喋不休地攻擊「秦始皇焚書坑儒」㊀，是「暴君」，借咒駡秦始皇以攻擊我們偉大的黨，攻擊無產階級專政嗎？而今天，我們也竟然看到「民主與法制」的作者，揀起了林彪的餘唾，污衊我們「乘」了肯定焚書坑儒的歷史作用之「機」「鼓吹要從肉體上消滅一切反對派」，「在爲社會法西斯主義作輿論」。這種論調同林彪說的究竟有甚麼兩樣？林彪叫嚷對被打倒的地、富、反、壞、右「一律給予政治上的解放」㊁，而李一哲不是也以「評價」歷史人物爲幌子，要給「吳晗筆下的海瑞」「落實政策」嗎？在這裏，我們沒有必要來重復文化大革命初期對海瑞所作的澈底批判和已經做出的歷史結論。對於吳晗的「海瑞罷官」毛主席已經十分明確地指出：「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人們不禁要問：李一哲叫嚷要給「吳晗筆下的海瑞」「落實政策」，豈不是要是給彭德懷、吳晗「平反」，也要「一律給予政治上的解放」嗎？看來，要「完成林彪未竟的事業」的人是有的，但決不是革命人民，而正是那些賊喊捉賊的李一哲之流。

駁所謂「當前批林的主要危險是在反『復舊』的旗號下維

護林彪體系的錯誤潮流」。

顯然，李一哲是別有用心地妄圖製造混亂，把水攪渾，以達到他們不可告人的目的。

李一哲在攻擊我們反復辟、反回潮時，對「評湘劇『園丁之歌』」以及張鐵生、黃帥等同志進行了十分惡劣的諷刺、污衊和攻擊。我們要問，張鐵生反對「不問政治，以分數卡人」的考試制度反得對不對？黃帥反對「師道尊嚴」反得對不對？「評湘劇『園丁之歌』」批判了「智育第一」批得對不對？難道這些反對復舊，反對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批判林彪尊孔讀經，批判孔老二的反動教育觀，都是爲了「維護林彪體系」？而且成了「當前批林的主要危險」？這到底是那一家的邏輯？還有，李一哲說：「現在的情況是沒有『大人物』或中央報刊的認可和宣傳，任何思潮都不能形成潮流」。這豈不是說，現在已經「形成」的「維持林彪體系的錯誤潮流」，是來自中央的報刊，來自黨中央？李一哲妄圖製造混亂，把水攪渾，其目的不僅是要人們不聽黨中央的指示，不要批林批孔，而且把批判的矛頭指向黨中央。這就是他們叫嚷甚麼「當前批林的主要危險是在反『復舊』的旗號下維護林彪體系的錯

㊀ 毛澤東在八大二次會議第一次講話（1958年5月8日）：「范文瀾同志最近寫了一篇文章，我看了很高興，這是站起來講話了。這篇文章引了許多事實證明厚今薄古是我國的傳統，引了司馬遷、司馬光……可惜沒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張『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個厚今薄古專家。當然我也不贊成引秦始皇。（林彪同志插話：秦始皇焚書坑儒。）秦始皇算甚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鎭反，還沒有殺着一些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嗎？我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駡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駡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貫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大笑）。」

㊁「517工程紀要」說：「對過去 B—52以莫須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給予政治上的解放。」

誤潮流」的險惡目的。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人民，深深懂得：「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一整個歷史時代。只要這個時代沒有結束，剝削者就必然存着復辟希望，並把這種希望變爲復辟行動。」因此，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必須不斷地堅持革命，反對復辟，堅持前進，反對倒退，堅持馬克思主義，反對修正主義。李一哲如果心裏沒有鬼，爲甚麼那麼害怕中央和中央報刊提出的「反復辟」、「反回潮」呢！

爲甚麼李一哲要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作如此顛倒是非 、 混淆黑白的「斷言」呢？革命的人們只要把他們那種用「慨慷激昂」的革命詞句裝飾起來的假象揭開，就不難看出：他們攻擊和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攻擊和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戰略部署；他們攻擊和汚衊批林批孔運動，就是妄圖煽動羣眾 ， 製造混亂 ， 把鬬爭矛頭轉向黨中央和各級黨政領導，即李一哲之流所稱的所謂「堅持林彪體系的頑固派」，使運動離開毛主席的路線和部署。人們要問：爲甚麼「民主與法制」的作者如此再三熱衷於攻擊和妄圖改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戰略部署呢？答案是顯然的，借用他們自己的話，就是爲了製造輿論，妄圖「完成林彪未竟的事業」——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

四、極力鼓吹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法制，妄圖糾集牛鬼蛇神，煽動羣衆，在中國重演「匈牙利事件」

李一哲打着「爲民請命」的幌子，大談「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向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提出一大堆有關這方面的「要求」。究竟他們要的是甚麼民主？甚麼法制？

列寧在批判叛徒考茨基的資產階級「純粹民主」時，曾尖銳指出，在就「民主」問題開展辯論時，「馬克思主義者卻永遠不會忘記問一下：『這是對那個階級的民主？』」李一哲之流鼓吹「自由 」、「 民主 」、「 法制」的對說教，我們當然也永遠不會忘記問一下：他們究竟要的是那一個階級的自由 ？ 那一個階級的民主 ？ 那一個階級的法制？

是無產階級的民主、權利，還是資產階級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的「民主、權利」？

李一哲故意曲解我們黨提倡的經常運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四大」武器爲「四大自由」，胡說甚麼要確立「絕對的、無條件的使用大字報這個廣泛的人民民主的武器的權利 」。好一個「絕對的 、 無條件的 」「民主權利！」列寧在批判考茨基的所謂「純粹民主」、「一般民主」時 ， 曾一針見血地指出 ：「 如果不是嘲弄理智和歷史，那就很明顯 ： 只要有不同的階級存在 ， 就不能說『純粹民主』，而只能說階級的民主」，「『純粹民主』，是自由主義者用來愚弄工人的謊話。」無產階級的民主，只給人民羣眾，而絕不給反動派。我們要發揚無產階級的民主，這是爲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推進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但是我們決不容許階級敵人利用我們開展「四大」的機會，興風作浪，混水摸魚，用大字報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我們知道，大字報這個武器本身是沒有階級性的，無產階級可以用，資產階級也可以用；歸根到底對無產階級有利。但是，使用「大字報」這個武器，不論是無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各自都是有條件的、相對的，決不能是無條件的、絕對的。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行使社會主義民主權利的條件，就是必須遵循毛主席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規定的區別香花與毒草的「六條標準」。李一哲鼓吹甚麼「絕對的、無條件的」「民主權

利」，實際上就是要取消毛主席提出的「六條標準」。顯然，他們所要的「民主」就是要匈牙利事件中納吉❶式的「民主」；要污蔑攻擊黨中央、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污蔑、攻擊社會主義制度與無產階級專政，污蔑、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的「民主」；要挑動牛鬼蛇神和「右派翻天」的「民主」。這種「民主」，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是「絕對」不能給他們的。

是要無產階級的法制，還是要保護反動派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的「法制」？

法制，同自由、民主一樣，也是有鮮明的階級性的。社會主義的法制，是反映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的職能的，即對人民實行民主，對人民的敵人實行專政。毛主席早就明確指出，「人民的國家是保護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國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國範圍內和全體規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脫離內外反動派的影響」；至於說到專政，那就完全不同了，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向着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兇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又指出，「專政的第一個作用，就是壓迫國家內部的反動階級，反動派和反抗社會主義革命的剝削者，壓迫那些對於社會主義建設的破壞者，就是為了解決國內敵我之間的矛盾。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份子並且將他們判罪，在一個時期內不給地主階級份子和官僚資產階級份子以選舉權，不給他們發表言論的自由權利，都是屬於專政的範圍，為了維護社會秩序和廣大人民的利益，對於那些盜竊犯、詐騙犯、殺人放火犯、流氓集團和各種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壞份子，也必須實行專政。」

然而，李一哲「體系」說的卻是：四屆人大應當明文規定除了殺人放火、流氓盜竊等刑事犯和挑動武鬭、組織陰謀集團等份子必須實行專政外，應當保障人民羣眾一切應有

的民主權利。

值得注意的是：在李一哲開列的「必須實行專政」，對象裏面，一、地主階級沒有了，官僚資產階級沒有了，富農階級、資產階級右派份子及反革命份子也沒有了。這當然不是偶然的疏忽。不然，為甚麼作為專門闡明李一哲「體系」而拋出、並且大談而特談「社會主義」法制的這張大字報，人們竟無法找到一處一字講到要對地、富、反、右和官僚資產階級實行專政。二、無產階級必須在意識形態領域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的專政也不見了，於是，一切封、資、修的反動意識形態，一切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馬列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反動言論，都可以自由泛濫了，其實這都是經過精心的「推敲」的。在李一哲「體系」看來，就是應該給顛覆無產階級專政，攻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人以「民主」、「自由」，不准對他們實行專政；相反，對這些進行顛覆活動、散播反動言論的人，應該得到「法制」的保護。這就是他們的所謂「民主與法制」的實質所在。

為甚麼李一哲他們那麼起勁地重新揀起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法制」這面破旗呢？

問題是十分清楚的。李一哲在「民主與法制」中淋漓盡致地提出了他們的「體系」後，最後不是突然發現他們自己叫得太露骨了，同一九五七年右派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謬論、同一九五六年匈牙利納吉之流的反革命謬論太相似了麼？於是，他們作賊心虛，就來了個「先聲奪人」，「此地無銀三百兩」地為自己辯解一番，極其鄭重地聲明他們拾起的不是右派的餘唾。說甚麼：「是的，民主、法制的口號是右派分子高呼過的。……我們的一些朋友完全不去

❶ 納吉是1956年匈牙利總理，因同情人民的革命行動，被蘇軍拘捕秘密處死。

想一想，為甚麼『民主』、『自由』的口號在一九五六年的布達佩斯曾經集合起了反革命，而同樣的口號在一九七〇年的波羅的海南岸卻成了波蘭工人階級戰鬭的旗幟了呢？」這樣一來，他們就以為可以用嘴巴來申明他們不是要搞甚麼匈牙利事件了。眞是欲蓋彌彰！我們的革命人民倒要認眞想一想：為甚麼李一哲要把「民主」、「自由」的口號作為「戰鬭的旗幟」強加給今天的中國工人階級？他們究竟要中國工人階級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而戰鬭呢？還是為李一哲式的「民主」「自由」而戰鬭呢？一九七〇年的波蘭工人階級向壓迫他們、剝削他們、蛻化變質了的修正主義統治集團進行戰鬭，今天李一哲究竟是要中國工人階級向誰戰鬭？

結論是十分明白的，李一哲之流今天重新揀起資產階級「民主」、「自由」、「法制」的破旗，就是妄圖糾集地、富、反、壞、右等牛鬼蛇神，煽動羣眾，在我國搞新的「匈牙利事件」，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

原來，打着要當「光明正大的反對派」旗號的李一哲之流，實際是明火執仗的反動派！

的確，「反動派的頭上是沒有『反動派』三個字」，革命的人們可要提高警惕呵！

結束語

現在，我們可以對李一哲的「體系」來一個概括的剖析了：

第一、李一哲「體系」的要害是：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整個打倒我們的黨。「民主與法制」打着「批林」的旗號，偸運資產階級和叛徒考茨基、林彪等人的黑貨，是一篇徹頭徹尾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

第二、李一哲「體系」向人們編造了一套所謂「新的階級

矛盾」和「階級關係的變動」，就是「中國正在出現」一個「特權階層」、「新貴集團」，現在的各級黨政領導已經「完成了『人民公僕』向『人民的主人』的質的轉變」；他們都是林彪體系的「既得利益者」、是「堅持林彪體系的頑固派」；現在「我們的黨」是「君臣父子黨」，「我們的國家」是「封建性的社會法西斯專制的國家」，「我們的軍隊」是「北洋軍那樣的軍隊」。李一哲編造的這一套「新體系」、「新矛盾」，實際上並不是甚麼新貨色，而是地地道道的一切新老修正主義者為反對和攻擊無產階級專政而製造出來的「新體系」、「新理論」的翻版。

第三、根據這種「階級」分析，李一哲「體系」向人們提出了新的戰鬭任務——實行「新的政治變革」。他認為文化大革命的「任務」「並沒有完成」，「革命死了」，因此，要重新發動一次「人民的反攻」，孕育「第十一次路線鬬爭」，去奪取「對國家和社會的管理權」，以達到他們「原來所抱的期望」——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的目的。

第四、鬬爭的矛頭指向誰？李一哲「體系」向人們提出要「牢牢掌握住廣泛的人民民主的武器」，「絕對的、無條件的使用大字報這個武器」，組織他們的所謂「光明正大的反對派」，在批所謂「極左」的「林彪體系」的旗號掩蓋下，把鬬爭的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黨中央，指向社會主義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指向無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

第五、李一哲「體系」向人們供認了它的依靠力量和「羣眾基礎」就是「一個新興的社會力量」——其中當然也包括「對秦始皇不表尊敬的態度」的英雄們，以及敢於「拾起了一九五七年右派的餘唾」的勇士們，還有甚麼海瑞、吳晗和那些「咬不動，吞不下去的餘生者」們，妄圖在我國煽動「匈牙利事件」。

總之，李一哲的「體系」打着「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的招牌，向偉大領袖毛主席、向黨中央和各級黨政領導，發動了一次公開的猖狂進攻，妄圖破壞毛主席關於要安定、要團結的方針，煽動人們起來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這完全是他們一廂情願的癡心妄想。

「螞蟻緣槐誇大國，蚍蜉撼樹談何易。」㊀讓我們把妄圖阻擋革命車輪前進的小丑們和他們的「體系」一起掃進歷史的垃圾堆去吧！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日

㊀ 毛澤東詞，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1963年1月9日。

中國向何處去？

一九六八年元月六日

註：這是一份徵求意見稿，現在公開發表是否適宜？是否能代表「『極左派』公社成立宣言」？怎樣進一步修改？請閱後把意見詳細寫在每頁右邊空白處，請於廿日前將本稿退還發行者。

省無聯一中紅造會鋼319兵團「奪軍權」一兵
1968，1，12。

反擊二月逆流的鬬爭到七、八、九月以來，全國人民有一種欣欣向榮的氣象，大家以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了「進行到底」的希望，一切束縛人們思想的傳統觀念都被拋到一邊去了，但是十月以來出現的自上而下的反革命改良主義逆流，「第一次文化革命結束」的階級妥協空氣，忽又甚囂塵上，又把全國人民打入悶葫蘆裏了，特別是青年知識分子和學生，感覺敏銳，首當其衝，於是怎麼辦？中國向何處去？又成為問題，「極左派」公社成立首先就是為着回答這一嚴肅的問題的。

要正確地回答這一問題，就必須認眞總結一九六七年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革命所創造的極其豐富的經驗教訓，主要是「一月風暴」和「八月局部國內革命戰爭」㊀創造的具有巨大歷史意義的經驗。

㊀ 參大事記1967年1月及7、8月。

一丶科學的預見

當代的中國是世界矛盾的焦點，是世界革命風暴的中心，對於中國向何處去這一舉足輕重的重大課題，世界無產階級的偉大導師毛澤東同志表面上只作了抽象的預見，當震撼世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即將以雷霆萬鈞之力從東方興起的前一刻，毛主席以他氣吞山河的無產階級偉大胸懷向全世界宣告，全國的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是廿世紀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的宣言」㊀，正是這一句話宣告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羣眾中猛烈開展的正式開始，同時也是毛主席「英明地天才地預見到我們的國家機構，將出現嶄新的形勢」(紅旗一九六七年第三期社論)——即類似巴黎公社式的政治機構，一月革命中毛主席又提出了「中華人民公社」㊁的名稱，這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最後結果，中國將向「中華人民公社」的方向去！但是革命當時只發展到很低級的階段，這一歷史的局限性使人民幾乎沒有一個人能理解毛主席指出的第一次文化革命的終極目的，大家都把毛主席的這句話當作一句一般性的讚語而漸漸淡忘了。

文化革命還沒有正式開始時，毛主席在著名的五七指示㊂中實際上已經把這種新的政治結構——「中華人民公社」的內容勾畫出來了，而一般人都把五七指示的描寫當成空想的「共產主義烏托邦」，大家都認爲目前把五七指示作爲我們最近的奮鬬目標是不實際的，現在還只有知識青年還念念不忘五七指示，大叫大嚷要爲實現五七指示而奮鬬，因爲他們明白五七指示所描繪的那種不同於現在社會的新的社會才是他們得到解放的社會，但是知識青年中不少人也認爲不久的將來要實現五七指示描繪的那種社會是不實際的，與其說他們是爲實現五七而充滿信心地奮鬬，不如說他們大肆宣揚五七指示只不過是一種對現實不滿而進行的自我安慰。

毛主席的科學預見在人們腦子裏留下的是空想的印象，這是和階級鬬爭還沒有發展到十分尖銳和高度階段這一事實相符合的。現今的中國由新的生產力的發展，致使代表新的生產力的階級向代表阻碍歷史前進的生產關係的腐朽階級進行鬬爭，並必然導致社會大革命，新的社會必然在烈火中誕生。這種客觀規律就是毛主席的科學而不是空想的預見的堅實基礎，而人們現在還沒有認識到這種規律，那當然就會出現科學預見給人們留下了對美好將來的純粹空想的現象！人們認爲中國將和平過渡到五七指示所描繪的社會去。實際呢？「和平過渡」只不過是「和平演變」的別名，它只會使中國離五七指示描繪的「公社」越來越遠，離蘇聯現社會越來越近。毛主席提出的：「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派的權」就解決了怎樣向公社過渡的現實途徑——必須

㊀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學哲學系系黨總支書記聶元梓、助教宋一秀、夏劍豸、楊克明、趙正義、高雲鵬和學生李醒塵在飯廳貼出了「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了些甚麼？」的大字報。毛澤東很欣賞這一大字報，下令公開報導。6月1日新華社發出電訊，6月2日登載在「人民日報」。1966年7月，毛澤東在「對中央首長的講話」時說：「5月25日聶元梓大字報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中國北京公社的宣言書，意義超過巴黎公社，這種大字報我們寫不出來。」又在1966年8月5日所寫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中指這大字報爲全國的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

㊁ 毛澤東1967年2月12日「對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建議」上海羣眾不要建立「上海人民公社」時說：「我們是否還是穩當一點好，不要都改名字了。因爲這樣就發生了改變政體的問題，國家的體制問題，國號問題，是不是要改成中華人民公社呢？」這裏分明是斷章取義，單挑出「中華人民公社」幾個字，意思正與毛澤東完全相反。

㊂ 指1966年5月7日毛澤東給林彪的信，要工農商學兵各以本行爲主，兼學別樣。

是以暴力推翻新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解決政權問題。否則，不談奪權問題，不談徹底砸爛舊的國家機器而去空喊實現五七指示，那確實是「烏托邦」的空想。

二、一月革命風暴

列寧曾有一句偉大的名言：「任何革命，只要是真正的革命，歸根結底，是階級變動。因此提高羣眾覺悟的最好方法，揭露用革命誓言欺騙羣眾的行爲的最好方法，就是分析這些革命中發生了和正在發生怎樣的階級變動。」讓我們遵照着這一教導來分析一下一月革命中發生的階級變動，以揭露那些用革命誓言愚弄羣眾的行爲。

大家都知道一月革命中一個最大的現實就是百分之九十的高幹靠邊站了，當時從湖南來看，張平化、章伯森、華國鋒❶之流的權力小到零，從中央來看，財政部、廣播局等部門紛紛奪權，李先念、陳毅、譚震林之流以及代表他們的周恩來的權力也大大下降，當時的權力到誰手裏去了呢？到組織起來自己掌管城市、工業、商業、交通等等的（黨政財文大權）充滿着無限熱情的人民手裏去了。社論所號召的「人民羣眾自己起來掌管社會主義國家的命運，自己管理城市、工業、交通、經濟」眞正實現了，一月革命風暴在一個短時期內由官僚們手中轉到了熱情澎湃的工人階級手中。社會忽然發現，沒有官僚自己不但不會活不下去，反而活得更好，發展得更自由，更快。並不是像官僚們在革命前嚇唬工人們的那樣，「沒有我們，生產會崩潰，社會混亂得一塌糊塗，不可收拾」。實際上沒有了官僚，和官僚機構，生產力得到了很大解放，煤炭部垮了，煤照常出，鐵道部垮了，運輸照常進行，省委各部都垮了，各種工作照常進行，而且工人階級的生產熱情，主動性大大得到解放，工人們在一月份後自己管理工廠的情

景，眞是令人感動，工人第一次感覺到「不是國家管理我們，而是我們管理國家」。第一次感覺得是爲自己而生產，幹勁從來沒有這麼大，主人翁的責任感從來沒有這麼強，長沙紡織廠等地還創造了造反班等無數新鮮東西。

這就是一月革命中階級變動的眞實內容，這一個短暫時期內實際部分地區不很徹底的實現了「中華人民公社」的內容，社會處在一種類似巴黎公社的「羣眾專政」的狀況。

一月革命風暴告訴人們中國要向着一個沒有官僚的社會去，現在百分之九十的高幹已經形成了一個獨特的階級，階級鬪爭發展的客觀規律使它們絕大部分，在一月份靠邊站了。百分之九十的高幹在一月革命風暴中靠邊站這決不是「羣眾」的過失，「羣眾是眞正的英雄」，爲惡最甚的人得到了必要的懲罰，「罰不當罪的極少」，羣眾揭發出來的事實和爆發的對他們的憤恨初步告訴人們，這個「紅色」資本家階級已經完全成爲阻碍歷史前進的一個腐朽的階級，他們與廣大人民的關係已經由領導和被領導變成統治和被統治、剝削和被剝削的關係，由平等的共同革命的關係變成壓迫和被壓迫的關係，「紅色」資本家階級的特權和高薪，是建築在廣大人民羣眾受壓抑和剝削的基礎上。要實現「中華人民公社」就必須推翻這個階級。

一月革命風暴是革命人民在毛主席領導下推翻舊世界建設新世界的偉大嘗試。第一次無產階級政治大革命的綱領正是在這一偉大時刻被提出來了。毛主席指出：「這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這是一場大革命」。這就指出了文化革命不是一場罷官革命，揪人運動，不是單純的文化革命，而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聯繫一月革

❶ 張平化，當時爲湖南省委第一書記。
章伯森原爲中共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湖區省委副省長。
華國鋒原來職務與章伯森相同。1968年4月湖南省革委會成立時，章、華等皆任革委會副主任。華國鋒扶搖直上，天安門事件後被任命爲中共副主席，國務院總理。
參攷再版後記

命風暴的事實，這個被推翻的階級就是十七年來在中國形成的「官僚主義」者階級㊀，這些單位的奪權鬭爭必須實行馬克思主義的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的原則。在這裏，不能改良主義，不能合二而一，不能和平過渡而是必須把它徹底打碎。「徹底打碎舊的剝削制度、修正主義制度、官僚主義機構」。第一次無產階級政治大革命的綱領是以不大具體的萌芽狀態在一月革命風暴的後期被社論提了出來，應推翻的腐化階級，應砸爛的舊的國家機器，甚至人們根本不敢異議的社會問題也被提了出來，這一偉大發展是一月革命風暴中無產階級表現出的勇敢和首創精神的必然結果。

一月革命中觸及到的制度、政策、方針問題主要是合同工、臨時工這種資本主義的僱傭勞動制度和修正主義的上山下鄉運動。

目前，「極左派」必須組織人好好總結研究一月革命風暴創造的極其豐富的事物，這些新事物就是巴黎公社式的新社會的雛形。

三、革命委員會

爲甚麼極力主張「公社」的毛澤東同志在一月份突然反對「上海人民公社」的建立㊁？這是革命人民所不理解的。預見了「公社」是第一次文化革命必須實現的政治機構的毛主席，突然提出「叫革命委員會好」。

革命必然是曲折地前進，必然要經歷「鬭爭——失敗——再鬭爭——再失敗——再鬭爭——直至勝利」這樣一個長過程。

爲甚麼不能立即建立公社。

革命人民還只是第一次進行推翻強大的敵人的嘗試，革命人民對這場革命的認識還是何等膚淺啊！不僅沒有自覺的

認識到要徹底砸爛舊的國家機構，觸動一些社會制度，而且連對敵人是一個階級都認識不清，罷官革命，揪人革命論統治着革命隊伍。羣眾的智慧發展，都還沒有達到可能實現社會改造的程度，因此革命果實歸根到底是由資本家階級拿去了（共產黨宣言）。

任何一次革命都必然觸動軍隊，中國既然形成了紅色資本家階級，軍隊當然不能脫離於這現實之外。而一月風暴還根本沒有觸動一切革命的要害問題——軍隊問題，可見革命還是何等的不深入，還是處在何等的低級階段，而革命人民的政治思想的成熟程度也是與這種不高級的革命階段相適應的，也是處在一種很不成熟的階段。

在這種不可能徹底勝利的時候，要想立即奪取眞正的勝利，那是左傾冒險主義，遵照資本家階級把革命果實奪取過去的必然性，使人民在更加高級的階段的鬭爭中，鍛鍊自己的政治思想武器，通過革命的來潮和退潮，準備奪取最後勝利的力量，這才是正確的戰略方針（如今稱之爲戰略部署），否則，在羣眾沒有眞正認識到自己的利益是要在中國實現「公社」的時候，建立「公社」就會變成徒有其名，而實際上是和現在革委會內容一樣，由資產階級篡權的假「公社」。

因此無產階級的偉大統帥毛澤東同志毫不猶豫地違背了幼稚的革命者關於公社立即建立的幻想，採取了正確的戰略方針（即戰略部署）。一方面提出了軍隊「支左」的號召。「支左」其實是毛主席進行軍隊文化革命的巧妙方法，爲了避免直接開展軍隊四大將出現的軍內走資派向無產階級

㊀ 原註：毛主席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五日「關於陳正人蹲點報告的批示」。豪按：批示指出：「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

㊁ 參「代序」頁13—14。

怠工破壞、抵制所造成的損失，就號召軍隊支左，表面上軍隊沒搞四大，實際上讓部隊參加了地方四大的轟轟烈烈的文化革命，與其說是支左，還不如說是教育部隊，搞軍內文化革命。另一方面革命委員會在全國各地逐步建立起來了。

三結合㊀就是革委會的具體內容，三結合的提出，等於把一月革命中倒台的官僚們又重新扶起來，而三結合不可避免的會成爲軍隊和地方官僚起主導作用的資產階級篡權的政權形式。毛主席也是把三結合的革委會稱爲「臨時權力機構」，它只是一種過渡形式，不是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最後成果，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最後結果是「公社」而不是革委會。毛主席八九月份總結一月革命和八月國內革命戰爭得出的「羣眾專政」的偉大理論，就證明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後決不是官僚和陪襯的羣眾的三結合專政，而是「羣眾專政」。但是如前所述過渡形式是必須的。否認過渡形式是左傾空談主義。

四、二月逆流

一月革命的猛烈和深刻，使官僚們等不及忙忙篡權了，他們一反常態，採取了最急切的殘酷鎮壓手段，這也從反面證明了一月革命中百分之九十高幹靠邊站這一「財產權力再分配」的深刻性。二月逆流的慘狀也證明了毛澤東同志「不能立即勝利」的預見的正確。

「紅色」資本家階級在二、三月幾乎佔了壓倒的優勢，財產（生產資料和權力）從革命人們手中被奪回到官僚們手中，早春二月是龍書金、劉子雲㊁、章伯森、華國鋒以及全國的官僚和他們在中央的代理人權力無限大，那就是他們飛黃騰達的時機，而革命人民的權力下降到「零」，並大批被投入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公檢法控制下的監

獄。

中國「紅色」資本家階級目前的總代表——周恩來，在二、三月的勝利面前利令智昏，匆匆忙忙地妄圖在全國各地立即建立革委會，如果讓資產階級企圖實現，無產階級的退卻就會退入墳墓，因此中央文革不等革委會全部建立就在三月底發出了反擊的號令。從此偉大的八月局部國內革命戰爭開始醞釀。

在反擊二月逆流的鬬爭中革命進入高級階段的重要標誌就是眞正開始觸及軍隊問題。革命人民在一月革命風暴時對軍隊問題想得很幼稚，認爲只要地方上走資派推翻了，部隊就可以遵照毛主席自上而下的命令和革命人民相結合鎮壓走資派，二月逆流中的血的事實告訴人民，單純自上而下的命令並不能把毛主席的意圖貫徹到部隊中去，軍隊走資派的利益和地方走資派的利益的一致，決定了它不可能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必須自下而上搞軍內文化革命，依靠人民革命這一歷史前進的火車頭，改變官僚控制軍隊所造成的軍民對立狀況。

二月以來的鬬爭把軍隊的嚴重問題擺到了廣大羣眾面前（以前只擺在毛主席少數人面前），這就使依靠廣大人民羣眾的力量來解決這一問題逐漸具備了條件，科學地預見了在「公社」這一新社會中的軍事力量不同於現在的軍隊，二月以來的鬬爭使毛主席的這一思想逐漸掌握了羣

㊀ 此時三結合是軍人、革命幹部和羣眾的三結合。後來羣眾被排擠了，經林彪事件後逐漸退出。於是三結合被抽掉了實質內容，由階層的結合變成了「老、中、青」年齡的三結合。由不同階層結合成了統治階層培養接班人的結合。

㊁ 龍書金原爲湖南省軍區司令員。1967年下半年至1968年初，被紅衛兵指爲「湖老譚」，受到猛烈攻擊。1968年4月任湖南省革委會第一副主任，1968年8月任新疆軍區司令員，後又出任新疆革命委員會主任，1969年4月被選爲中共九屆中委。林彪事件後被整肅，未明下落。
劉子雲原爲湖南省軍區副司令員。

眾。

五、八月局部國內革命戰爭

一月底以來，造反派論述軍隊的文章可謂多矣，過去所發生的全國性大規模武鬥和四川等地的局部戰爭㊀這一新階段的開始又使論述軍隊問題的文章增加了「戰爭」，武裝奪取政權的色彩，這是無產階級實行徹底的社會改造的政治思想逐漸成熟的多麼可喜的現象。

這許多論述軍隊問題的文章由於當時的歷史的局限，因此還非常不成熟，有很大的缺陷。但是這些文章是新事物，會被歷史證明是具有意義的事物。

恩格斯在談到空想社會主義時說得何等好啊！「讓著作界的小販們去一本正經地挑剔現在只能使人發笑的幻想吧，讓他們以自己的嚴謹的思維方式優越於這種瘋狂的念頭而自我陶醉吧。使我們感到高興的倒是處處突破幻想的外殼而顯露出來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思想，而這些卻是那班庸人所看不到的。」

論述軍隊問題文章的精華有兩點：

（一）看到了現在軍隊和解放前的人民軍隊有了變化，解放前的軍隊是和人民一起去推翻帝官封的。軍民關係像魚水一般，解放後由革命對象從帝官封㊁變成走資派，而這種走資派在軍隊內是當權者，因此一些部隊在革命中不但改變了解放前軍民血肉一般的關係，甚至變成鎮壓革命的工具。因此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要成功就必須使軍隊來一個根本的變動，「極左派」在毛主席一句語錄中爲自己的思想找到了根據，毛主席在同年一同發出軍隊住進營房後，脫離羣眾了。

（二）看到了在今天革命人民要戰勝武裝的紅色資本家階級，必須經過國內革命戰爭，八月份無產階級和紅色資本家階級的大規模武鬥和局部國內革命戰爭證實了他們在八月份的預見，八月局部國內革命戰爭創造的經驗更是史無前例和豐富偉大。出乎一般庸人的意料之外，歷史竟是按着「異端邪說」所預見的方向發展。不可想像的大規模搶槍事件隨着歷史發展的步伐合乎規律出現了，不同規模的軍隊直接參加（在江西杭州等地是軍隊直接打）的局部國內戰爭爆發了！人民在八月爆發出的創造精神和革命熱情更是使人感動之至。搶槍成爲「運動」所表現出的規模之大，革命戰爭的威武雄壯，在那一瞬間給人一個深刻的印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城市在一個短時期內處在一種「武裝的羣眾專政」的狀況，大部份工業、商業、交通、城市管理的大權又從章伯森、華國鋒、龍書金、劉子雲之流手中轉到了武裝的革命人民手中，革命人民從來沒有像八月那樣以創造世界歷史主人翁的姿態出現在歷史舞台上。小學生自動充當交通警衛工作，指揮車輛的英姿，湘江風雷、紅中會㊂等羣眾組織直接控制部份財經大權的自豪，給人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八月是革命羣眾組織的權力迅速增長的時候，官僚們的權力又降到了「零」，第二次短暫的不穩定的「財產和權力」再分配出現了，社會又一次實現偉大的「中華人民公社」的嘗試，人們又一次把五、七指示中提出的「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工人、農民、學生都要學習軍事」的問題進行了解決的嘗試。一月革命是沒有這個嘗試的。

㊀ 1967年5月至8月間成都軍區挑動支持「羣眾」與造反派「產業軍」發生長期慘烈的武鬥。雙方出動到重武器，已是地區性的內戰。軍隊也已介入。

㊁ 帝國主義、官僚主義、封建主義，解放前壓在中國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

㊂ 湖南的造反派組織。

軍隊在解放前就是一個把軍學、軍民、軍農、軍工兼起來的與羣眾關係極好的一個大學校，這點毛主席在民主革命勝利的前一刻就總結了，爲甚麼解放後十幾年又重新提出「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搞好軍民關係的問題呢？如前一節所述，是因解放後軍隊起了變化，不同程度地脫離了羣眾，因而這個問題自然就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

八月風暴偉大的創舉就是一個由革命人民自己組織的武裝力量的出現，這種力量成爲無產階級專政（專走資派的政）的事實力量。他們與人民是一致的，是共同爲推翻「紅色」資本家階級而鬪爭的，而軍區這一官僚機構垮台，人民不但不悲嘆反而歡呼起來。不像以前那樣以爲沒有他就不行，這一事實又使無產階級能夠比較實際地預見中國的軍隊向何處去？預見新社會——「中華人民公社」的武裝力量的情景，可以斷言，中國將是個一個軍就是民，民就是軍，軍民打成一片，軍隊擺脫官僚控制的社會去。如果說一月風暴提出了第一次無產階級政治大革命綱領的話，八月風暴就不但充實豐富了這個綱領，而且解決了這次革命的方法——不但靠「四大」，而且靠武裝奪取政權，靠國內革命戰爭。

六、九月的轉折

正在人們歡欣鼓舞，勇猛向前，大言不慚地談論着「徹底勝利」的時候，無產階級的偉大導師看到了地平線上的新危險。讓我們來看看這種危險的內容吧！一方面，由於「二月鎮反」㊀的露骨，所以「紅色」資本家階級失利的必然性連他們自己也敏銳地感覺到了，從五月份起，中國的「紅色」資本家們就改變了策略，不少的地方出現了一般幹部「亮相」風。東北的宋任窮㊁，湖南的章伯森，一個又一個的紅色資本家，過去騎在人民頭上的吸血鬼，忽然對奴隸的革命鬬爭表示出「熱情」，他們分別亮相支持炮轟軍區的革命羣眾，由於這時革命人民沒有把走資派當作一個階級去推翻，揪人革命論，罷官革命論仍舊統治着無產階級和廣大革命人民，大家都認爲文化革命是清洗單個走資派，利用一部份革命領導幹部（即官僚）去打擊另一部份官僚，因此大大小小的章伯森的這一手就容易地騙取人民的信任，這就決定了資產階級篡奪八月風暴的勝利果實是必然的這一客觀規律。同時，二月以來由於資產階級的匆促鎮壓和無產階級的迅速反擊使向「公社」過渡的中途時期——革委會的專政實際上還沒有開始，而沒有一個過渡時期來讓騙取人民信任的「紅色」資本家來鎮壓人民，使人民在血的事實中認識到走資派是一個階級，因而接受第一次文化革命的綱領，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那徹底的社會革命就不能實現。

另一方面，要實現五七指示實現軍隊變動的要求就要把野戰軍內的文化革命進行到底，就必須讓野戰軍「支左」，實際上搞野戰軍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沒有開展野戰軍內的全面「支左」前，要求立即勝利是左傾盲動。

還有，農村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問題。農村如果不來一個革命的風暴，那任何一種「奪權」都不可能眞正代表農民的利益。五七指示所描繪的工廠辦農場，農村辦工廠就預示着在新的公社中工農、城市差別要比現在小得多，而這種縮小就要發動農民運動，靠毛澤東思想指引下的革命人民這一歷史前進的火車頭來實現，在農民運動沒有起來時就要求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徹底勝利，這也是空談。在徹底勝利實際上不可能的，馬列主義者的任務就

㊀ 指「二月逆流」。參大事記。

㊁ 宋任窮，文革前是中共東北局第一書記兼瀋陽軍區第一政委，文革時被鬬，74年後被解放復出。

是完整「徹底勝利」的叫喊的虛僞性。如果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有大權在手的話，就必須利用權力禁止人們叫嚷，煽動「立即推翻革委會建立公社」以「公社」這一光輝的名字被名不符其實的現象沾污。同時黨內軍內的資本主義官僚階級，在八、九月份開始大舉向中央文革怠工和進行破壞，他們故意製造軍隊的混亂造成經濟等方面的停滯。一個軍隊高幹向中央文革的公開狂妄叫囂，就是他們的八九月份的總方針，「中央文革還要不要解放軍，不要我們就打起被包回鄉去。」「中央文革把軍隊老幹部調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在這一系列情況下，在無產階級已經取得極大的發展，有很大的出路可以退卻而不至於退入墳墓時，同時又不可能立刻取得徹底勝利的情況下，爲了鞏固已得的成就，穩定資產階級，不至使他們狗急跳牆，英明的統帥毛澤東同志又一次不顧性急的革命者要求勝利的幻想，在九月以後作了大幅度的退卻，資產階級篡權的政治形勢——革委會或革籌小組建立了，向公社過渡時期——革委會統治時期按照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眞正開始了。

這次退卻的幅度之大是空前的，九月份以來幹部政策無限放寬，實際上是向走資派的一個大幅度的讓步，讓他們上台，具體的突出表現就是對陳再道㊀的處理，主席甚至說他學習得好，可以出來工作。

但是由於無產階級革命力量的大大加强，這次退卻沒有遭到二月份那次退卻所造成的「潰退」，資產階級這次不能像三月那樣幾乎一口吞下革命等等。湖南炮轟周恩來的革命力量不但沒有被消滅，反而還成立了省無聯，在某些方面，向前有了發展。這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力量成長壯大的證明。

革委會中的資產階級要篡奪無產階級在八月份的勝利果實，由「羣眾專政」又重新變爲官僚主義統治，首先就須解除工人階級的武裝。工人階級手中的槍枝是使工人權力

無限增大，對資產階級致命威脅，對工人掌握槍枝的恐懼心理。革命人民出自自發的對官僚們的篡奪勝利果實的仇恨，喊出響亮的革命口號：「交槍等於自殺」並形成了一個自發的全國的爲武裝推翻新官僚資產階級的羣眾性「藏槍運動」。

八月的搶槍運動是偉大的，它不僅是在資本主義國家空前而且是在社會主義國家第一次把全民皆兵變成事實，文化革命前官僚們不敢把槍枝眞正交給人民，民兵不過是官僚控制武裝力量的一種裝飾物，它決不是工人階級「自己的」武裝而是官僚手中馴服的工具。而搶槍運動，羣眾第一次不是自上而下的恩賜，而是靠革命人民自己的暴力從官僚手中奪取了槍枝，這是工人第一次掌握的「自己的」槍枝。毛主席「武裝左派」的令人興奮號召就是工人階級這一勇敢的高度集中，然而九五命令㊁的下達又使「武裝左派」變成一紙空文，工人階級的武裝被解除了，官僚們又重新復辟。

七、無產階級在政治思想的啓蒙

一九六七年七一社論提出了黨的建設的問題。七八月份。在激烈階級鬭爭中，極少數的「極左派」提出了「極左派應有自己的政黨」的要求。需要革命政黨的基層組織來實現毛澤東同志的共產黨的領導，以帶動人民推翻新生的資

㊀ 陳再道，文革時爲武漢軍區司令員。1976年7月武漢「百萬雄師」扣留中央派去工作的謝富治、王力等的「武漢事件」據說與陳再道有關，故被揪鬬撤職，到北京參加「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接受改造。72年被解放，任軍職。

㊁ 1967年9月5日中共中央公佈的命令，規定紅衛兵不得衝擊軍事機關，不能揪鬬軍事首長，禁止搶掠軍事物資。

產階級，完成第一次文化革命的任務。就這樣由運動初期北京個別知識份子重建馬列主義小組的空想，第一次變成了戰鬪的無產階級實際的越來越強烈的要求，「既要革命，就要有一個革命黨！」

階級鬪爭幾個月以來進入了比較高級的階段，這個階段是一個甚麼樣的階段呢？這個階段，革命人民已經積累了兩次「財產權力再分配」（一月革命，八月革命）的豐富經驗，這些經驗就是一月革命提出的第一次文化革命的綱領，在中國進行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大革命。「推翻新生的資產階級，建立類似巴黎公社的沒有官僚的新社會——中華人民公社」。還有八月風暴提出的逐步實現軍隊的革命變動。武裝奪取政權的方法，九月以後的反覆和較高級的鬪爭還告訴革命人民，爲甚麼一月革命和八月革命都沒有取得徹底勝利，爲甚麼搞了這麼久革命勝利果實終究被資產階級官僚拿走了，到處是一片復舊的景象。資產階級又重新奪回了八月份喪失的財產和權力。一月革命，八月風暴中無產階級表現的勇敢首創精神幾乎被滅磨和吞沒，大規模逆流的出現告訴了人們，一切對資產階級官僚的幻想，對自己力量的不信任都必須徹底拋棄，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必須實行。

但是革命委員會是「罷官革命」的產物，湖南罷了張平化、劉子雲的官，並沒有消除新的資產階級與人民大眾的尖銳對立，而是新的形勢使革籌小組和省無聯所代表的人民大眾的尖銳對立表現出來，新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的資本主義復辟逆流又出現了。徹底穩定的「財產權力分配」並沒有實現。罷官革命只不過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這種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是使文化革命前新的官僚資產階級統治，透迴曲折變爲資產階階級官僚和幾個陪襯的羣眾組織代表人物的另一種資產階級的統治，而革命委員會就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產物。

光罷幾個人的官還是不能夠解決問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行不通，改良主義的結果——革委會或革籌小組，又實行新的資產階級專政。又激起人民更猛烈的反抗。黑龍江、山東、上海、貴州、湖南等一切建立了革命委員會或革籌小組的地方，就證明了或正在證明着這個教訓，中國不能向革委會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方向去，那是資本主義復辟。中國只能向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所宣告的「中華人民公社」的徹底革命的社會主義方向去。

要使人民懂得這眞理自己下決心來幹，而不是我們替人民下這個決心。「忽視反面教員的作用就不是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因爲「反資本鬪爭中的種種事件和變遷——而且失敗比勝利更甚——不能不使人們認識到他們的各種心愛的萬應靈丹毫不中用。並使他們更透徹地了解到工人階級解放的眞實條件。」（恩格斯）革命往往要實行各種改良主義的不徹底的道路，只有在各種萬應靈丹行不通時，革命人民才會下決心走那條最痛苦的破壞性最大但也是最徹底的眞正革命的路，革委會這一過渡時期的鬪爭必然會使人民大眾對心愛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萬應靈丹徹底拋掉幻想，毛主席說：「菩薩是農民立起來的，到了一定時期農民會用自己的雙手丟開這些菩薩，無須旁人過早地去丟菩薩。」革命人民，不久的將來必然會用自己鐵的手腕，把自己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新生的紅色政權捏得粉碎。九月份以來的鬪爭的階段就是在這一點上教育着人民的新生的階段。

由於鬪爭實踐有了豐富的經驗和進入了高級階段，中國革命人民的政治思想成熟過程也進入了高級階段，新思潮（被敵人罵成「極左思潮」）「推翻新的官僚資產階級」，「廢除官僚機構」，「徹底砸爛國家機器」等等道理，以敵人眼中的「幽靈」的姿態在革命人民中徘徊，革命羣眾奪取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大革命的徹底勝利的政治思

想武器，開始以新的狀態在「極左派」中出現。在中國進行新的社會革命的毛澤東思想，將逐步使羣眾從過去各種矛盾中醒過來，革命人民在實踐中逐步開始懂得爲甚麼要革命，革誰的命，怎樣革命，革命鬬爭開始由自發進入自覺，從必然進入自由。

九月以來的鬬爭的高級階段還出現了如火如荼的知識青年運動的高級階段和合同工、臨時工的新的鬬爭，這對於處於啓蒙階段的「模糊思想」來說，起了很大的推進作用，它吸收了這一部份堅決的革命力量對馬列主義毛澤東主義的自發強烈要求，對於中國社會矛盾的深刻的了解，塡補了青年知識分子和學生中「新思潮」的對社會矛盾極不了解脫離實際的缺陷。

當革命人民由盲目進入政治思想上的啓蒙階段時，當毛澤東主義在羣眾中形成獨立的鮮明政治思潮和政治勢力開始逐漸變成事實，毛澤東主義政黨，中國共產黨基層組織的組織和建立就被無產階級的革命導師毛澤東同志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毛澤東同志提出了在新的歷史中重新組織階級隊伍的建黨原則「黨組織應該是無產階級先進份子組成，應能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羣眾對於階級敵人進行戰鬬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這一領導人民大眾推翻今天的階級敵人新的紅色資產階級的革命政黨毛澤東主義黨（中國共產黨）的建黨原則的提出，證明要完成第一次眞正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在中國建設成五七指示所描繪的「公社」，原有的中國共產黨就必須來一個革命性的變動。而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的召開，預計不能徹底解決中國共產黨向何處去這一問題，按現中央發佈的恢復，整頓，重建黨組織的規定所出現的政黨（如果能夠出現的話）必然是爲革委會中篡權的資產階級服務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政黨，九大的召開只不過是地方「革委會」這種過渡時期在中央的一種反映，這就決定了「九大」不可能徹

底解決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核心是中國共產黨向何處去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向何處去的問題）。

當眞正的穩固的勝利逐漸成爲可能的時候，如下幾個問題就提到突出的地位來了。

一、革命的不平衡性提到了突出的地位。在一省或數省首先奪取眞正徹底的勝利，推翻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產物——革委會的統治，重新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權的可能性就成爲革命能否迅速深入發展的一個關鍵問題，不像在前一段是盲目的自發階段，不平衡性對於革命的發展起舉足輕重的作用那樣。

二、眞正要推翻新貴族的統治和徹底砸爛舊的國家機器就必然要觸及到十七年怎麼評價的問題，這也就是從根本上教育人民爲甚麼要搞文化大革命？終極目的是甚麼的大課題。

三、眞正要使革命勝利，就是要解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一「革命的首要問題」，就是要對發生了「階級大變動的新動態」的中國社會重新進行階級分析，以重新組織階級隊伍，團結朋友，打倒敵人。

這一系列新問題都由江青同志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講話❶中提出來了，江青同志這個講話宣佈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入了一個史無前例的新階段的開始，這個重要講話雖然講的是文藝界，但「文藝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先導」，中國文藝界欣欣向榮，如火似荼的鬬爭就是中國革命將要走的方向，江青同志的講話實際上告訴我們，前一

---

❶ 江青在北京文藝界座談會上所作的講話。講話指出：「………五十天要算，十七年也要算，三十年代也要算，這個根長得很哩！有的人只搞五十天，不搞十七年，這實質上是用五十天包庇十七年，包庇三十年代。」此處所謂五十天指1966年 6 月初至 7 月下旬，各地派出「工作組」鎮壓羣眾運動的一段時期。

段革命不論揪鬪工作組批判反動路線或是反擊二月逆流，基本上是搞文化革命中的問題，是搞庇護十七年的五十天的問題。是剛把資產階級護身符搞了一下，眞正的革命，搞十七年的革命基本上未開始，目前應該進入到觸到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的階段了。

江青同志提出的不平衡性，十七年和五十天的關係，重新組織階級隊伍（階級隊伍的先鋒就是革命政黨）的指示和林副主席十月二十四日指示具體的指明了中國向何處去，湖南向何處去的問題，中國要朝着把第一次眞正的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的方向，決不能朝着收場，資本主義復辟的方向去，戚本禹同志指出「江青同志十一月九日、十二日講話當中總結了一年來文化大革命的經驗，大大推動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展，在全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實際上指明了偉大的十一月十二日講話，十月二十四日指示是我們一九六八年全年進行革命鬪爭的唯一總方針。

對於江青同志偉大的十一月十二日講話中談到的三個問題，我們以後將另外具體闡述（第三個問題包括中國共產黨的重新組合問題）。

十月二十四日指示等於宣佈湖南成爲全國革命鬪爭的先鋒地區，而湖南省無聯的產生發展，就成爲九月以來無產階級成長壯大的突出代表。省無聯實際上是積累了一月革命風暴羣眾專政的形式——文攻武衞指揮部（民辦的）的經驗而產生的，它是一個比一月和八月更高級的羣眾專政權力機構，它相當於蘇聯一月革命被資產階級篡奪時期的蘇維埃，而省革籌又相當於當時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省無聯與省革籌的對立，這就是新的「兩系政權並存」的局面，而實際權力在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省革籌手裏。

省無聯是可以和蘇維埃比美的新生幼芽，它是比一月和八月更加成熟的「公社」的雛形。不管資產階級怎樣交替使用鎮壓和慫恿第三勢力活動的改良主義手法，省無聯這一

眞正的新生紅色政權，必定會在大風大浪中不斷成長和壯大。

八、駁反動的「二次革命論」

目前對於中國向何處去這一嚴肅問題的回答，在思想佔統治地位的是反動的「二次革命論」，人們的思想混亂到極點，人們幾乎異口同聲地說：「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只能搞成這個樣子，只能等待第二次革命了」。大革命失敗後，公開的軍閥割據變成「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的統治時期，爲了維護這種統治使它免於死亡，陳獨秀的反動的「二次革命」就應運而生了。「二次革命論」用政權表面上的變動欺騙人民說帝官封被推翻了，中國的資產階級掌了權，民主革命已經完成了，只能等待社會主義革命了。這種反動的思潮當時不但在全國的思想界佔統治地位，甚至在共產黨內也有相當大的市場，但是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帝官封與人民大眾的矛盾所規定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沒有解決，所以儘管有貌似強大的二次革命風行一時，但是人民反帝反封建更加猛烈和深入進行，仍然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爲轉移的客觀規律，同樣，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底」所要完成的任務，是由引起這次革命的社會矛盾所規定的。這些社會矛盾所要規定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綱領不實現，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結束。

如前幾節所述，引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會矛盾是新的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和人民大眾的矛盾，這個矛盾的發展和尖銳化就決定了社會需要一個較徹底的變動，這就是推翻新的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徹底砸爛舊的國家機器，實現社會革命，實現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建立新的社會——「中華人民公社」，這也是就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綱領和終極目的。

目前，中國社會的這個基本矛盾是否解決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否達到了呢？

如前所述，政權形式表面上有了變動，由舊省委、舊軍區變成「革委會」或「革籌小組」，但是「新政權」仍然是舊官僚在裏面起主要作用，舊省委與舊軍區與廣大人民的矛盾，四十七軍內走資派與廣大人民的矛盾，根本沒有解決，新官僚資產階級與人民大眾的矛盾根本沒有解決，只是以省無聯和「新政權」的矛盾這種的表現形式出現。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所必須實現的推翻新官僚資產階級，必然實現的軍隊的變動，建立公社等等根本性的社會變動都沒有實現，當然這種「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在一月革命和八月風暴中都局部和暫時的實現過，但是，一月革命和八月風暴都基本上被資產階級篡奪了果實（勝利果實），社會改革終於流產，社會改變沒有鞏固和徹底的實現，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底」並沒有到，正如羣眾所說的一樣：「搞了半天還是老樣子」。

引起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爆發的基本社會矛盾，既然沒有解決，而是以新形式發展得越來越尖銳，因此雖然有貌似強大的反動的「二次革命論」統治着思想界，用政權形式的表面變動欺騙羣眾，但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和猛烈地向前發展，仍然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爲轉移的客觀規律，篡權的資產階級想以二次革命論腐蝕革命人民的反抗，誰支持他們統治的陰謀必然破產，正如陳獨秀的「二次革命」救不了蔣家王朝的命一樣，也如強大的宗教思想的統治不可阻擋封建主義經濟基礎的瓦解和崩潰一樣，新思潮（極左思潮）雖然目前還不成熟和十分弱小，但是它打敗貌似強大的傳統觀念和腐朽僵化的二次革命論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資產階級總是把他們統治的政權形式，描繪成爲全體人民服務的世界上完美無缺的東西，新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依附

他們的小資產階級右派的猪狗們如今正是這樣抽掉「革委會」的臨時二字肉麻地吹捧，馬列主義者必然毫不留情地揭露革委會鎮壓革命人民的本質，必須大力宣揚中華人民公社才是我們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這次文化革命必須實現的社會，必須大力宣揚革委會必然崩潰的趨勢。

反動的「二次革命論」表現爲形形色色的具體表現形式，有陳伯達同志早就批駁過的「新階段論」，「左派轉化論」，有露骨的還原論和收場論，還有盛行一時的文化革命第三年收場的謬論等等，江青十一月十二日指示，林彪同志十月二十四日指示，就給反動的「二次革命論」迎頭痛擊。有些人指責我們想一步達到共產主義，想立即消滅階級和三大差別，說毛主席預見的巴黎公社的政權形式是空想，他們說，在共產主義實現之前，這一切都是不現實的。這些人是故意歪曲，我們決不是想立即消滅階級，消滅資產階級法權，消滅三大差別，這在共產主義實現之前，確實是不可能實現的。那只能作爲我們最高綱領，而不是最低綱領。我們的最低綱領是要推翻新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縮小三大差別，當然不可能消滅剝削階級。不可避免地在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以後，又會產生新的階級變動，正是那種新的階級變動又引起新的社會改革這樣推動歷史向前發展。

正如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能推翻帝、官、封在中國的統治，而並不可能消滅新的剝削者產生的可能一樣。

這樣指責我們的人們無非是說一切努力都是徒勞，社會不可能發生新的飛躍，財產和權力不可能「再分配」，只能來點改變，健忘的先生，一月革命和八月風暴已經創造出的（儘管是暫時的和局部的）「財產和權力再分配」和整個社會質的飛躍，不是早就把你們散佈的灰色的取消主義論調撕得粉碎了嗎？

由於無產階級的幹部在政治上還沒有成熟起來，革命人民

還沒有自然地產生具有眞正無產階級權威的幹部，因此所有的人幾乎異口同聲地聲討我們要把一切幹部靠邊站，說我們不要幹部，這是由於目前不少人對官僚還存在幻想的原因。他們沒有把一月革命，八月風暴的感性知識提高，他們還是認爲沒有官僚，社會將要「崩潰」。我們確實認爲百分之九十的高幹要靠邊站，最多只能作爲教育團結的對象。因爲他們已經形成了一個具有獨特的「自己的利益」的腐朽階級，他們與人民的關係，已從過去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變成剝削和被剝削、壓迫和被壓迫的關係，他們大多數自覺或不自覺嚮往資本主義道路，保護和發展資本主義的東西，他們這個階級的統治已經完全阻碍歷史的發展，是不是可以不推翻這個階級而勸說他們放棄高薪等資產階級法權的既得利益，由走資本主義道路變爲走社會主義道路呢？無產階級確實一直在這方面努力，毛主席向資產階級一次又一次的大幅度退卻，就是這種努力的集中表現，但是他們一次比一次瘋狂的向革命人民反攻倒算，自己把自己推向了斷頭台，這一切都證明了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腐朽的階級會願意自動退出歷史舞台。

在巴黎公社式的新社會中，這個階級將被推翻，這已被一月革命、八月風暴出乎庸人預料的巨大的變動以鐵的事實證實了，起而代之的是在推翻這個腐朽階級的鬪爭中革命人民自然形成的有眞正無產階級權威的幹部，他們是公社的一員，沒有特權，在經濟上與一般羣眾一樣的待遇，可以隨時根據羣眾的要求撤換。這些新的有權威的幹部還沒有出現。

但是必然隨着革命人民政治思想上成熟程度的不斷提高而自然產生，是無產階級在政治上思想上成熟的必然結果。

九、駁「左」傾一次革命論

革命隊伍一些幼稚的革命者提出文化革命沒有一次兩次之分，要一直搞到共產主義的思想就是這種「左」傾的一次革命論。有這種思想的人很少，他們的缺陷是政治水平不高，毛主席關於過渡時期，將分成不同的歷史階級的理論就是對他們的最好開導，革命還是分階段的，我們是不斷革命論者，也是階段革命論者。

「左」傾一次革命論者沒有提出第一次眞正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綱領，因此，他實際是降低了我們現階段的任務，使革命人民能爲完成這一階段能實現的目標充滿信心地去鬪爭，因此也是有害的，必須糾正，中國向何處去，也決定着世界向何處去。

中國必然向「中華人民公社」的新社會去。

把革委會專政當成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最終目的，中國必然會走向蘇聯已經走的那條道路，人民又會回到資本主義的法西斯血腥統治下，革委會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道路是行不通的。

因爲今天的時代，是毛澤東主義的偉大旗幟的時代，是帝國主義走下坡路走向崩潰，社會主義走向上坡路，走向全世界勝利的偉大時代。今天的世界是資本主義決然死滅，社會主義決然興盛的世界。在這場具有空前偉大意義的偉大革命時期，在這一瀉千里的時代「必將在人類歷史上出現許多目前人們還意料不到，但又完全合乎歷史發展規律的奇蹟」（陳伯達，三月二十四日）。

中國無產階級和廣大革命人民的勝利和新官僚資產階級的滅亡，同樣是不可避免的。革委會被推翻，「中華人民公社」誕生這一震撼世界歷史的革命人民的盛大節日必定到來。

「極左派」公社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我們公開宣佈：我們建立「中華人民公社」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革委會的資產階級專政和修正主義制度才能達到。讓新的官僚資產階級在震撼世界的眞正社會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無產階級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試看明日之中國，必是「公社」的天下！

毛澤東主義萬歲！

原載廣州「廣印紅旗」第五期（1968年3月）

附錄二：

楊曦光簡介

「中國向何處去」作者署名「一兵」，「一兵」是楊曦光（1950——？）的筆名。楊曦光是「省無聯」的理論家，又是「省無聯一中紅造會鋼319兵團『奪軍權』」的負責人。原長沙一中高686班學生。父親楊第甫曾任湖南省省人委秘書長。1959年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因支持彭德懷對大躍進的批評，被指爲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遭清算，楊第甫也被降爲湖南省農墾局黨委第一書記兼局長。因楊曦光的牽連，被打成「三反分子」。母親陳素，任省總工會副主任，也因楊曦光事而被迫自殺。

文革一開始，楊曦光即帶頭去破四舊，鬪牛鬼蛇神。後來又參加串連、造反。67年1月，毛澤東號召造反派奪權，楊曦光積極地參加「湘江風雷」等羣眾組織的奪權鬪爭。「二月逆流」期間，「湘江風雷」被打成反革命組織，楊曦光又投身反「二月逆流」和爲「湘江風雷」平反的鬪爭。「武漢事件」發生，江青提出了「文攻武衛」，楊曦光又和羣眾一道搶槍。經過7、8、9三個月的武鬪，打散了當時保守派「湖南省高等學院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湘江風雷」掌了湖南省的權。在整個文革運動中，支青始終是「湘江風雷」的一個主力軍。10月8日中央發出上

山下鄉青年回鄉抓革命促生產的指示，羣眾組織受中央文革的壓力，不能吸收這些青年。城市的專政機關捕捉他們；回農村的又被當權派所煽動的農民鬭爭，趕回城市。他們無立足之地。楊第甫反對上山下鄉青年回城市造反，楊曦光開始時跟他父親持同一看法。後來跟其它青年調查支青的實際情況，親身的體驗使他了解到人民痛苦的生活，他完全改變自己的看法。但他父親仍然堅持原來的觀點。楊曦光與其它造反派青年投身支青的造反隊伍中，他們一方面用座談會、串連會的形式來使人民羣眾了解支青的慘況，以期得到同情和支持；一方面又研究中國社會制度、政治經濟及文革種種問題，探求「中國向何處去」？這一時期，楊曦光先後寫出了「關於建立毛澤東主義小組的想法」、「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再論奪軍權」，又根據調查資料寫成了「長沙知識青年運動考察報告」，提出了重新建黨、建軍，澈底改變制度的主張。又組織過砲打周恩來的活動。「中國向何處去？」是楊曦光和他的伙伴們自身的經驗和研究的結晶，代表文革的極左派思潮，是一篇重要的歷史文獻。在全國造反派中有極深遠的影響力。1968年1月24日，中央文革宣佈「省無聯」爲反革命組織，周恩來、康生、陳伯達、江青、姚文元、楊成武等親自到會批判「省無聯」，康生即席點名批楊曦光，又暗示楊曦光的活動是楊第甫指使的，甚至說他所寫的文章是楊第甫幕後執筆。他說：「我有這樣一個感覺，他的理論，絕不是中學生，甚至不是大學生寫的。」將一個響叮叮的革命造反派，誣蔑成被「反革命黑手」利用的傀儡。將青年的覺醒，歪曲成黨內外反對派的宣傳活動。含血噴人，其心可誅。「省無聯」被鎮壓，楊曦光跑到上海被捕，解回湖南下獄，在監中被打得死去活來，至今生死未卜。

附錄三：

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四月上旬，在首都天安門廣場，一小撮階級敵人打着清明節悼念周總理的幌子，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地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他們明目張膽地發表反動演說，張貼反動詩、標語，散發反動傳單，煽動搞反革命組織。他們用影射和赤裸裸的反革命語言，猖狂地叫囂“秦始皇時代已經過去”，公開打出擁護鄧小平的旗號，喪心病狂地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妄圖扭轉當前批鄧和反擊右傾翻案風鬭爭的大方向，進行反革命活動。

四月五日，這種反革命活動達到了高潮。八點左右，一輛市公安局的廣播宣傳車被砸，車子被推翻在地，車身和喇叭都被砸扁了。九點以後，人民大會堂門口圍了一萬多人。廣場上人最多時，估計近十萬人。這當中除極少數制造事端的壞人外，絕大多數是過路圍觀的羣眾。一部分人在紀念碑周圍，絕大部分集中在廣場西邊、人民大會堂東門處。有十來個青年被鬧事的壞人圍打，他們頭上都被打起了幾個大血包，臉浮腫，流着血。鬧事的暴徒叫着：“打死他！打死他！”一個警衛戰士出來勸阻幾句，立刻被鬧事的壞人把領章、帽徽全扯撕掉，衣服被撕開，打得滿臉是血。這些壞人還猖狂說：“這個場面誰鎮得了，中央沒一個人治得住，他要是來今天也就回不去了！”反革命氣焰極爲囂張。許多羣眾極爲氣憤地說：“從解放以來，

天安門廣場一直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檢閱革命羣眾的地方，絕不容許發生這樣的反革命事件！"幾百個工人民兵，爲了保衛人民大會堂，排着隊走上大會堂走廊，被鬧事的壞人阻割成幾段。這幫壞家伙還不斷狂呼反動口號，人羣中誰要反對他們，就被這幫家伙亂拳猛揍，打得頭破血流。有的人被打後還拉到紀念碑前罰跪、"認罪"。

十一時五分，許多人又涌向天安門廣場東邊的歷史博物館。博物館前一個女同志出來勸阻，馬上被拉去打了一頓。這時，有一幫壞人圍着廣場東南角、鐘樓旁邊的一座解放軍營房，砸了門，佔了房子。幾個理着平頭的家伙，拿着半導體話筒，輪着用嘶啞了的聲音煽動。將近十二點，有的鬧事的人還宣佈成立甚麼"首都人民悼念總理委員會"。一個戴眼鏡的壞人揚言限公安局十分鐘答復，不答應條件就砸爛公安部門。

十二時三十分，天安門廣場值勤警衛戰士爲了保衛解放軍營房，排隊向營房走去。鬧事的壞人竟煽動地高呼："人民子弟兵與人民站在一起！""受蒙蔽無罪！"繼後，一輛上海牌小轎車被他們推翻在地，點火燒毀。被派去的消防人員、警衛戰士都被阻，一輛消防車被破壞。這些壞家伙說滅火就是"鎮壓羣眾運動"，好幾個消防隊員被打出血。

十二時四十五分，一隊人民警察趕來支援，也被轟被阻。好幾個人民警察的帽子被鬧事的人摘下拋向空中。還有人向人民警察隊伍中扔小刀、匕首之類的兇器，有幾個民警被圍打。

當日下午，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更加猖狂。他們燒毀了給值勤工人民兵送水、送飯和公安部門的汽車，一共四輛。五點左右，這伙壞人又冲進那座營房，帶走和毆打了門口的警衛戰士，砸開底樓的窗門，把屋裏的東西洗劫一空。收音機、被子、床單、衣服、書籍等全部都被這幫反革命分子扔進火堆，還燒毀和砸爛了首都工人民兵

的自行車數十輛。現場黑煙冲天，一片反革命喧囂聲。營房的玻璃幾乎全被砸碎，接着他們就放火燒着了這座營房。

廣大革命羣眾對這場反革命政治事件極爲仇恨。但這一小撮壞人竟得意洋洋地說："這就是羣眾的力量。"還狂妄地說："現在誰也管不了，來一個團一個軍也不頂用"等等，反動氣焰極爲囂張。

請看，這伙反革命分子是怎樣以極其腐朽沒落的反動語言，含沙射影地、惡毒地攻擊誣蔑偉大領袖毛主席、黨中央的領導同志的：

"欲悲鬧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傑，揚眉劍出鞘。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會已一去不返了，我們信仰馬列主義，讓那些閹割馬列主義的秀才們，見鬼去吧！我們要的是眞正的馬列主義。爲了眞正的馬列主義，我們不怕抛頭洒血，四個現代化日，我們一定設酒重祭。"

這伙反革命分子所謂反對"秦皇"，"眞正的馬列主義"，完全同林彪反革命政變計劃《"571工程"紀要》中的語言一樣，是徹頭徹尾的反革命煽動。這伙反革命分子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向以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吹捧鄧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更加暴露了他們要在中國搞修正主義、復辟資本主義的罪惡目的。

在這幾天裏，這幫家伙不僅寫反動詩詞，而且貼出反動傳單。他們爲鄧小平歌功頌德，妄圖推出鄧小平當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頭子納吉。他們胡說甚麼："由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鬪爭取得了決定性勝利"，"全國人民大快人心"。還惡毒地攻擊誣蔑說："最近所謂的反右傾鬪爭，是一小撮野心家的翻案活動。"這些家伙公然反對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偉大鬪爭，反革命氣焰囂張至極。

但是，反革命分子猖獗之時，也就是他們滅亡之日。他們非常孤立，不得人心。就在這伙壞家伙製造事端、行兇作惡、搗亂破壞的時候，許多革命羣眾勇敢地站出來斥責他們的反革命行徑，同他們鬬爭。廣場上執行任務的首都工人民兵、人民警察、警衛戰士和在場的革命羣眾，緊密配合，英勇戰鬬，用實際行動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保衛社會主義祖國的偉大首都。下午五時，這一小撮壞人再次放火燒那座營房時，警衛戰士冒着生命危險，進行救火。為了保護人民大會堂的安全，首都工人民兵一百多人被打傷，重傷十餘人。警衛戰士被抓走六人，多人受傷。人民警察始終冒着危險在戰鬬。首都工人民兵指揮部的領導同志，在營房被困、火燒到二層樓的危急情況下，仍在三層樓堅持鬬爭。電話員在緊急時刻，沉着機智地向有關領導部門報告了消息。

晚上六點半，吳德同志的講話廣播後，廣場上過路圍觀和受蒙騙的羣眾絕大部分都很快離開。但是，還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繼續頑抗，他們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周圍又貼出了一些反動詩詞。九時半，數萬首都工人民兵接到了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命令後，在人民警察和警衛戰士的配合下，採取了果斷措施，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英雄的首都民兵士氣大振，雄赳赳、氣昂昂地排着隊伍，開進天安門廣場，進行有力的反擊。他們把仍在紀念碑一帶作案、鬧事的壞蛋，團團圍住，將其中現行犯和重大嫌疑分子，拘留進行審查。這一小撮張牙舞爪的壞人，在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面前，不堪一擊，一個個如喪家之犬，蹲在地上直打哆嗦；有的慌忙把身上的匕首、三角刀和抄有反動詩詞的本本交出來；幾個拔出匕首妄圖行兇頑抗的罪犯，受到了應有的懲罰。廣大革命羣眾拍手稱快，全市人民熱烈擁護，一致贊揚首都工人民兵、人民警察、警衛戰士的革命行動。

《人民日報》工農兵通訊員、《人民日報》記者

（新華社北京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電）

與李一哲大字報有關大事記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滙報"刊出了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官方認為這是文革開始。

1966年5月16日毛澤東主持製發了中共中央通知，宣佈從中央到地方進行文革。這就是作為文革指導綱領的"5.16通知"。

5月18日上午，林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發表講話大捧毛澤東，又談及有關政變的問題。

5月25日北京大學聶元梓等貼大字報攻擊北大黨委書記兼校長陸平，毛澤東譽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

6月各地黨委紛紛派出工作組到各級學校和文教單位，領導文化革命。學生開始組織紅衛兵。

7月8日毛澤東給江青寫信，表示對林彪5月18日講話之不滿意及反對個人崇拜。此信在林彪垮台後，作為"中發（1972）25號"文件附件發出，指定為批林參考資料。參頁55註1。

7月18日毛澤東下令撤消工作組，紅衛兵運動興起。

8月1至12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議期間毛澤東寫"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

大字報"（5日）。會議通過推行文革的決定，批判劉少奇、鄧小平。改組政治局常委會，選林彪爲唯一副主席；正式確定林彪取代劉少奇，爲毛澤東接班人。並通過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16條）。

8月18日毛澤東接見全國各地來京紅衛兵。至11月26日八次。共接見紅衛兵一千一百多萬人。

11月12月起，文革開始推展到工礦企業、農村。

1967年1月初上海造反派相繼奪下"文滙報"、"解放日報"、"上海晚報"領導權，接着又推翻舊市委。這就是所謂"一月革命"或"一月風暴"。

9日毛澤東號召羣眾奪權，全國各地開始奪權的鬭爭。

15日上海造反派羣眾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毛澤東不批准；2月23日易名爲"上海市革命委員會"。

23日中央下令軍隊支左。

各地開始武鬭，羣眾衝擊軍區。

1月31日"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宣告成立，這是第一個被中央正式承認批准的省級革委會。

2月以譚震林爲首的反奪權運動由國務院漫延全國，被稱爲"二月逆流"。各地武鬭加劇。

3日國務院下令停止紅衛兵串連。

12日中共中央及國務院發出通知，取締全國性羣眾組織。

3月7日，中共中央下令學生"一律在三月二十日前返回本校，參加本校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指示"軍隊應分期分批對大學、中學和小學高年級實行軍訓"。

7月20日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及羣眾，扣押謝富

治、王力等。這就是所謂"武漢事件"。8、9月份各地武鬭加劇。此一時期被稱爲"八月局部國內革命戰爭"。

9月1日宣佈取締"5.16兵團"。

10月11日，"湖南省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委員會"（簡稱"省無聯"）在長沙成立。發表了"我們的綱領"、"關於目前湖南無產階級大革命中的若干問題的決定"、"中國向何處去？"（楊曦光作）等重要文章，代表造反派羣眾的思想。

1968年1月24日宣佈"省無聯"爲非法組織，重要成員被批鬭逮捕。

2月21日廣東省革委會成立，黃永勝任主任。

29日中學"復課"鬧革命。

3月24日撤消代總參謀長楊成武職務，由黃永勝擔任。

5、6月各地武鬭轉劇。

7月3日，毛澤東批發了制止廣西武鬭的"7·3佈告"；7月18日又將此一佈告作爲中央政策。

7月24日毛澤東又批發制止陝西武鬭的"7·24佈告"，全面禁止武鬭。

27日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清華大學。

8月起，工宣隊、貧宣隊紛紛進駐各級學校，組織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學生交代文革時期的活動，清算造反派紅衛兵頭頭。並將66至68年中學畢業生下放農村。

9月5日，宣佈完成29個省、市自治區革委會之建立工作，（主任中，軍人佔21名，革命幹部8名。）即所謂"全國一片紅"。接着又先後開展以"清查階級隊伍"爲中心的"整黨建黨"、"吐

舊納新”、“精兵簡政、下放科室人員”和“知識分子再教育” 運動。至林彪事件爆發後才不了了之。

10月13至31日召開八屆擴大十二中全會，開除劉少奇，通過黨章草案，準備九大。開始整黨建黨，解放幹部。

1969年1月，中央文革停止活動。各地革委會的羣眾代表逐漸被清算。

4月1日至24日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通過林彪所作的報告和“中國共產黨章程”。新黨章寫道：“林彪同志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最忠誠、最堅定地執行和捍衛毛澤東同志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 大會選出了毛澤東為中共主席，林彪為副主席。在中央委員會中，軍人有很大的比例。

28日中共九屆一中全會選舉中央機構。

夏天開始批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

1970年1月開始清經濟、清政治、清組織、清思想的“新四清”運動，同時又按毛澤東“該抓的要抓、該關的要關、該殺的要殺，否則羣眾抬不起頭來的精神搞” 打擊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反貪污盜竊，反投機倒把，反鋪張浪費的“一打三反” 運動。至1971年運動中期，又特別提出了“反勾聯策反”運動，即反勾聯國內外階級敵人，及投敵叛國。又搞“戰備疏散”，將不可靠分子及其家屬，掃下農村。上述數運動持續至林彪事件後才慢慢停下來。有人獲得平反，有人由農村返回城市。

8月23至9月6日召開中共九屆二中全會。此即大

字報所稱的廬山會議，毛澤東與林彪、陳伯達的鬬爭正式開始。根據“中共中央文件（中發〔1972〕12號）”（3月17日發出）所附”毛主席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同志的談話紀要（1971年8月至9月12日）” 所提及的及其他批陳（伯達）批林材料內容如下：

8月23日陳伯達在審查“憲法修改草案” 會議上發言，反對和不承認由毛澤東提出，並由中共中央修改憲法委員會通過的“不設國家主席”的議案，又“發表有關天才的講話，中途退席。”林彪在會上發表講話，事前沒跟毛商量。

8月23至25日中午黃永勝、吳法憲、葉羣、李作鵬、邱會作、李雪峰、鄭維山等相繼發言支持陳伯達“設國家主席”的建議。當時有一百多中委跟着陳伯達走。（出席者255人）毛澤東寫“我的一點意見”，批“天才論”，提出奴隸創造歷史。

大會終於通過“憲法修改草案”。由於林彪反對、黃永勝等不肯正式表態，未能作出批判陳伯達的決議。

9月中旬，毛澤東寫“給全黨的一封信”，指責陳伯達：“長期不向中央滙報工作，而在背後搞小動作，在黨中央從事分裂活動。” 並建議必須把陳伯達的問題提出來傳達，在全黨展開批判。接着在內部開展了“批陳整風”。對外則稱為“批修整風”。

12月在北戴河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即華北會議），批准了黃永勝等就陳伯達問題的表態檢討。

1971年1月，毛澤東改組北京軍區。

3月22至24日，林彪兒子林立果與于新野等起草反

毛政變計畫："571工程紀要"。

4月中央召開批陳整風滙報會，出席這次會議的，有中央、地方和部隊的負責人共99人，又稱"99人的會議"，黃永勝、吳法憲、葉羣、李作鵬、邱會作、李雪峰、鄭維山作檢討。

5月趙紫陽獲解放，任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革委會副主任。

8月中旬至9月12日，毛澤東在外地巡視，開始批判林彪。

9月12日，林彪企圖炸毀毛澤東所乘專車，未遂。下午離開北京至北戴河與葉羣、林立果乘坐英製三叉戟軍用運輸機投敵叛國，13日凌晨墮毀於蒙古溫多爾漢附近，機上各人全被燒死。于新野、周馳宇、陳勵耘等人分乘兩架軍用直昇機企圖外逃，在邊境附近被截回。于、周開槍打死駕駛員後自殺。陳勵耘拒捕被擊重傷。黃永勝等紛紛落網。此即大字報所說的"9.13事件"。以後開始"批林整風"。

1972年3月趙紫陽調任廣東省委書記，省革委會副主任。1974年4月升任省委第一書記及革委會主任。

2月尼克松訪華

11月14日李慶霖寫信向毛澤東"告御狀"。參頁49註㊃。

1973年4月鄧小平以國務院副總理身份復出。自林彪事件後，解放幹部步調加速，鄧小平之復出成了解放幹部的象徵。毛澤東覆李慶霖信，並給他寄上三百元。

8月起楊榮國發表多篇批孔文章。

8月10日人民日報轉載張鐵生寫在考卷上給領導的信，將他捧爲反潮流的英雄。參頁71註㊂

8月24至28日中共十大在北京召開。周恩來作政治報告，王洪文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提出了"反潮流"和"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選出十屆中委，軍人名額減少，老幹部及文革時期獲遷升的幹部比例增高。

8月30日，中共舉行十屆一中全會。選出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周恩來等五人，及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常委會委員等。

9月13日，李一哲大字報初稿完成。

12月12日，李一哲大字報二稿完成。

12月中旬，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調動大軍區司令員。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調任廣州軍區司令員。解除各大軍區司令員兼省黨委第一書記及革委會主任之職，恢復黨指揮槍的制度。

12月28日，人民日報轉載黃帥給北京日報的信和日記。王亞卓去信批評。1974年2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黃帥"覆信。黃帥成了教育戰線反潮流的英雄。參頁71註㊂

1974年1月，鄧小平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並負責周恩來部分工作。

1月18日上海港五區工人貼大字報"要當碼頭的主人，不做噸位奴隸"，各地紛紛出現大字報，但一般只能張貼在本單位。大字報多批評本單位黨委領導不重視文革後的新生事物，有"回潮思想"。

1月1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用特權走後門入大學的南京大學學生鍾志民寫給校黨委的退學書。鍾志民退學返部隊，又退伍下農村。鍾志民事件後，全國各地有數宗同類走後門入學而要求退

學的事發生。參頁48—49註㊂。

2月初中共中央頒佈關於批林批孔運動的指示，其中丙項"中央八條"規定："嚴禁派系組織"、"嚴禁武鬪、串聯、和組成類似紅衛兵組織的活動。"等等。

4月李一哲在廣州貼出大字報"廣東怎麼辦？"攻擊"林彪體系"、特權，指出沒民主等情形。又陸續寫出了"星火燎原館的始末"、"革命死了，革命萬歲！"等大字報，有很大的社會影響。因而引起趙紫陽、許世友的重視。

5月中央十八號文件規定不准撕大字報，准大字報上街。中共中央主席辦公室也作出同類指示。先是三四月間全國各地出現大量大字報，由批林批孔到攻擊地方幹部，攻擊特權，算文革舊帳，要求平反。很多地方當權者禁大字報上街，撕大字報，對貼大字報的羣眾實行鎮壓。四月，中央十七號文件規定不准大字報上街，特別是廣州等有外賓和華僑出入的城市。廣州等地黨委遂組織"政治市容清掃隊"，隨時出動，以水龍頭掃把清洗出現在公眾地方的大字報。

6月全國各地街道，特別是黨委會、革委會所在地出現大量大字報。批各級領導幹部，批特權、走後門，批回潮復辟，要求平反等。北京且出現了很多外地來的大字報，"上京告狀"，控訴地方幹部的壓迫。自一月起，已有個別地方出現武鬪及工人罷工情形，生產受影響。

7月2日中央禁止地方大字報上京，強調問題不上交，就地解決。

7月提出宣講"儒法鬪爭史"，進一步"尊法反儒"、"揚秦批孔"。

8月廣州出現舊紅衛兵大字報，要求清算軍人在1968年下半年的大屠殺。

8月2日，湘暉在人民日報發表"評湘劇園丁之歌"。指出文藝黑線在回潮。早在年初，江青已親自揪出晉劇"三上桃峰"。全國文藝界展開"反回潮"運動。

10月中共中央發出"中發(1974)26號"文件，傳達毛澤東"安定團結"的指示。參頁53註㊃。跟着，毛澤東又作了"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指示。

11月7日，李一哲大字報寫成定稿。10日在廣州北京路口貼出。發出徵求紙張，以便油印大字報的啓事。

11月24日，廣州復員軍人示威要求解決工資問題。

12月3日，廣東省黨委宣傳部以"宣集文"為名貼出"對'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的批判"，攻擊李一哲大字報。

1975年1月8日至10日中共舉行十屆二中全會，通過"憲法修改草案"及修憲報告，政府工作報告，人大常委會及國務院成員名單。並選出鄧小平爲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李德生降爲政治局委員。

1月13至17日，召開四屆人大。通過憲法及選出人大委員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及委員。任命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及各部部長。鄧小平被任命爲(第一)副總理。周恩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說："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新憲法規定："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是，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制度，服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法律。"

毛澤東沒有參加此次大會。李慶霖、楊榮國、張鐵生都被選爲人大常委。

2月，展開"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羣眾運動。

3月，紅旗雜誌發表毛澤東的指示及馬、恩、列的語錄和姚文元"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

4月，紅旗雜誌發表張春橋"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

5月，中共中央"中發（1975）13號"文件傳達鄧小平提出的"三項指示爲綱"。將毛澤東在今年春提出的"學習理論，防修反修"，和去年底提出的"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三項指示列爲全黨各項工作的綱領，並指出"三項指示"是"相互聯繫不能分割，不能丟掉任何一句。"

7月，浙江全省，特別是杭州發生工人爲提高工資及改善工作條件引起的罷工，動亂，中共將軍隊開進工廠"參加勞動"。全國其它地區，如四川、湖北、河北、山東等，也有類似情形。

7、8月間，教育界要求提高教學水平。清華大學革委會副主任劉冰上書毛澤東提出學生水準低落，教育部長周榮鑫要求恢復考試入學的制度。被稱爲教育界的右傾翻案風。

8月底起開始批水滸。

12月報刊開始"回擊教育界的右傾翻案風"。毛澤東指示："甚麼三項指示爲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鬬爭，階級鬬爭是綱，其餘都是目"。批判以鄧小平爲首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趙紫陽調到四川，韋國清任廣東省第委一書記，革委會主任，廣州軍區第一政委。

1976年1月1日人民日報轉載"詩刊"發表的毛澤東在1965年寫的二首詞，其一爲"批修"作品。

1月8日，總理周恩來病死北京。

2月，教育界科技界"回擊右傾翻案風"。並開始批判"三項指示爲綱"。

2月7日，華國鋒以代總理身份公開活動。

2月27日，美國前總統尼克松訪華。

3、4月報刊繼續不指名批判鄧小平和"三項指示爲綱"。

4月5日，北京十萬以上羣眾聚集天安門廣場，公祭周恩來，抗議移去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羣眾所獻的花圈。部分支持鄧小平，反對江青，呼口號，寫詩，與守衞軍警衝突，發生暴動。焚毀警車、搗毀軍區及民兵建築物。北京市長吳德出動勸說無効。相持至晚間，出動大批民兵，配合軍警實行鎮壓，方將人羣趕出天安門。這就是轟動世界的"天安門事件"。"天安門事件"前後，全國各地發生相類事件。據新華社鄭州10日電："有人借清明節，搞與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類似的反革命破壞活動，並且行兇打死了鄭州市電信局的焦春亮。安陽、南京、上海等地，也發行武鬬和示威。

4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通過毛澤東提議，罷免鄧小平黨內外職務，留黨察看。任命華國鋒爲總理。

1976年4月30日據說毛澤東接見華國鋒，親筆寫下「慢慢來，不要招急」。「照過去方針辦」，「你辦事，我放心」的指示。（見76年12月17日人民日報）

6月中旬中共中央宣佈「不再安排毛主席與到訪的外國貴賓會見」。

7月6日朱德突然病死北京。死前兩星期還會見外賓。

7月28日冀東地區發生強烈地震，唐山市幾乎整個被毀滅，又波及天津、北京。估計死傷數十萬人。中國政府拒絕僑胞、外國友好人士及外國政府對災區的援助。

9月9日毛澤東病死北京。

9月16日兩報一刊社論「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提出毛澤東「臨終囑咐」：「按既定方針辦」。據說造成了華國鋒和江青的衝突。10月4日光明日報發表了梁效「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的文章，使這種衝突達到高峯。據說就在這時候，葉劍英認爲應該除「四害」。

10月6日華國鋒突然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會場上逮捕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四人幫」。當晚又出動軍警逮捕其他附從分子。

10月7日由華國鋒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選出華國鋒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軍委會主席。9日發出「15號文件」通告全黨。中共開始批判「四人幫」的運動。

10月22日北京150萬軍民慶祝遊行擁護清算「四人幫」，賀華國鋒任中共中央主席。全國各地也紛紛組織遊行。

10月31日解放軍報發表「華主席是我們黨當之無愧的領袖」的社論。開始搞華國鋒個人崇拜。全國報刊紛紛報導華國鋒過去事迹。華國鋒被稱爲「英明的領袖」，「全軍的統帥」。

11月30日至12月2日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第三次會議，任命鄧穎超爲四屆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罷去喬冠華外交部長職務，改由黃華擔任。並通過其它不公開宣佈的任免事項。

12月10日召開第二次農業學大寨會議。會議中學習了毛澤東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講話：「論十大關係」。華國鋒出席了25日的會議，並作了講話。將批「四人幫」；加強黨的建設；開展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運動，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學習馬列和毛澤東著作，作爲1977年的四大中心任務。

跋

去年初，廣州逃港的青年跟我談及李一哲大字報，特別是他的"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我就盼望有一天能讀到全文。後來這篇文章和宣集文的批判在"中共研究"第 9 期（1975年11月10日）出現，香港的報刊又先後轉載，使我得睹廬山眞面目，實在大喜過望。我請那些曾在廣州讀過原文的人，仔細地從頭到尾讀一遍，大家都覺得這次發表的是沒經删改的原文。這些朋友，有的曾擠在北京路街頭，舉酸了脖子逐字細讀；有的曾深宵打着手電筒，在凜冽的寒風中，逐字咀嚼；有的更有幸借到油印本，享受寒夜閉門擁被讀禁書的樂趣；所以印象深刻。據我自己的判斷，外間的人是假不來這樣的文章的；又經過朋友們的證實，對這篇文章的可靠性深信不疑。

讀這大字報時有很多感觸，想講幾句話，因而利用去年寒假寫出了"從李一哲到天安門事件"（代序）初稿的前五部分。初時只想多引李一哲大字報裏的話，讓它自己說明問題；後來覺得這樣做太縛手縛腳，就採用較自由的形式，夾敍夾議。現在看來，覺得引文太多，又不夠系統；自己的意見也發揮得不夠。朋友們也有同樣的看法。但除非整個重寫，否則難作改易。可是抽不出時間，只好將就這樣拿出來，這是我要向讀者道歉的。好在要說的話雖沒深入

發揮，但論點還在，細心的讀者可以看出來。"代序"中最末一篇"關於天安門事件—— 4.5 運動"是今年五月寫的，寫後又加上全篇篇題 。最近將全篇初稿稍作補充 ，請朋友們批評；又根據大家的意見和補充資料作了增補删削修改。"代序"中"關於李一哲大字報"一節大部份資料是由直接間接認識李一哲們的逃港老紅衛兵提供的，不敢確定的地方就用"據說"表明，以示負責。

李一哲大字報涉及文革以來中國所發生的很多事件和重要人物，要眞正了解就必須加以註釋。香港明報和明報月刊發表這張大字報時曾加註釋，但十分簡單。台灣 "中共研究雜誌社"1976年 3 月出版由玄默編注的"李一哲大字報論集"，"附註釋校正李一哲大字報宣集文大字報 "， 註釋已較詳細。但有該註不註，誤註的現象；而且因受政治觀點的限制，不免曲解和加上較多的主觀判斷。但總的來說，水準還是相當高的。本書註釋作於去年底，後來又據玄默的註作過一次檢查、補訂。爲了能淸晰地了解大字報所及事件的背景，又加上與"李一哲大字報有關大事記"，它是與註釋相輔相成的。

"楊曦光簡介"一篇主要是就黃風的"敢捋虎鬚拔龍牙"（載中報周刊105期，1969年 9 月26日）節寫，又據廣州"廣印紅旗" 第五期（1968年 3 月）所載 "省無聯" 和批判 "省無聯"的文字加以補充 。 這批文章曾由香港出版的"祖國"月刊第83期至第87（1971年 2 月份至 6 月份）加以轉載。本書所收的"中國向何處去？" 則據"廣印紅旗" 再 轉 載的錄出。丁望主編的中共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第六卷，中南地區文化大革命運動（香港，明報月刊社出版，1972年）亦收這篇文章並有簡註，編者曾作參考。"代序"中只是論述"天安門事件"，沒有將"事件"起因和詳細過程寫下來。這方面可參考華林："紫色的天安門"（載香港"黃河"雜誌創刊號，1976年 5 月16日）。華林的文章是綜合外電報導寫

出來的，唯一的缺失是官方資料用得不多，有時連當事人的心理都寫出來，倒像報告文學了。但"紫色的天安門"是截至目前爲止最詳細的報導文章，分析也深刻，價值還是很高的。況且本書將官方最重要的報導"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收入，如有華林的文章作補充，可以給我們整個事件一個較完整的輪廓。

這本書，就這樣草草地送到讀者面前。趕着出版的原因是李一哲大字報和天安門事件的出現，都曾引起社會多少的波動，但時間冲刷一切，這些事件很快就在人們腦中淡忘。現在談李一哲大字報和天安門事件的人已很少了，更不要提"中國向何處去"了。但爲了中國的現在和未來，繼續討論這些問題是有必要的。因此將這些文章結集起來，又加註釋，以供參考；又附上編者的論述，希望抛磚引玉，引起更多的討論。李一哲在大字報序言結束前寫道：「我們把受教益的期望更多地寄托在街頭讀者身上，衷心希望同志們給我們提出批評指正意見，特别希望街頭理論家、政治家、法律家、批評家、觀察家們不吝賜教。我們希望越來越多的同志公開討論這些問題。」

編者正有同感。

最後，編者向曾閱本書初稿，提供意見，補充資料的前輩和朋友們致謝，沒有他們熱誠的幫助，本書會有更大的缺陷。明報月刊胡菊人先生借出封面封底的相片，也於此一併道謝。

1976年7月1日

再版後記：

本書初版在香港發行不夠一個月，即已售罄。法文本在翻譯時曾參考中文本，註釋較中文本簡略，序言是譯者吸收中文本序的某些精神重寫的。到目前爲止已印了三萬本，出版後法國報刊雜誌紛紛作評論，在社會上有較大的影響。日文本出版前已有報刊談論，出版後的情況如何還不能得知。我還希望看到本書其它文字的譯文。中文本出版到現在半年，中國大陸出現了新的情況，需要加上新的論述，所以趁日文本出版的機會增加新的序言，加入這段時間新出現的資料，又改了個别錯字。爲着避免重排的費時，新獲得的資料不能插入書中，就在這個後記中說明。

先談李一哲。據跟李一哲他們相熟逃港的青年朋友說：李正天後來被送到粵北石人嶂鎢礦場（一說是梅縣紅工礦）勞動，在礦場中繼續宣傳他的主張，很得工人擁護。他經常作演講，有得多聽眾，有人甚至爲了聽他的演講而遲上班，因而被當局以破壞抓革命促生產，煽動罷工的罪名抓起來，受鬭爭，遭毆打。陳一陽被下放到廣州郊區九佛農場，由文革時的敵對派系紅衛兵看管。黃希哲留在廣州，在漁輪廠接受羣眾監督。四人幫事件後，他們的情況並沒有改善，依舊在原單位受「羣眾」監管。1975年初，「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大字報」被批判受圍攻時，李一哲計劃寫十篇回答批判的評論文章，本書封面牆上大字報「請君入甕」即是其中之一。十評還沒有寫完，即被禁止張貼大字報了。當時廣州市委動員文革時的左派頭頭武

傳斌、劉繼發、孫亦武等寫團剿李一哲大字報的文章，並印成小冊子內部發行，供批判用。（參頁1－7）「四人幫」垮台後，李慶霖（見頁49註四）、楊榮國（見頁71註二）都被指爲「四人幫分子」，走狗而遭逮捕 。 張鐵生（71頁註一）的下場更慘。人民日報於1976年11月30日發表了「一個反革命的政治騙局」，兩天後又發表了「從一個凶惡打手看四人幫篡黨奪權陰謀——王、張、江、姚把『答卷』作者吹起來，放出來幹甚麼」，兩篇文章揭露張鐵生是個大學迷，他寫信的目的是「希望各級領導在這次入考學生之中，能對我這個小隊長加以考慮爲盼」！他參加所有的考試，根本沒有交「白卷」，只是考試的成績太差罷了。這跟李一哲在文章的批判完全一樣。因爲江青等需要衝擊當時的教育政策，以便衝破缺口批判周恩來，所以，將張鐵生捧出來。毛遠新到處宣稱：「『答卷』作者是塊有棱有角的石頭，我要拿起這塊石頭打人了」，據說張鐵生也不負江青等的期望，給江青等歌功頌德，又替他們拉隊伍。周恩來死後他四出演說，打擊老幹部。毛澤東死後，他又發表談話，攻擊華國鋒。「四人幫」垮台後，張鐵生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分子」。

華國鋒（頁131註一）發動政變 ， 逮捕四人幫分子，成了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和中共中央軍委會主席。

湘劇「園丁之歌」(頁65註三)的情況在「四人幫」垮台後有了新的發展。1976年11月10日光明日報發表了題爲「偉大領袖毛主席爲『園丁之歌』鼓掌——湖南湘劇團文藝戰士舉行批判會 ， 憤怒控訴『四人幫』扼殺『園丁之歌』的滔天罪行，決心在華主席領導下，搞好文藝革命」的電訊報導：湘劇高腔「園丁之歌」，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湖南省湧現出來的優秀劇目之一。在1972年湖南省專業文藝會演中 ， 這齣戲受到了中共湖南省委的重視……於1973年攝制成彩色舞台藝術片。……「四人幫」拉大旗，

作爲虎皮……就倚勢（！）定人罪名」……強令公開批判「園丁之歌」……毛主席 …… 在湖南親自看了湘劇高腔「園丁之歌」的彩色舞台藝術片，高興地鼓了掌，表示肯定和讚賞。……可是「四人幫」反黨集團賊心不死，……繼續肯定對「園丁之歌」的「批判」是對的，一面蠻橫地指責湖南省委主要負責同志，誣蔑湖南省委在毛主席面前告了他的狀，給他們下了『最後通牒』等等」。同日光明報又發表了半頁「園丁之歌」的劇照和說明。

張玉勤事件(頁69註[illegible])：張玉勤是河南省唐河縣馬振扶公社人，在一九七三年 ， 年僅十五歲 ， 是個中學生。在一次英語考試 ， 她完全不懂得回答 ， 試卷上全是空白，後來她在試卷後寫上了這樣一段話：「我是中國人，不學ＡＢＣ，不學ＡＢＣ也能幹革命。」然後就交卷離開課室。教師在改卷時發現了這段話，把它拿出來和班主任討論，最後向學校領導匯報。經過討論後，教師和領導都覺得這段話的錯誤，是有關學習目的和學習態度的問題。學校對張玉勤進行批評教育，個別談話後叫她寫檢討承認錯誤。並「要進行全校批判」。張玉勤受不了，跳河自殺。那時候遲羣正在週遊全國，搜集教育戰線中「復辟」「回潮」的典型。他調查了張玉勤事件，「把一批教師、領導，都抓去勞改，說他們迫死學生。當地公安局一些人也被說成是包庇學校，有罪，要逮捕法辦。」他將這一事件寫成報告，直接匯報江青，「江青加上按語，便成爲中央文件，發至全國各地。遲羣因此立了大功，直上清華。」當了清華大學黨委書記，成了「四人幫」的死黨。江青垮台，他也被清算。（引自：林志剛「中共教育路線的回顧與前瞻」，七十年代，77/3總第86期，頁28）

黃帥事件（頁71註[illegible]）1977年3月1日光明日報有新的披

露：「一九七三年底，『四人幫』在北京市的男女幹將利用一個小學生（按：指黃帥）的信和日記大作文章，本來一個小學生對老師提意見是正常的現象，他們卻別有用心地把她視爲『反師道尊嚴』的『典型』，當時學校黨支部對這種做法很反感，進行了抵制，但男女幹將百般施加壓力，要黨支部對教師不能手軟，胡說甚麼：『一個很小的學生提出了一個大問題，這是大是大非問題。當前教育戰線上存在着堅持復舊，還是堅持毛主席教育革命方向的問題。』不難看出，他們的目的，不僅是蓄意製造師生對立，破壞教育革命，而且借此大造所謂存在『回潮』『復辟』勢力，把鬭爭的矛頭指向敬愛的周總理。」黃帥的信和日記在報上發表後，「立即引起教育戰線廣大幹部和廣大工農兵的強烈不滿，紛紛向報社和這個小學生寫信。」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政治處三個青年幹部，也以「王亞卓」的聯名，給這個小學生寫信提了中肯的意見。（中共北京市委科教組：揭露「四人幫」插手教育陣地的罪行）

1977年元旦

La présente édition chinoise du dazibao de Li Yizhe, A PROPS DE LA DEMOCRATIE ET DE LA LEGALITE SOUS LE SOCIALISME, suivie de OU VA LA CHINE?, le manifeste du Shengwulian, et précédée d'une introduction de QI HAO, est le vingt-huitième volume de la BIBLIOTHEQUE ASIATIQUE, collection dirigée par René Viénet.

藝聯 Achevé d'imprimer le 31-6-76 par Ngai Lean, en son imprimerie de Kowloon,à Hong Kong, pour la plus grande satisfaction de la Bibliothèque asiatique.

Il a été tiré 3,000 exemplaires du présent ouvrage, au format 215×125mm.

東亞叢書第28種
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
李一哲原著　漆　豪校註
東亞出版社出版
香港九龍中央郵局信箱4298號
藝聯印刷所承印
125×215毫米　178頁　圖2頁
1976年6月 香港第一版，印數1—1,000
1977年3月香港第二版印數1,001—3,000
H.K.$ 6.00　U.S.$ 2.00
·歡迎翻印·

東亞叢書

中法對照

LA MAUVAISE HERBE

野草　魯迅著　李克曼譯

LA VERIDIQUE HISTOIRE D'A

阿Q 正傳　魯迅著

Martine Vallette-Hémery 譯

LE CLODO DU DHARMA

寒山詩二十五首

LES RETROUVAILLES

全家福　老舍著